

目 录

編者的話	(I)
清末南京絲織業的初步調查	南京博物院民族組 (1)
附录: 有关絲織業碑記	(14)
辛亥革命回忆录	(24)
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	楊兆蓉 (24)
辛亥革命在柳州	李墨馨 (48)
惠州光复記	陈景呂 (50)
灤州起义記	刘 驥 (53)
揚州光复之回忆	張羽屏口述 卞孝萱記錄 (60)
回忆揚州光复	周无方 (63)
兴化县光复記略	任洽丞 (65)
嘉兴光复記略	馬济生口述 董巽观記錄 (67)
南京战事略記	莊 晤 (69)
五四运动在天津	馬惠卿 (79)
紀念我們的回族烈士馬駿同志	陈紹禹 (112)
紀念馬駿烈士光荣牺牲三十週年	刘清揚 (119)
郭隆真烈士傳	刘清揚 (124)

圖片

- 南京絲織業文献六幀
- 有关辛亥革命圖片四幀
- 五四运动及烈士象五幀

編 者 的 話

本期發表的文字和圖片，為清末南京絲織業、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三類資料。

《清末南京絲織業的初步調查》一文，系根據訪問資料，參考有關文獻而成，並附錄有關文件和石刻。文中反映出清末南京一地絲織手工業的一般情況，即清政府的織造局和私營有關絲織業的各種作坊，以及絲織業各種職工的具體情況。在道光年間南京的機工和依靠絲織業生活的有關行業的人數在八萬以上，至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僅依染業為生的工人也不下數萬（見《漂洗絲經糾紛碑》）。機工與染工在作坊老闆與封建統治者雙重壓迫下，是過着極為困苦的生活，工人們不斷發生反抗鬥爭。各種作坊建立各種的公所，這種公所得清政府的支持，遇到工人為爭取自己利益而有行動時，公所和官廳便出頭肆行壓迫；作坊間發生糾紛時，公所和官廳也出而干涉。附錄的石刻，都記載着這一些問題。從本文中又可以看出太平天國革命以後，織造衙門在絲織業中尚有相當的勢力，但官營和民營間的相互關係，則材料尚嫌不足，有待以後繼續調查。

《辛亥革命回憶錄》八篇，又重刊《南京戰事略記》一篇，共敘述了八個地方的起義情況。四川資料敘述了辛亥革命和會黨的關係；江蘇揚州一帶和浙江嘉興的資料，敘述了辛亥革命中當地官紳投機活動的情況；各種資料都對於研究新軍和辛亥革命的關係，革命黨人與當地官紳的關係有參考價值。

《五四運動在天津》一文和馬駿、郭隆真烈士傳三篇，主要為敘述五四運動的情況。天津學生中受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影響，開始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人們，組成覺悟社。據《覺悟》第一期《三個半月

的覺悟社》一文說：五四運動發生，天津學生聯合會辦《學生聯合會報》，女界愛國同志會辦《醒世周刊》是覺悟社的“懷想期”；八月間，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和天津學生聯合會擬組織文化運動宣傳的機關，是覺悟社的“醞釀期”；九月十六日在學生聯合會開學生雜誌籌備委員會，決定出版《覺悟》，團體定名為覺悟社。這個覺悟社是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的領導骨幹，其中一部分人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光榮戰士。馬駿烈士和郭隆真烈士的事跡，是研究覺悟社和五四運動的資料，也是研究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資料。

本刊擬編輯“五四運動”資料，希望愛護史料的同志們將所存五四時期的文獻惠寄我組；更希望親身參加五四愛國運動的人士，撰寫回憶錄；也希望各地歷史工作者，收集、調查當地“五四”運動的情況，編成資料；以協助本刊為史學界提供參考資料。

啓 事

我組在 1957 年影印了《民報》全份，包括 1-26 期，另有第三號號外一葉，《天討》增刊一本。出版後又收到第十五號夏季增刊一冊，也準備補印附入。此外《民報》還有多少增刊與號外，希望讀者協助搜集，以成完帙。

更 正

本刊 1958 年第 1 期因臨時改換排版格式，以致目錄中篇名後的頁數與實際頁數不符合，我們校對粗疏，特向讀者致歉。

清末南京絲織業的初步調查

南京博物院民族組

为了充实陈列內容, 提供科学研究資料, 根据我院十二年远景规划, 我們对清末南京的絲織業的历史, 在一九五六年冬季进行了一次初步調查。

这次, 我們参观了中兴源絲織厂, 艺新、艺光等四个絲織業合作社和新宁染絲業合作社。訪問了九十七位职工同志, 和他們开了三次座談会。寻訪到曾在“織局”做过工的十二位老工人, 邀請他們开过一次座談会, 会后並实地調查了“織局”旧址。我們还調查了清代末年的“号家”、“絲行”和“公所”; 並訪拓了一些石刻, 訪問了过去“机工”和“号家”比較集中的地区的居民委员会, 还在中兴源絲厂和艺光合作社举办了小型的絲織物展覽, 接待了一百一十多位工人同志的參觀。

現在分別談談这次工作的主要收获。

1. “机工”、“染工”調查

在清末, 南京的絲織業分做三大类: 即緞業、絨業和織錦業。緞業集中在城南, 絨業大都分佈在今絨庄街至明瓦廊一帶, 城北則以織錦著名。据文献材料記載: “乾嘉間, 通城机以三万計。其后稍稍零落, 然犹万七八千。”^① “道光年間, 緞机以三万計, 紗綢絨綾不在此数。”^② 到了清代末年, 織絨的机子減少到三百多台, 織錦的机子三千多台, 織緞的机子九千台。机工和依靠絲織業生活的“附工”与有关行業的

① 《鳳麓小志》卷三頁二, 《金陵瑣志》五種本, 光緒廿六年刊。

② 《續纂江宁府志》卷十五頁七十三, 汪士鐸纂, 光緒六年刊。

人数在八万以上。民国以来,南京的絲織業又陷衰落,这从一九三〇年的調查数字上可以看出①:

	机 戶 总 数	織 机 总 数	机 工 总 数
素 緞	294 (家)	3,111 (台)	9,446 (人)
錦 緞	47	135	267
漳 緞	4	8	32
漳 絨	92	159	582
建 絨	167	329	1,207
共 計	604	3,742	11,534

关于染絲的作坊,从同治七年(1868年)《染業公所碑》上可以看出当时的作坊分做四类:元色坊 75 家,元淺坊 2 家,淺色坊 12 家,鮮紅坊 1 家,共計 90 家。

到了光緒末年,作坊減少到三十五、六家,染工三百人。主要的作坊有:

号 名	所 在 地	染 缸 总 数	染 工 总 数
魏 广 兴	高岡里	10—20 (只)	19 (人)
于 啓 泰	釣魚台	15	18
李 祥 和	欽馬巷	14	17
曹 义 隆	鷄鵝巷	不 詳	不 詳
張 德 茂	胭脂巷	不 詳	不 詳
源 茂 祥	磨盤街—飲馬巷	不 詳	不 詳
蔡 同 發	陈家牌坊	不 詳	不 詳

机工和染工大多来自农村,“半年庄稼,半年手艺”。机工以揚州、六合和南京附近的农民为主;染工多系上元、江宁、高淳、溧水四县的农民。《續纂江宁府志》中說:“元緞織工,头号必須江宁鎮人,有膂力,無疵瑕。次則秣陵陶吳,再次祿口殷巷,南乡以外,皆不如也。天青則城內人为佳。……染元色以溧水人为佳,祿口人次之。天青染坊,高淳人居多,溧水次之。”②据老工人說,以上記載是正确的。这

① 《首都絲織業調查記》1930年,工商部技术厅編。

② 《續纂江宁府志》卷十五頁七十四。

些来自各地的农民,到了南京以后,开始“学徒”,做些“附工”杂活,逐渐就独立工作了。他们的家屬也就做些“絡絲”、“搖緯”等工作“賴以活口”。当时,机工們出卖劳动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叫“站府”,一种叫“上府”。

什么叫“站府”呢?織素緞机工每天早晨天朦朧亮,就到一定的地方去站着,等候僱佣。城北的机工站在馬家桥,城南站在沙灣。每个地方每天最多站有二、三十个人,最少二、三人,站个把鐘头就散了。

什么叫“上府”呢?織錦緞的机工,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就採用上茶館的方式,即是說哪个工人要出卖劳动,一清早就到一定的茶館去吃茶。茶館的“堂倌”就会来問:“你是上府的,还是請人的?”“你是織的,还是洩的?”假設双方都觉得合适,机戶代机工付过茶資。机工就跟着机戶走了。在当时,除了織錦緞的机工以外,繅接工和絲商也有他們一定的出卖劳动和交易商品的場所——茶館。当时主要的几个茶館是:

茶館名称	所在地	出卖劳动的工种
三元	丹鳳街	織錦机工
順興	北門桥	織錦机工
金鳳	北門桥上	繅接工(城北帮)
聚和	英府街	繅接工(城南帮)
潮园	魚市街45号	黑白絲行
松鶴	絨庄巷1号	黑白絲行

这就說明,机戶是可以随意在劳动市場上僱到自己需要的劳动力的。机工們零星謀食,封建牙行的引荐似乎还有些影子。充当这种角色的是“号家”的“跑街”和茶館里的“堂倌”。

机工分做临时工和長工两种。临时工做一天算一天,没有什么手續。長工受僱以后,可以向“机戶”支用少量的錢,叫做“押賬”。以后,若果“工人回資方,押賬照还”,“資方回工人,不退押賬”。雇用临时工是有季节性的,机工們的話是这样說:“腌菜下了缸,找工打灯

籠”，意思是說初冬以後，就找臨時工人，白天黑夜織。不論長工或臨時工，都是按件計算工資：錦緞每件0.7元—1.3元，建絨每件1,200—1,900文，素緞每件1,800文。

不論長工或臨時工，都是由機戶供給伙食。一天三頓飯，兩稀一干，吃得很壞。

染工則是按年計算工資，手藝好的老工人最高的工資是每年一百三、四十塊錢，學徒每年拿三十多塊。

在清代末年，南京機工和染工們對於機戶的剝削，官府的壓迫，並不是沉默忍受的，這從兩塊石碑上可以看出一些消息：

(1)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江南巡警局不准染絲工人在“內河漂洗”絲經，工人們害怕到城外去洗使“絲經受傷”，賠償不起：“欲仍在內河，則巡官禁令森嚴，不能至河干一步”，於是就有“倡議一律停工者”。後來還是“號家”出來干涉。口頭上說是：“職局業雖屬號家，然原料所在倘聽其停工，原料無着，勢必牽連歇業，凡倚敝業營生者亦必牽連而絕生機，事關萬民生計，實不忍坐視不理。”於是百余戶號家就聯合起來，“苦口”勸告染工“不得率爾停工”。但在骨子裡却是號家為了自己階級的利益勾結官府壓下了這次鬥爭。這塊碑便是他們的口供。^①

(2)搖經的工人，當時叫做“車戶”，“車戶”的工資每月是六兩銀子。每年五月至八月，若果照常還搖經的話，則加工資銀一兩。光緒三十二年(1906)，車戶王瑩林，因為這樣的工資太低，就“煽惑”車戶“生事”，結果，還是被官府壓下去了。^②

2. “機戶”調查

簡單地說，“機戶”一般是指“僱傭手工業工人的工場手工業的主人”^③，但也有不同性質的機戶，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第一，南京絲織業的生產組織中，商業資本家是佔着控制的地

① 詳見附錄光緒三十四年《漂洗絲經糾紛碑》

② 詳見附錄光緒三十二年《緞業公所碑》

③ 詳見鄧拓：《論‘紅樓夢’的社會背景 and 歷史意義》《新華月報》，1955年2月號

位。这种商業資本家即是一般所謂的“号家”。号家利用資本自己購買原料、織机，雇用工人进行生产，同时又在通商大邑，設立緞号，銷售成品。这样，商業資本家就独佔了产銷的全部利潤。清代末年，“号家”在絲織業的生产總額上是佔着絕對的优势。

每一号家都有一套严密的組織与分工，例如“魏广兴”号內就有十二、三个“伙計”，他們的分工是：(1)仇貨——仇“黑貨”，仇“白貨”各一人，(2)管賬——一人至二人，(3)管撞接工一人，(4)管絡絲工一人，(5)外庄数人。

这些号家，除了自己雇用工人織造外，大多数是通过“放料”来剝削零散机戶的剩余劳动的。在清代末年，南京有一部份机工是自己有机子的，但缺乏資本，沒有原料，不能生产，这就給号家利用資本进一步控制这些零散織机造成極大的可能。“放料”是指号家把經絲、緯絲等按照織造某一件織物的需用量放給机工，規定“头数”、“門面”，並且先付一小部份的工資(按件計算)，机工就可以开始織造了。凡是“放料”的成品，机工必須在成品上織出号家的“牌号”，織成后送給号家驗收(即仇貨)，若果完全合乎号家的規定，机工就可以拿到余下的工資，同时还可以繼續为号家織造。

“放料”既然成为号家組織零散机戶进行生产的一种方式，因而就必然出現了一种号家与零散机戶之間的中間剝削者，这种中間剝削者，当时叫做“承管”。根据工作的性質，承管虽有內承管与外承管的分別，但一般所謂承管都是指內承管而言。一个号家都有一定数量的承管，按照产品的不同，分成管素緞的承管，管花貨的承管等等。承管在生产組織中的主要作用是：“須認真訪察其人之行为、手艺，可織何样緞疋，切勿以他人血本敷衍其事”^①，这話即是說承管負責“放料”对象的行为和手艺。放料时，号家和机戶要立一个摺子(亦叫花股)。摺子就等于一个領料送貨的“流水小賬簿”。每个摺子开始皆有一定的規格。(摺子样式見下頁)

那么，承管在号家居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据調查，所有的承

① 詳見附录光緒十七年《机業公所行規碑》

摺子樣式

光緒	年	月	日立
一切根據本號號規辦理			
承 管(簽名蓋章)			
貸料人(簽名蓋章)			

管都不是號家組織系統之內的人，他們不拿工資，也不在號家“吃飯”，但他們却天天在“號家行走”，給號家找放料的對象。號家對他們的好處有以下几点：

1. 首先，承管大都是有織機的，自己不參加生產，雇機工織造。同時，也是向號家“貸料”的。

2. 承管向號家貸料，號家就給他們許多方便，例如在絲的斤兩上，成品的尺寸、質量上等都比較寬大些。

3. 號家經常借些資本給承管。

4. 承管每經手放出一件成品的原料，當成品送來後，承管可以從號家得到一角錢的報酬（一說可以得到二三角錢）。這些報酬隨時可以向號家支用，年終結賬。

5. 機工還必須時常“奉承”承管，例如請他們吃酒、吃茶、洗澡等等。“一個承管，每月的收入有的到十幾石米的”。

但是承管的眼力畢竟是很有限的，他們必須借重另外一些人“為之物色對象”，這些人當時叫做外承管。外承管只能和承管碰頭，不能進號家的門。號家並不承認他們。外承管向機工們索取一點報酬，如吃酒、吃茶、借錢用等，承管在“放料”時也可以給這些“外承管”一點方便。

每個號家都有自己的牌號，有些牌號在市場上有它一定的聲譽，例如一個號家的後輩說：“在東北，每當小孩哭時，大人就騙他說：‘不要哭，給你買一頂于啟泰的緞帽子戴’，小孩子一聽就不哭了。”從一塊石碑上看出，號家之間曾經不斷發生“盜織”有名的牌號的事情，例如宣統二年（1910）就有人盜織過“廖隆盛”的牌號。^①

① 詳見附錄宣統二年《禁止盜織牌號碑》

第二，在机戶中除了号家外，还有一种“小开机”。“小开机”的特点是自己有几台織机，自己参加生产，但主要是雇工織造。例如吕光茂有八台絨机，自己織一台，雇工七人織七台。胡仪隆有四台花机，自己一人織，另雇了七个工人。

小开机的資本来源有三：(1)自己筹措，自織自銷；(2)向号家貸絲經，織号家的牌号，織好后把部份成品送給号家抵偿絲价，部份售給客商；(3)向客商貸款，买原料，織客商的牌号。

由此看出，小开机对号家和客商都有很大程度的依賴性，但在成品的銷售方面，小开机与号家又处于矛盾的地位。所以小开机的經濟地位常常是不穩定的，絕大多数是被号家吞掉而下降为赤貧的机工。但也有極少数的小开机逐漸富裕起来。前面提到的吕光茂，在太平天国时期，他們一家人逃到如皋、泰州等地，自己打机子，雇工生产，同治八年(1869)回到南京，在石鼓路买了一座房子，打了八台織机，生活过得很富裕。

这次，我們訪問到的几个大号家的情况，如下表：

号家牌号	住 址	織机总数	雇工人数
涂东源	建鄴路下街口	500—600(台)	約600(人)
三順堂(楊裕隆)	小英府街	400	約400
于啓泰濶記	大夫第	200	約200
于啓泰德記		500	約500
魏广兴	高岡里 17, 19 号	300—400	約400
吳鼎昌	香舖营附近	300—400	約400
吳順昌	香舖营附近	330	約300
陶順昌	花录中岡 10 号	100	約100
李昌記	胭脂巷	100	約100
刘义兴	高岡里 20 号	300	約300
王聚兴	高岡里 16 号	300	約300
李东昇	殷高巷	300	約300
黃錦昌	長乐路三坊巷	200	約200
胡义兴	估衣廊	200	約200
曹义隆	鷄鵝巷	70	約 70

(續表)

号家牌号	住 址	織机总数	雇工人数
張順興	高岡里 26 号	200	約200
張裕泰	高岡里 13 号	30	約 30
李祥和	九兒巷	200	約200
張德茂	胭脂巷	300	約300
單誼興	陈家牌坊 13 号	40	約 40
廖隆盛	評事街	200	約200
胡仪隆	望鶴楼	300	約300
徐天昌	磨盤街	120	約120
徐炳順	梧桐树	80	約 80
端泰昌	梧桐树	500	約500
苏德昌	李府巷	300	約300
秦福元	昇州路老坊巷口	400	約400
魯泰昌	鳳凰井	400	約400
蔡福源	陡門桥	400	約400
談益記	謝公祠	6	6
張余興	謝公祠	5	5
田順興	小英府	6	6
陶瑞泰	糖坊街	20	20
張茂丰	磨盤巷	30	30
王广隆	小王府巷	15	15
陈錦盛	鳴羊街	15	15
徐振記	小府巷	10	10
吳槐記	錦繡坊	20	40
胡忆興	估衣廊	20	40
張象發	千章巷	80	150
施春記	沐府西街	8	16
刘鴻金	沐府西街	8	16
郭德泰	慈悲社	8	16
何錦丰	張府巷	8	16
合 計		8, 129(台)	8, 241(人)

3. 絲 行 調 查

光緒末年，南京需要絲的數量很大，最高數字達年銷兩萬幾千担。其中，江寧城鄉出四五百担（玄武湖年出絲七十担），浙江硤石進貨上萬石。其他就從句容、浦口、六合、溧水、滁州、高郵、丹徒、丹陽、高淳等地收來。當時，除了幾個大號家自己直接向各地購買生絲以外，在南京還有專門收絲銷絲的絲行組織。據調查，當時這種絲行總數在一百二十家左右，分佈在三個地區：1、南門沙灣一帶，六十多家；2、新橋絲市口一帶；二十多家；3、北門橋至魚市街一帶，四十多家。

其中資本最大的幾家是：

號	名	地 址	資 本 估 數
夏	宏 興	魚市街	20,000(元)
夏	宏 大	魚市街	20,000
魏	坤 泰	新 橋	40,000
許	成 記	釣魚台	20,000
朱	祥 泰	中山南路	20,000

每一個絲行，開始營業的時候，必須向清政府繳納一定數目的捐款，領取“行帖”。行帖分做四等。我們收集到的一張是：

欽命江南江寧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李 為出示曉諭事：據江寧縣民人洪湧豐稟稱，竊身遵奉新章，捐請部帖，在江寧縣南門沙灣地方，即以湧豐牌號開張零拆絲經行，照四等則捐銀五十兩、照費一錢，邀取地隣並大行出具保結，連同捐銀呈請給示開張到司。據此核與江寧府詳案相符，應准捐充，除飭縣入冊徵稅，所有部帖，俟彙案呈院蓋印另行補給外，今先給示開張。為此示仰該牙即便遵照在南門沙灣開張零拆絲經行，務須公平交易，代客買賣，照例取用，毋得勒措把持，致干查究。切切特示。右諭通知。 同治八年三月二十五日示

除了絲行以外，當時還有許多零星收絲的絲舖。絲舖的活動是有季節性的，大致是農曆“小滿”以後，就開始從南門頭道圈起，擺起

桌子“帶称兜攬”，这些絲舖也須領取“行帖”。行帖上規定“地段”、“舖位”，嚴禁“無帖私充或一帖兩用，跨舖朋充，擺桌收絲，冒名頂替”。

絲行虽有固定的門面，但它的活動也是有季节性的。每当时新絲上場时，他們除了在門市收購以外，还派人到“乡行”去收貨。当时南京郊区的祿口、橫溪桥、謝村等地都設有“乡行”。据說，祿口的“乡行”有四、五家，橫溪桥和謝村均在二十家左右。“乡行”資本很小，大都依靠城內緞号 and 絲行的貸款。城里絲行到“乡行”收貨时，採用兩種方式：一种叫做“包庄”，即由絲行借“乡行”的地段包收若干天。交易一百元，农民付“乡行”佣錢二元，絲行付一元。一种叫做“选剔”，即由絲行派人在“乡行”的收貨中，选出好絲，每百元付“乡行”經手費一元。

当时絲的品种，大致分做五等：即緯絲、經絲、線絲、糙絲、二光等。每种价格不同，平均价格每百兩在十八元至二十元之間，最貴曾經賣到百兩七十多元。

絲行收絲，每百兩扣佣百分之二。把絲賣給緞号或“小开机”，每百兩又加佣百分之二。

4. “織局”調查

根据文献材料，从明代开始，南京就專門設有管理織造的衙門，“督理”供皇室制袍服，作詰帛和糊飾用的各色錦緞。

“明制兩京織染內外皆置局，內局以充上供，外局以备公用。南京有神帛堂，供应机房……岁造有定数。洪武时……于后湖置局織造。”^①

关于明代南京織局的生产数量，我們随便檢翻一下就可以得到不少材料。这里只引《明南京車駕司職掌》一書中所見的數字來說明：

“織染局二起，春秋二运，龙衣並起各色紵絲紗罗綾。每年二运，每运多至三千四百余疋，每廂裝二十五疋，作一杠，每船可裝四十杠。

① 《明史》卷82《食貨志六》。

嘉靖九年題准約用船四只。嘉靖三十一年題准四十三杠，用船一只。隆庆六年起运四千四百余疋計二百八十一廂，撥裝黃船二只，馬快船七只。万历十五年添运各色彩金紵絲紗羅絨線等件三百五十疋，段、幅、条、斤，裝盛三十廂杠，添小黃船一只。万历十九年，添造紵絲等件一千七百六十九疋，段、幅、条、斤，添撥馬船一只。”^①

到了清代，南京的織局在順治五年(1648年)就恢复了。曹宜的父亲曹璽在康熙二年(1663年)以“內务府官”的身份“首膺江宁織造之选”。

据《江苏通志稿》《貨殖志》：“江宁、苏州有織造局。岁織內用緞疋並制帛誥敕等件，各有定式。……江宁織倭緞六百疋。上用緞机，江宁局三百三十五張。……部机江宁局二百零三張。……凡織造錢粮，……江宁織造动支戶部岁供織造銀七万三百三十七兩四錢四分二厘。”^②

在太平天国时代，南京設有“織營”，“其卒皆織机匠”^③，在朝內並設“織錦匠”專門督造“刻絲粧緞”^④，虽然“織營”的規模現在还没有找到材料，但从当时喜欢用黃緞裱糊門扇和織錦袍服的大量服用来看^⑤，南京無疑还是当时織造絲織物的重要地方。

清代織局，在太平天国以前，分做三部份，且不在一处。同治《上江兩县合志》卷十三《秩官》頁九引仇善培的話說：

“在西华門汉府^⑥地方者，紗、紬、緞、裝蟒等机五百五十四張，有坊曰‘尙方华袞’。在常府街桥者曰倭紬堂，有倭絨，素緞等机四十六張。每年約織万数千匹。遭乱皆毀。……往时又有神帛堂，在駐防城北安門內，額設誥命制帛机六十八張，今未設。”

現在保存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館內汉府机房圖即系西华門汉府織局。其他二处的情形現在还未訪得。

① 《明南京車駕司职掌》卷一都吏科頁二十一，明祁承燾纂1934年商务印書館出版。

② 《江苏通志稿》南京圖書館藏。

③ 詳見《賊情彙纂》卷四。

④ 詳見《賊情彙纂》卷三。

⑤ 詳見《賊情彙纂》卷六。

⑥ 因織局系在明汉王高煦的旧府遺址上建成，故簡称織局为汉府。

太平天国以后，織局是迁移到現在的中山南路与白下路交接的地方。老工人說：織局四四方方的，南接白下路，北隣厅后街，东边是祠堂巷，西边是跑馬巷。这次我們在厅后街中山南路小学的后牆基上發現一塊石碑，上刻“織局北界止此”六字。局內东西兩边，各設有六堂(排)机房，每堂(排)又分做內外二堂，当时称之曰“东二內堂”“西三外堂”等等。

东一外堂放着一台織机，專門織寬幅織品，机子上雕着双龙，漆紅色。除东一外堂外，每一內堂置机八台，外堂置十二台，共有机二百二十九台。这情况比李鴻章原来的規劃要扩大些。①

这些織机，都是織局制造的，由織局选择“熟練各項織务”的“匠人”領用。这种“匠人”当时叫做“領机”，一般人称为“机头”。領机在領用織机时，要向織局办理一个“登記”執照。这个執照要填写“領机”的“年貌籍貫”，說明領的是織什么的机子，領多少台，同时，執照上也明白地承認“領机”是一种“官匠”，按月領取米糧。据老工人講，“領机”大都是領織一二台机子。領一台机子每年向織局“領洋二十四元”“俸祿米三石六斗”。遇有織造任务，領机向織造領取原料(絲經、緯絲、范子等)，雇用机工进行生产。一般說来，領机是雇工生产的，“貨織好以后，交給东家(即領机)，由东家送給織造局”。机工的工資，由領机發給，也是按件計算，“織一件袍料花三天功夫工資九角多”。伙食是由东家送到織局。机工早上天一亮就进局，晚上七点多鐘才散工，每天工作在十一小时以上。若果沒有織造任务，“机工就散了，自己找生活干”，但領机还是照例按月領取“米糧”的。

在“汉府”工作的机工都有比較好的技术，他們都具有“接得平、領得平、捻得平、絡得平、發得平”等等本領。这些本領至今仍是被人傳誦的。

“汉府”里的附工由民間工匠輪流当差，例如揸接工，当时南京的

① “在珠宝廊地方，購得民人李端住宅一所，尚存楼房廿余間。前临內桥河水，便于漂絲，移置織局最为合宜。現經筹款鳩工，就兩旁余地添盖机房五十余間，倉廩五間，計每間設机二張。新添房屋，可設机百張。”同治四年七月《筹設織造机房摺》見《江苏通志稿》《貨殖志》，南京圖書館藏。

捧接工匠城南有四班，六百多人。城北有三行，三百多人。遇有差事，分城南城北輪流當值。每班(行)都有一个行頭，由行頭“持票傳差”。每人當值一日，沒有工資。“漢府”供給伙食，或發銅錢二百四十文。當時城南捧接工出賣勞動的場所是在英府街聚和茶館內。城北的則在金鳳茶館。

織局的總負責人，機工們稱為“堂總”。同治初年，“堂總”叫柳天培，其後為陶祥。作“堂總”的人，自己家里也置有機子。柳家有六張機子，兩張是“漢府”的，向“漢府”領料，交貨。其餘四張是自己的，雇工人織。據說，當時在“漢府”當差的一百多家，家家都有機子。

現在訪得的漢府老工人有十二位，詳見下表：

姓名	年齡	住 址	在 漢 府 工 作 情 况
朱子庆	81	胭脂巷 26 号	14 岁进汉府，他和黄朋生織过一張機子，朱在上面拽，黄在下边織。
黄朋生	83	老虎桥 5 号	在汉府織过十几年。
王玉典	63	柳叶街 84 号	11 岁至 15 岁在汉府东三堂織。
刘有树	69	石鼓路石鼓新村 40 号	在汉府工作二、三年。
陈錦堂	77	同仁西街 11 号	18 岁进汉府，在西四堂織。
胡汉臣	71	張公桥中兴源絲厂	17 岁进汉府，做了五、六天工。
黄仁昌	72	殷高巷 37 号	在汉府織过一个月。
許春荣	78	高岡里 7 号	未訪問。
張源發	77	鉄官巷	在汉府东三堂織(未訪問)。
李老六	80	粧龙巷	未訪問。
臧源有	70	釣魚台 17 号	捧接工，汉府当差。
王貴进	70	双塘 1 号	捧接工，汉府当差。

据老工人講：“外边機子比汉府多”，但織造衙門对于民營的織緞、織錦業，給予極大的限制和摧殘。这次調查虽然还没有發現什么直接材料，但有一条文献材料明显地說明織造衙門对民營絲織業的控制。原文如下：

“江宁机房，昔有限制，机戶不得逾百張，張納稅当五十金。織造批准註冊給文憑，然后敢織。”^①

① 《續纂江宁府志》卷十五頁七十三。

关于清代末年南京絲織業的調查，所得到的材料大致如此，为了参考起見，並將碑文九通附录文后。目前我們將在这个基础上，計劃开展第二阶段的工作。这个材料仅是初步調查的結果，其中难免不有錯誤和片面的地方，請予批評指教。

(执笔人：宋伯胤)

附录：有关絲織業碑記

染業公所碑 同治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欽命江南織造部堂兼管龙江西新关稅務春为出示严禁事。照得織造局內，向有青綠染堂，前緣省城克复，各局均被燬焚，經前部堂祥，复創織務，当因餉項維艰，三局归併，所設房間，仅能鋪設机張。其染堂一节，改由民間染坊办理，曾因赶办欽工，發染絲經，各坊間有貽誤情事，特擇其中誠实者，諭充行首，以專責成。訪得章永順人尚老成可靠，于同治五年二月初九日，諭充大紅元淺各坊行首，即便遵照在案。茲本部堂採买絲經各件，分別發染，溯查向章，价值一切統照市价公平發給，毫無剋扣。無如顏色參差不一，減工省料，以致顏色到京多有泛变，情殊可惡，合行严禁。为此示仰該行首及各坊知悉：凡本部堂發染絲經各件，务当留心照察，該行首宜擇公所之地，不时公同常整行規，庶無貽誤。倘有大紅元淺各染坊，仍然疎忽，顏色參差，許該行首查获，連緯及坊主送呈本部堂衙門，听候究办。如有扶隱等情，定即一併严惩，决不寬貸。其各凜遵，慎之毋違。切切特示遵。同治柒年玖月二十四日示。

夫正乙祠从前乃我業所創建也，癸丑遭兵燹之乱，佛像栋宇，被燬燼尽。甲子省垣克复，蒙宪諭招回复業，重整行規，公所荒廢無存，是以爰集諸君，以襄善举，量力乐輸，照旧址重建，俾佛像佩玉披金，同人得敬而礼也。我等常整行規，庶有公議之所，乃神人同受其庇也。謹將諸君芳名，乐助之資，及工料价值用項，勒石以記。

万和元淺坊，助洋叁拾伍元伍角柒分伍厘。季三和永森元坊，助洋拾貳元伍角貳分貳厘。楊义和元坊，助洋柒元捌角叁分叁厘。楊仁兴元坊，助洋玖元伍角壹分。李合兴元坊，助洋拾陆元。張春源元坊，助洋伍元。張德鑫元坊，助洋陆拾元。楊德泰元坊，助洋拾元零貳角壹分。胡三盛元坊，助洋柒元肆角壹分叁厘。合兴元坊，助洋叁元伍角壹分。叶合盛元坊，助洋拾柒元。張□源元

坊，助洋肆元。協泰元坊，助洋肆拾伍元零捌分叁厘。陳東美元坊，助洋柒元玖角柒分貳厘。張同盛元坊，助洋拾壹元。穆東興元坊，助洋柒元陸角。公興元坊，助洋拾壹元。馬信茂元坊，助洋貳元。陶義順元淺坊，助洋叁拾貳元玖角壹分。殷義盛元坊，助洋拾叁元叁角陸分貳厘。于啓泰元坊，助洋捌元零陸分柒厘。虞生茂元坊，助洋拾元零伍角。陳炳和元坊，助洋肆元。馬義成元坊，助洋貳元。瑞和元坊，助洋貳拾伍元陸角陸分陸厘。張仁興元坊，助洋拾叁元肆角零叁厘。陳順興堯記元坊，助洋柒元伍角玖分貳厘。胡裕興元坊，助洋陸元零伍分。陶炳興元坊，助洋叁元。夏炳興元坊，助洋拾元。魏長興元坊，助洋貳拾元零壹分叁厘。臧裕興元坊，助洋拾叁元玖角玖分。施義興元坊，助洋捌元伍角玖分柒厘。穆鉅興元坊，助洋叁元柒角伍分。榮發元坊，助洋貳元伍角。柳三和元坊，助洋捌元。順和元坊，助洋貳拾伍元貳角陸分伍厘。陳順興在記元坊，助洋拾貳元捌角零伍厘。陶永增元坊，助洋柒元捌角叁分叁厘。萬茂元坊，助洋伍元捌角叁分。東興元坊，助洋拾貳元。陸有發元坊，助洋柒元。同興元坊，助洋叁拾捌元零肆分叁厘。仁和元坊，助洋拾玖元貳角陸分玖厘。陳順興楚記元坊，助洋伍元叁角玖分陸厘。郭德和元坊，助洋貳元玖角貳分。祥盛和元坊，助洋貳元伍角。同盛興元坊，助洋捌元。俞萬森元坊，助洋拾捌元貳角叁分柒厘。崔永興元坊，助洋玖元捌角叁分叁厘。春茂元坊，助洋玖元零捌分叁厘。陶永成元坊，助洋叁元伍角。孫吉安元坊，助洋貳元伍角。陳正興元坊，助洋陸元。魏錦和元坊，助洋拾壹元壹角壹分。孫啓興元坊，助洋柒元玖角柒分柒厘。王瑞豐元坊，助洋肆元肆角壹分陸厘。穆萬興元坊，助洋貳元伍角。義和元坊，助洋壹元一角。陸萬興元坊，助洋伍元。柳萬興淺坊，助洋肆拾肆元叁角玖分柒厘。周復興元坊，助洋玖元捌角壹分陸厘。榮泰元坊，助洋伍元肆角壹分陸厘。五昌盛元坊，助洋叁元伍角。陳聚興元坊，助洋壹元陸角柒分。楊玉和元坊，助洋伍元。源盛淺坊，助洋拾陸元壹角陸分陸厘。李祥和元坊，助洋陸元貳角捌分叁厘。周乾豐元坊，助洋貳元伍角捌分叁厘。余隆興元坊，助洋貳元零玖分。黃永發元坊，助洋壹元伍角。宋衡順元坊，助洋肆元。毛源興淺坊，助洋拾壹元陸角。尤祥興淺坊，助洋拾伍元肆角。王東明元坊，助洋叁元。蔣世富元坊，助洋貳元。吉順元坊，助洋叁元。劉益和元坊，助洋肆元。順興淺坊，助洋拾陸元陸角伍分。鼎泰淺坊，助洋叁拾陸元。欒義興元坊，助洋貳元。張錦源元坊，助洋壹元。衛永盛元坊，助洋壹元。三義鮮紅坊，助洋貳元。王榮盛淺坊，助洋拾玖元。曹源隆同春淺坊，助洋拾捌元。義興淺坊，助洋拾柒元。吳同興淺坊，助洋拾柒元。春和淺坊，助洋拾玖元。同順淺坊，助洋伍元。本城司伙彙助洋陸拾玖元捌角玖分貳厘。蘇滬司伙彙助洋捌拾貳元陸角陸分陸厘。以上總共計

彙入洋壹仟壹佰肆拾貳元叁角，總共計用出洋壹仟壹佰肆拾貳元叁角。（原碑在南京雨花路旧染業公所遺址內）

江宁土絲捐稅碑 光緒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欽加同知銜、特授上元縣正堂沈，特授徐州府沛縣、調署江宁县正堂陸，為出示曉諭事。案奉藩憲札，准金陵厘捐總局咨，奉督憲批，本總局詳，宁屬設局抽收落地絲捐，開摺呈請示遵由。奉批，此案現據江藩司呈，據紳董高德泰等稟陳窒碍情形，未便造次定議，聲明札縣會委，傳集紳董行戶，妥議稟詳，應俟議定，由司具詳察辦，仰即移會，一體知照等因。飭即遵照會委，傳集紳董妥議稟復，轉詳定案，等因。奉查此案，前奉藩憲札飭，即經傳集該紳董行戶，面詢籌辦。旋據紳董高德泰等以前呈四端，均系實情，深恐捐數無多，難以奏效；兼以時勢維艱，仰求體卹，以免繁擾。如日後有出運賣洋之絲，俟買戶打包，即責令行戶舉報，照章繳捐等情，先後呈復前來。正擬據情稟復間，奉飭前因。伏查該紳董等所稟四條，均屬實在情形，所有飭辦落地絲捐，當此民間元氣未復，委實難以籌辦。應請俯如該紳董所稟，免其收捐，以順輿情，而免繁擾。至此後倘有出運賣洋之絲，一俟買戶打包，即責令該行戶舉報，照章繳捐，以符原議。當經本縣等，會同委員，候補直隸州分州閔，稟奉藩憲批開，已據情核議，詳復督撫憲，仰俟奉到批示，另行抄詳，飭遵等因，奉經遵照在案。茲奉藩憲札，奉兩江總督部堂沈批，勒前署司詳，據上江二縣，暨委員閔倬會稟，江宁議辦絲捐，飭即會議，傳集紳董，詢據該紳董以前呈四端，均系實情。經縣會委查明，民間元氣未復，委實難以籌辦。應請免其收捐，以順輿情，而免繁擾。至此後倘有出運賣洋之絲，一俟買戶打包，即責令該行戶舉報，照章繳捐，以符原議，會稟諸祈詳咨免辦等情。經司再四察訪，所有金陵城鄉土絲，土產土銷，應請率由旧章買賣，一律免捐，以順輿情。至以後江宁土絲，如有販運出江，應照原議，每包按八十斤計算，實捐英洋十六元，准其驗照放行。如無捐照，由各局卡查出，照章收捐，給發捐票，以便下游驗放，核議詳復緣由。奉批，如詳辦理，仍候撫部院批示繳，等因到司，奉此。并准金陵厘捐總局咨查，會否議詳核復，飭遵前來。除抄詳移會常鎮道，并移金陵厘捐總局，蘇省牙厘總局查照外，合亟抄詳札飭，札到該二縣，即便遵照摘錄，簡明出示曉諭，仍移委員閔倬知照毋違，等因。并蒙抄詳到縣，奉此。除移委員閔倬知照外，合亟照詳摘錄出示曉諭，為此示仰城鄉絲行機業人等，一體知悉。須知議辦絲捐一項，業經本縣等會委，稟蒙藩憲核議，所有金陵城鄉土絲，土產土銷，應請率由旧章買賣，一律免捐，以順輿情，詳奉督憲批示，如詳辦理。以後凡江宁土絲，如有販運出江，應責成行戶，按照原議，土絲價值較

賤于湖絲，應每包按八十斤計算，免去滬捐、善后海塘等捐洋八元四角，實捐英洋十六元，由行戶轉繳地方官衙門給發收照，准其沿途驗照放行。如無捐照，由各局卡查出，照章收捐，給發捐票以便下游驗放。如出口第一卡收捐給照，免罰，至第二三卡始行查出，收捐之外，仍應照章議罰，以杜偷漏營私。華商販運出江，既須報捐，則洋商事同一律。凡持洋票來寧購買出江者，亦應照此報捐。查前奉常鎮道憲，咨行洋商，請領報單。向章于給單時，即將運照札發產地州縣，俟商伙買貨后，報請驗照，將報單繳換運照。由縣于照內填數蓋印，持作沿途驗放之憑。報捐后應于運照內加用產地捐已收訖字樣，以免逢卡周折。中外商人一律辦理，并無偏徇，足昭平允。爾等務各凜遵毋違，特示。光緒三年五月貳拾陸日示。

計開联名公稟：中書高德泰、職員姚体仁、監生魏國勳、職員李長霖、職員施俊、監生潘釗、職員錢新堂、職員陳子沅、縣丞宋治基、監生于成功、監生江鯤、職員虞珠聯、職員張必達、監生楊長興、職員王嘉元、職員李泰文。（原碑在南京博物院）

機業公所行規碑 光緒十七年七月七日

欽加同知銜、即補直隸州、正任清河县、調署江宁县正堂、加十級、紀錄十次趙，為給示勒石，以垂久遠事。案于光緒十二年十月十八日，據民人陶本鈞、叶守庆、刘錦順、侯茂廷、陶本立、李廷棠、王啓全、陳國章、俞鑑泉等，联名詞稱：切〔窃〕維織機一業，為金陵大宗生理，承平時，向在南門外云機殿為公所，遇有機業事宜，同行等，均在公所集議。自遭兵燹，公所房屋被燬。克復后，奉憲招徠復業，迄今廿余年，只以公所未復，旧規未整，是以同行無知之輩，每滋事端。尤甚者，織手拐帶絲經潛逃，負累經手，賠償甚鉅。其開賬織機，歇時亏空，一切等事，在在均關緊要。現今身等同行，已將云機殿公所建復完竣，并經手同人，將旧規重行整理，議款十一條，与号东料伙，咸有裨益。無非欲期息事免訟起見。此后如遇在議小事，即在公所理息，設非私理能了，再行稟求伸理，免致時煩案牘，頻生訟端。但下情虽已議協，深恐頑梗之徒，或意圖紊章，或心存阻撓，殊難逆料。身等系在公所司事，為此粘呈行規，并开具与議各級号牌名画押清單，公叩示諭遵守等情。當經前縣照抄條款，給示遵守在案。茲據民人叶守庆、陶本立、王啓全、侯茂廷、刘如祺、于本万、陳信泰等，以同業人多，賢愚不一，深恐日久玩生，妄思紊亂，不無讓〔釀〕事生端，致煩案牘。查前奉陸前憲批示，俟行之一二年后，果無窒碍，再予斟酌勒石。計蒙頒示，至今已及五載之久，既無窒碍，理合陳請示諭勒石等情到縣。据此，除批示外，查機業前立條款，既稱与号东料伙，咸有裨益，現在行之數年，尚無窒碍，自應共相遵守，合行給示勒石。為此示，仰

緞号机業东伙匠工諸色人等，一体知悉。自示之后，务各查照后开議款，共相遵守，公平交易，毋詐毋欺。倘有頑梗之徒，私心自用，以及紊乱阻扰，致生事端，一經被稟，定即按名提訊察究，其各懍遵毋違，特示。計开：

一、議各号料友恐有拐帶絲經、緞疋逃避地方。毋論远年近月归来，將前拐欠号內絲經、緞疋、錢文，償還清楚，方可生易。倘或不还，不准开賬交易。如別号承管被蒙，与彼来往，察出公議，究罰無辭。

一、議各料友，开賬时，必須詢明前織何号之件，歇时有無亏空絲經錢文，是否算还清楚，查明方能交易。倘或前途不清，即不能开帳。如有有尾欠外，承管情愿代还者，方准其开帳。

一、議各号料友，如有做粉、發潮、抽头、換籠、蒸糕等弊，被号內察出，循照旧規，立时剪歇無辭。

一、議各号料友，歇年开市秤絲，向章在清明以前歇，新絲至七夕为度，逾期不秤絲，照歇庄之式，号內貼料机，每張錢十千文，絲五兩，此款亦系乱前旧章無異。

一、議各号料友，倘或租机窩代料者，其人素有劣跡，向不安分，易于走失亏折号本者，真難逆料，必須承管明察暗訪，如有訛舛，立时將机范搬至号內，承管代覓料友接办。惟此款务須加意慎防，莫因获利，而反受大累为要。

一、議各号料銀錢，統归九九七大錢，不准暗搭洋蚨拾价，私抹料銀。察出公議究罰，仍照旧規一律。

一、議各号，無論生意好歹，如有机范出来，有無承管連环互保者，統归一律开帳，不准自行搭找料戶。如不遵議，察出照規究罰。

一、議各号料机，無論元淺头数若干，門面闊窄，統归牌号付給料銀，不得因生意稍滯，另改牌号，私抹料銀，察出公議罰。

一、議各号料友，如出入形跡有据，实系被窃，賠償一半，生意照旧。設遇鄰人不虞，協力救出，廸花范子，仍旧交易。倘救之不及，被燬生財衣物等件，亦照旧規，概不賠償。

一、議各号料友，始織头疋，如有小过不歇，凡为承管者，須認真訪察其人之行为手艺，可織何样緞疋，切勿以他人血本敷衍其事，自己受累。此款最为承管之要务，万勿疎忽，慎之切切。

一、議各号东料友，自今复整行規之后，謹守毋違，恐有無知之徒，紊乱擅改，公議罰。以前东友存欠未完，一切纏葛，此后概不追究。

張世富、于本武、朱国才、邓定学、蔣春陽公同勒石。光緒十七年七月初七日示。（原碑在南京博物院）

嚴禁跨舖濫用行帖碑 光緒二十二年三月

特用府、補用直隸州、署理江宁县正堂、加二級、紀錄二次翁，為給示勒石永禁事。據南門城內沙灣、新橋兩市，絲經行吳乾益、周泰來、兆昌、張益泰、協泰、信誠、恒大、豫丰泰、泰和、仁興裕、祥發茂、源生、生記、源丰等稟稱：緣金陵以絲經為大宗，部章以頒帖為裕課，禁令森嚴，職等遵例，在原請地方開張，一帖一行，不敢跨舖。代客買賣，公平交易，完課資生，並無私充跨舖，壟斷淆混情弊。近有游手之徒，于新絲登場，假捏絲庄行名，淆混于南門外及城圈內。借租門面，二五朋充，壟斷兜攬，收取行用。若輩既無行帖，或以他處行帖，跨舖假冒，新絲告竣，席卷他往。一經委查，人行兩查。控官稟究，亦莫伊何，職等捐帖各行，受累甚深。瞬屆新絲登場，若輩習以為常，仍舊營私，若不重申禁令，勢必廢弛胡底。抑且課食兩懸，經職等于三月二十二日，捐帖之家通業集議，凡開行舖戶，各在原請地段開設，不得跨舖違例。嗣後如有捐帖開行，先將藩示携至公所，邀請同業看明，坐何地段，以杜私充淆混之弊。有非原請沙灣地方行帖，遵例另請。違者稟請吊驗，一概更換地段，捐請換帖，不准跨舖，既杜私充，且保稅賦。惟查南門外及頭二道圈，未有稟領絲經行帖，甚至有他處行帖跨舖，亦有一帖兩行，一旦沿城內外，設行擺桌，私充跨舖，壟斷客貨，豈非違例藐法。為此環叩賞示，勒石永禁，再有違犯，准其鳴知地甲，起同絲秤，隨時稟究，等情到縣據此。除批示外，合行給示，勒石永禁。為此示仰縣屬絲行人等知悉，須知請帖開行，本系註明地址，一帖開設一行，不准跨開頂替，朋充淆混等弊。現今絲行吳乾益等，通業集議章程，嗣後凡有捐帖開張絲行者，務將示諭携至公所，看明地段，免致跨舖淆混。此系為力求整頓絲業起見，爾等各宜遵守，瞬屆新絲登場，倘有無知之徒，仍在南門外及頭二道圈，無帖私充，或一帖兩開，跨舖朋充，擺桌收絲，冒名頂替情事，准絲行吳乾益等，鳴知地甲，起同絲秤，指名稟縣，以憑提案，照例究辦。其各凜遵毋違特示。光緒二十二年三月 日示。發濟善堂勒石。（原碑在南京長樂路四聖堂十三號）

絲經業規定搖經料銀碑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十九日

欽加二品銜、軍機處存記、江蘇遇缺題奏道、大計卓異、特調江宁县正堂沈，為出示曉諭事。案奉督憲劉批，據經業王啓森等稟，以搖經料銀不敷工食，請諭充首事，設立公所，收捐濟用，議呈規條，請諭興辦等情。批府飭縣，妥議辦理，具復等因，并發原稟到府。率經前府飭據上元縣據情詳復，未及核轉卸事，本府接准移交。當查此項搖車料銀，一律五兩，前據經業楊耀嘉等，公議規條，稟由各前

升府抄录示諭，虽非定章，然已行之有年，豈容更易。嗣据王啓森等，援案稟。又經王前府，照案給示。所有搖車料銀，系各搖戶靠此營生，督先批示，其光景与各緞号有霄壤之隔，自应常年無分农隙农忙，每庄仍归一律五兩，以全艺民生計，而免偏枯之累。至該經業等稟，請諭充首事，設立公所，抽厘支用等情，既經上元县飭据絲緞兩業，公同議复，諸多窒碍，尚屬实情，应即毋庸置議。即經批飭上元县遵照。一面附繳原稟，詳請督先批示立案，并予給示曉諭各在案。茲奉督先批开，据詳已悉，仰即遵照，由府給示曉諭可也。繳原稟存等因到府，奉此。除札飭上元县，移会江宁县，一体遵照出示曉諭外，合亟出示曉諭，为此示仰絲經緞業人等，一体知照，嗣后尔等交易，每庄搖車料銀，無論农忙农隙，仍归一律五兩，以昭公允，而免偏枯。至所請諭充首事，設立公所，抽厘济用，既有窒碍，应不准行，尔等务各安守本分，以全生業而重商务，其各凜遵毋違，特示。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十九日示。（原碑在南京長乐路四聖堂十三号）

緞業公所碑 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初二日

欽加同知銜、賞戴花翎、調补江宁县正堂叶，为給示諭遵事。照得現据緞業公所职董張子林、魯源深、陈思忠、項瀛、陈能鎮、端木鴻鈞、龙觀揚、魏家驥等稟称：窃以江宁地方，向惟緞業商号，并附業諸色工作人等，較之他業人众号繁。現值整頓商务之际，亟宜創設公所，以期商業振兴。前由职董等，公同集資，首先創辦。在于治下絲市口正字舖地方，价买民房一处，以作緞業公所。当將原契呈蒙鈐印，發还交存职董等，永远执業在案。伏思創办公所，事关公益，自应与众共保，俾期历久勿替。謹抄呈公所房間数目，四址坐落地段，繪圖貼說，环悬給示勒石在案，俾免日久廢弛。再前項公所基地，創辦非易，守成尤难。現經职董等公議，將來無論同業在事經理与否，永远不准將此房屋印契，私行典杜質押，并徇情借及他業佔住应用，併請严禁地方痞棍，藉以酬神賽会为名，擅入公所，聚众滋扰，酗酒賭博，以及各項不法情事，俾期整肃，而免欺凌等情到县。据此，除批：据稟請將呈契公所房屋地基，給示勒石，俾垂久远，系为慎重公产，杜絕弊端起見，事屬可行，准即如稟給示，圖附牌示掛發外，合行給示，諭遵。为此仰緞業商董，並同行附業工作人等，一体知悉，所有緞行同業，集資价买絲市口地方房屋一处，現据該职董張子林等，开呈房間数目，四址坐落地段，稟請永远作为緞業公所产业，由該职董等公同經理，嗣后凡有同業在事經理之人，均不准將此公所房屋、印契、私行典杜質押，并借給他業佔住应用，以昭信守，而杜弊端。倘有無賴之徒，在于公所地方，藉以酬神賽会为名，聚众滋扰，酗酒賭博，以及各項不法情事，准由該商董等認真查禁，随时鳴知巡警、地甲人等，扭获送案，以憑提究

懲辦，該商董等務須安定商規，推廣公益，是為至要，其各遵照毋違，特示。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初二日示。（原碑在南京長樂路十七號）

緞業公所碑 光緒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金陵絲緞業董，奉江寧商務總會照開，案奉商務局照開，奉商督憲端批，本局詳復奉發民人涂鶴林等稟，搖經生業，受緞號欺壓等情一案由。奉批，如詳立案，繳原稟存，等因到局。捧此，合行抄稿照會，為此照會貴總會，煩為查照，希即轉飭遵照，等因。并另抄詳稿到會，奉此。相應轉行業董，請煩查照，希即遵照商局詳准督憲定案祇遵辦理；或刊碑公所，俾得永遠奉行等因，并抄詳稿內開：茲據絲緞業張益生等二十余人稟稱，近年搖經工資，逐次加增，車戶靡不樂從。惟王堃林，本非車戶，冀圖斂費煽惑，動謂尺線不得過一萬二千之數，屢次稟請，均奉批駁。茲奉批示，以後搖經工資，改為常年六兩，每年自五月至八月止，再加一兩合成七兩。商等工價改給加厚，原期一氣相聯，第防日久又起弊端，為此即請轉詳立案，等情具稟到局。司道伏查，車戶代行號搖經，自以貨物便于行銷為主。現在市廛既非一萬四千尺不能暢銷，該車戶等何能拘執成見，仍以從前一萬二千五百尺為言。惟車戶終歲勤劬，自不能不敷日食，目下百物騰（騰）貴，亦實有不得已之苦衷。但祇可爭論工資，而未便代定尺線，業經職局凱（凱）切曉諭。嗣后絲緞業各商，應給車戶工資，常年每月給銀六兩，自五月起至八月止，再加給銀一兩，以資車戶食用，其尺線當以一萬四千尺為準，以便行銷，庶几兩得其平。該商及車戶等，均已遵照，各安生業，市面一律安謐（謐），堪以仰慰憲廑。至王堃林煽惑生事，本應嚴辦，業已管押示懲，并取保結，以後改過，應請免其置議。理合繳呈原稟，具文詳請，仰祈憲台鑒核，批示立案，實為公便。為此備由，另冊呈乞照詳施行。茲由緞業公所，刊碑遵照，此立。光緒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原碑在南京長樂路十七號）

漂洗絲經糾紛碑 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

辦理江寧巡警商務總局司道，為出示曉諭事。案據緞業職商張裕泰等稟稱：敝業原料白色絲經，非經染業變色，凡倚緞業營生者，必相顧束手，而染業下河漂洗絲經，往往易起風潮。光緒十九年前督憲劉忠誠，洞鑒利弊，飭前上、江兩縣出示曉諭，除沿內河居民，傾倒糞穢，一概嚴禁外，惟各染坊漂洗絲經，春夏秋三季，准在內河各馬頭漂洗。冬令水涸，准于出城漂洗，該各染業自奉明示后，迄今相安無事。詎料上月下旬南四區汪巡官，忽然飭掣絲經，禁止在內河漂洗。各染業店東，聞風驚懼，熟商辦法，迄無善策。緣原料絲經變色，必用貝子、槐米、

灰、矾、橡椀，一併同入煮鍋，百沸之后，立即取出，趕速下河漂洗。絲絲經本質柔脆，一經百沸，漂洗必速，倘稍事遲延，將來上機，脆斷百出。惟冬令朔風嚴肅，尚可多延數刻。此前督憲劉忠誠，洞鑒及此，故定例春夏秋三季，准在內河漂洗，惟冬令水涸，始至外河之原因也。各染業東伙，均深悉此理。欲出外河則絲絲經受傷，成本甚鉅，必難受賠償之累。欲仍在內河，則巡官禁令森嚴，不能至河干一步。店東則盤額相告，眾伙則舍業而嘯，進退維谷，竟有倡議一律停工者。職商業雖屬號家，然原料所在，倘聽其停工，則原料無著，勢必牽連歇業。凡倚敝業營生者，亦必牽連而絕生機。事關萬民生計，實不忍坐視不理，昨特通知敝同業百余家，并招集各染業，苦口勸伊等，不得率爾停工，令全體牽連受害。一面會同敝業，一再研究，僉謂非力求改良，凡春夏秋三季，斷難變通至外河漂洗。迫不得已，惟有叩求轉呈商務局憲，移知警務局憲，切實研究，仍然查照前督憲劉忠誠所立條例辦理，則絲絲經既不至受傷，而職商等資本亦不至無着，是所厚望等情。當經本巡警總局，先行通飭，各區巡官按照舊章，暫准各絲絲經于春夏秋三季，在內河漂洗，一俟擬定辦法，再行飭遵。并照會江寧總商會，傳諭該業遵辦。去后，嗣准商會咨，據織業張裕泰等呈稱，奉照后，即與染業職商等，一再力籌兩便之法。查染業所用原料，半系葯籠中物，究非傾倒糞穢可比。惟一面漂洗，一面吸飲，究屬夾雜不清。省河水道，雖屬未盡通利，當春夏秋三季，子午兩時，潮脈尚屬流通，允堪藉以刷洗。應請春夏秋三季，當潮脈既退以后，未漲以前，為染業漂洗絲絲經之時。潮脈既漲以后，未退以前，為居民吸飲之時。經緯既分，則清濁自無混雜之弊。似較前案准于春夏秋在內河漂洗者，顯有限制。兩便之道，舍此蔑由。況敝業全體生計，維以染業為根本，然依敝業求生計，與敝業之自求生計，不下數萬人。然此數萬人，亦非專求生計，不講衛生之人，用特通籌辦法，敬謹上陳，以備采擇。且敝業更有請者，自兵燹后，染業在內河漂洗絲絲經以來，列憲欲清水源，令概出外河，皆以江南生計，恃此一綫，因而中止者屢矣。染業因漂洗絲絲經，釀成事端，已非一次，卒不能改良。自求安靜之道者，皆以顧全號家成本，賠償不起耳。惟蒙前督憲劉忠誠，飭府縣會同保甲局曉諭以后，敝業全體蒙庥者，歷十六年之久如一日。倘荷俯采芻言，即請移知警察局憲查照，并移請商務局憲，援案詳請督憲立案，通飭地方官并警察局，一體查照出示。請于早年稟定，春夏秋准在內河漂洗成案，特分界限，准予春夏秋三季，每日以黎明至中午十二句鐘止，為漂洗絲絲經之時。過此以往，系居民吸飲之時。倘非時漂洗絲絲經者，按照警章，分別事理輕重議罰。惟崗警不得并挈絲絲經，有傷敝業成本。以上各節，似于重申舊令之中，隱寓商民兩便之法。實緣敝業全體，共屬居民生計所在，講求衛生，亦當研究。似此變通辦法，明知與染業前途，

多所窒碍，而于衛生一面利益良多，兩利相權，染業中亦當勉就範圍，共食享太平安全之福。用特瀝陳所見，懇請轉詳立案，札飭地方官，出示施行等情到會，轉咨到局。又經會同據情轉詳在案。茲奉商督憲批開，如詳立案，仰即轉飭遵照繳，等因奉此。除分別移行外，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沿河商民人等，一體知悉。自示之後，務各遵照定章，每逢春夏秋三季，以午前內河潮水未漲，為染業漂洗之時；午後潮水已漲，為居民吸飲之時。冬季內河水潤，仍赴外河漂洗，彼此守定界限，兩不相妨，毋得稍有紊亂，致起弊端。切切特示。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示遵。發元淺染業公所，勒石永遠遵守。（原碑在南京博物院）

禁止盜織牌號碑 宣統二年正月十七日

辦理江南商務總局、兼管南洋保商事宜司道，為給示曉諭事。准江寧總商會咨呈，據緞業商張裕泰等呈稱，前以織戶趙姓盜織慶隆盛牌號，公吁懲辦一案。當經趙姓央請織戶同人，至緞業公所，自認盜織是實，情願甘罰龍洋陸百伍拾元，充作公益經費，并具切結請寬免究，等情到所。商等公議，以趙姓一時利令智昏，然尚知悔過，姑准照罰龍洋陸百伍拾元，以伍拾元充入商會，以貳百元充入崇仁堂賑粥，以貳百元充入寧郡工賑，以壹百元充入元寧自治事務所，以壹百元充入緞業公所。札范當飭領回，牌本存所備案。商等伏思金陵地方廖[寥]廓，織戶繁多，既往者或可不咎，未來者不可不防。前此張祝記盜織慶隆盛牌號，罰洋貳百捌拾元，未閱數月，茲又有趙姓盜織一案。倘不預為之戒，將來貪利之徒，保無再蹈前轍。為此公議，除由公所刊佈廣告，俾眾周知外，理合呈請給示勒石，以昭永禁。凡盜織牌號者，無論何人何字號，織多織少，一經查出，均照此罰加倍，無得異議，以儆效尤，而維商業等情。据此。查此案，前據該職商等呈控到會，當經敝會照會緞業公所，查復核辦，去後。茲據復稱，業經查明，趙姓委實盜牌，自知理屈，情願認罰龍洋陸百伍拾元，充作公益經費，并具結懇從寬免究。所有罰款，已由該公所如數照收，分別撥充辦理，尚屬妥洽。至所稱：嗣後如再有人盜織假牌，一經查出，加倍照罰，懇請轉咨，出示勒石等情。自是為嚴禁將來效尤起見，亦應照辦。理合據情咨呈貴總局，謹請查照，准予立案，并請核發示諭一道，交由敝會轉給，以便永遠遵守，實為公便，等因到局。准此，合行給示曉諭，為此示仰緞業人等知悉，嗣後如再有人盜織慶隆盛牌號緞疋，以偽亂真，一經查出，許由該商張裕泰等，指名稟請究辦，決不姑寬。其各凜遵毋違，特示。宣統二年正月十七日示。（原碑在南京長樂路十七號）

辛亥革命回忆录

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

楊 兆 蓉

編者按：楊兆蓉先生自 1905 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到 1911 年瀘州起义，曾参加了种种革命活动，这篇回忆录对研究四川辛亥革命提供了一些資料。如述同盟会与会党的关系；以余竟成为首的会党如何响应革命，在永宁、瀘州、江安、叙府等地屢次起义；此外說到滇川軍的冲突，及同盟会在南洋与立宪派的斗争等情况，均屬亲見亲聞，可供参考。

同盟会与孙中山先生之关系

1905 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革命办法确定，中山先生住东京领导进行，为避清使館偵查，住地屢迁，或旅館、或廖仲凱寓所、或宮崎寅藏家，無一定地点。日常往商要件者，除《民报》及各支部負責人外，其他来客亦多，久住人家彼此均感不便。黄复生告我：《民报》同志贊成租屋独居，惟日本警察条例，居民应將家長姓名写在門口悬挂之木制門牌上，若仍用旅館号牌上高野之名，知者頗多，耳目难避。于是改用中山平八郎；旋又改名中山樵。党人回国活动，即以中山之名作秘密暗号，無論何时何地，遇着疑是同党而不相識者，即以中山暗号問之。首問到过日本沒有？問时左手举起大指拇，右手擦右眉毛。彼答話时，如举起右手大指拇，以左手擦左眉毛，則眉指的暗号已响应而合。如云：到过日本，則以“中山”二字之日本話問之，知道中山先生否？如答未到过日本，則以中国話問之，一一相合，無疑的眞为同党，可与之商量彼此活动情况。

四川革命党人的活动

黄复生系川南师范学生，同学屏山邓絮字珥珍十九岁中清末后一科举人，留学日京，参加同盟会，与富顺雷铁崖办《鵠声报》鼓吹革命、隆昌陈道循字伯珩、黄光士字容九与复生、富顺曹篤字叔实、荣昌胡易字玉鸣、永甯黄方字鹿生、瀘州陈宝鏞字漱云、李鴻彦字琴鶴、梅箴字秉鈞及余等廿余人。因看書报，如湖南陈天华之《警世鐘》、巴县鄒容之《革命軍》与《浙江潮》、《新广东》，始萌革命思想，組織“輸新学社”为基础，得經学教習罗順蕃字次瀛瀘州人副貢举人贊助，为撰輸新社發起序文，其革命意义，略流露于文中。不能全記，尚忆其数句云：“在昔新亭聚泣，淚洒河山；長沙上書，憂深薪火。人杀尔父，吳夫差未敢遽忘，此非惡声，刘越石因而起舞。烏兽是蛮夷之性，难养其心；銅駝在荆棘之中，会当見汝。大江东下，鏡板銅琶；腸断心酸，一声何滿。”

社議創辦鉛字印刷局，翻印書报作宣傳品，派社友赴日本學習印刷，黄复生願往。当时陈宝鏞、陈道循为学社正副社長，与复生皆第一期学生，畢業后二陈即赴日留学。时社中經費尙未集合，派人學習印刷之議，未果行。黄光士与余繼任社長，始实行原議。甲辰秋資送复生往日，嗣知印刷部有石印、銅版、照像版等类，不只鉛印一門，非一人之力可以兼学，續資派社友宜宾刘永言、富順范秋嵐后在川边活动为赵尔丰所杀于乙巳年（1905）与余自費同赴日本，均即时参加同盟会。复生負《民报》印刷責任，以数千留学生，只他一人学印刷之故。

瀘州会党首領余竟成，为武秀才，有革命性，常携《警世鐘》、《革命軍》二書，講演于茶酒肆。清吏派差役禁止，差役皆彼兄弟，密請大哥讓步，遂輪赶乡場講演，差役知而不問。复生与余等在川师讀書时，即知其事。余同复生、永言、秋嵐、宝鏞联名写信，劝其东遊。彼毅然到日，加入同盟会，引見中山先生。見其魁梧奇偉，言論風生，大为器重。付以打通川、滇、黔会党之責，狀委为西南大都督；派同井研熊克武、自貢謝奉琦回川，共策进行。竟成名俊英，参加同盟会时，以俊英系考得武秀才之名，乃去俊字名英，表示与清廷断絕关系。在日本动身时，章太炎、宮崎寅藏与之同照一影，以留紀念，而資鼓励。宮崎並

贈倭刀一柄，以作护身之用。与熊謝回川，設秘密机关于瀘州小市綾子街邓西林宅。邓名邦植，系文秀才，亡父潤章为举人，山西知县，借其門第掩人耳目。竟成与熊謝分赴川东南各州县活动，以瀘州为策源地。熊謝往来于瀘，皆宿邓宅，于是革命进行，大为活动。巴县楊庶堪、滄伯、朱之洪、叔痴、富順謝持、慧生、曹叔实、易倩予、荣昌張培爵列五、江津卞劍夫父子及川东南人士，先后加入同盟会者，数以百計，会党中人尤多。四川之革命，从此發軔也。

四川党人在西安活动之点滴

1907年余竟成、熊克武、謝奉琦回川后，余同永箠楊維華友，冬初回上海，駐湖南招待所，系湖南同志刘道一之弟刘某所办，借以联络各省党人者。未几，道一在湖南被逮系獄；刘某为租界中国偵探捕去，寄禁巡捕房，要求会审公堂引渡，並封禁招待所。余与楊維商請中国公学财务干事，江津同志孙鏡清出資聘英国律师，于会审时出庭辯护，結果外国法官拒絕中国法官之請求，得不引渡，招待所如故。

旋黃复生同內江李異文由日返上海，同住招待所，与余和楊維，本計劃中分批回川活动者。余因陝西蒲城同志井勿幕回陝活动，以陝西同志無多，彼一人之力有限，挽荣县范夔渭漁与余，同往协助。范为成都武备学生，畢業后，全体派赴日本考查陆軍，加入同盟会者三十余人，范已授陆軍协軍校之职，組織新軍时，可望任营团长。余既有陝西之行，复生、異文、楊維先行回川。

余与范允井之約，井即先归。余偕范于是年除夕日到西安，住井之商号，井为蒲城財东，山陝称富室为財东，故井之先輩，在省設有商号。四川川东道張鐸曾借井父之資捐官，井到張衙門收債，遂由重庆赴日留学，时陝西留学生甚少，加盟者無多。

是时清廷在西安办有陆軍小学一所，並成立新軍一标，成都滿洲駐防雅云舫，系武备速成班畢業生，任陆小监督兼新軍标統。雅因捐內閣中書，赴京引見，稽延未回。井欲乘此机会，以范繼雅职，掌握陝省兵权。余以为应先接洽四川同乡官，以壯声色，因省中要津，首府、首县、警察局及高等学堂、师范学堂、法政学堂、警察学堂各监督，如

楊瀛海、徐子休、傅彤澄、刘某等及長安县高小校長，皆四川人，声勢煥赫，極一時之盛。尤以新設之洋务局，为当时新政之外交机关，总办为华陽进士文龙，系候补道，乃同乡官之最高者。由高等学堂日文翻譯永箠同志陈紹封改名公恂，輸新社社友託洋务局英文翻譯兼高等学堂英文教習，候补知县，万县王宣笏介紹余与范往晤文道。文为人謙和，曾来寓所答拜。因此哄动一般耳目，并得以运动蒲城名孝廉張拜云，参加同盟会。張为范繼雅职甚努力，盖張有一門生周某在北京，以进士而任監察御史，最近奏參陝西布政使樊增祥，上諭离职留省，听候川督錫良查办，官場皆認為張之指使，对張異常重視。陝甘总督升允，赴任过陝，以三千金聘張入幕。为新設提学使某，以楚才晋用为可惜，留办劝学公所，掛牌飭潼州府筹款三千，送还升允总督。后張又兼西潼錢路总办，原总办为徐子休，此路系樊增祥任內倡办，当时徐以西安府尹昌齡之力得任师范学堂监督，說樊派遣留日学生三十名，由徐送日本，徐回省又說樊办西潼錢路，樊以徐兼总办。樊离职后，官場以川人之盛，皆樊一手造成，排川之風，于是乎起；尤以徐为目标，徐因而辞职回川，張得兼徐之兩职。

陝西巡撫曹鴻勛，系山东狀元，初信任樊增祥，一切措施皆樊之計劃。樊去职后，信任鹽道張某，湖南人。張道以拜云为同宗，往还甚密，拜云說張道推荐范繼雅职，曹撫允諾。文稿業已判行，陸軍小学提調杜俊明聞知，面稟曹撫，以長江捕拿革命党为詞，請加考虑，因而中止。

杜为綿竹人，候补知府，时以陆小提調代行監督职权。其侄杜周，以候补佐杂派赴日本考查政治，归而得差。俊明初遣其来寓所，轉达彼意，拟代聘范任陆小体操教習。范以正謀繼雅之职，不能小就而妨其大者，未允。二月初二，四川会馆同乡官团拜、演戏宴会，欢迎余与范参加，同乡会总裁为樊增祥，以彼随父宦，住川多年，認四川为同乡。陝省新政皆彼主張，傳說有复职之望，面告余与范，可在此多盤桓些时日。席上文道与杜作陪，杜旧事重提，范答以体操乃下士卒之事，陸軍所重者为軍事学，回問学堂軍事学分科情形，杜不能答。当文道宪台在座，杜面赤难过，因此不滿，后来破坏已成之事，非無

故也。

謀奪陝西兵權之事不成，井商辦端本學校，作秘密機關，留范任體操，以待時機，余決意回川。辛亥革命，民國告成，井為陝南道尹，胞兄崧生，采國術專家，任師長兼陝北鎮守使。南京政府成立，中山先生任大總統，委熊克武為蜀軍總司令，回川時，調范為蜀軍第一團團長。一日余同范赴文道公館辭行，文云：“近來南京捕禁候補道孫毓筠，系壽州相國孫家鼎之侄；漢口又捕禁胡瑛，傳說都是革命黨，聞四川黨人有不便由長江回川，繞道陝境者。”文以真誠待人，暗中示意，殊為可感。

永甯首義之失敗

余留陝數月，一事無成，三月下旬由西安首途，從大北路回川。四月到成都，時黃復生受聘府中學日文翻譯；李異文受聘鏡道學堂算學教習；其他外縣同志在省任教或機關職務者亦多。復生告余，數月來收的學生暗導入黨為收學生三百多人，星期日來校寫願書盟書者甚多，頗有風聲，囑余暫代主盟人，避免一時。余住客店，於是來店入黨學生周流不絕，鏡道、師範、法政各校與陸軍小學都有，尤以中學為多。住省月余，計在百人以上，如後來省議會之副議長郭雲樓，其著名者。復生又云：陸軍弁目隊招考，當局以川東南多革命黨，大量收取川北人，川西人次之。凡投考的黨人，囑其填川北或川西籍，由我通知武備同志任教官者，驗看時暗中為力。已考上一百多人，冒川西北籍的頗多，據此可見當時趨向革命之一般。

未幾，熊克武與瀘州武備生休學的黃子休到省，謂余竟成準備端午日起義；因瀘州舊俗，官民俱出城看龍舟競渡，只空城一座，垂手可得，囑省中同志預備響應，並向復生要炸彈。復生約集省中同志，星期日在草堂祠開秘密會議，到會有張培爵、陳伯珩、黃金龍、林冰谷、李異文、余培初與武備代表龍灼三、黃冰如和余等共二十餘人，僉以時間太迫，省中毫無準備。武備代表云：新軍須待弁目隊畢業，有了下級幹部方能成立，購回外國械彈，存在庫中，縱能奪取，無兵仍是無益。復生云：“帶回製造炸彈藥品，存在內江李異文家，往取須時，製造亦來不及。”決議請熊黃回瀘轉達竟成改期，予以從容預備時間。

克武、子休回瀘，瀘州同志知余到省，一再函促速归，商議今后进行。富順袁阜倩同志，前送該县入党願書盟書來省，約同五月赴石橋，僱舟而下，至富順上岸，晤謝慧生于县高小，渠为校長，談近狀一日，囑其派代表來瀘會議，原舟返瀘。时楊維、張治祥及嘉定罗杏書先后回川，同至江津会党首領刘天成家吃喜酒，因刘捐一武职，在家宴客。克武、子休亦到，会党中人來者尤多，杏書为各同志撰送一賀联云：“博得一官，轉瞬有天空世界；归来万里，息肩看草澤英雄。”宴罢，治祥、杏書赴成都，楊維同克武、子休來瀘。未几，富順代表鄒峯三、袁阜倩、隆昌代表薛瀛海民國三年，袁世凱捕杀党人，为周駿師長兼鎮守使杀于重庆。到瀘。敝屬代表同謝奉琦亦至，指定金台店为招待所，与瀘州同志等十数人，在該店开秘密會議。竟成与邓西林提議，永寧黃方鹿生，有小孟尝之称，彼之力量，可以集合敝永一帶会党，兩次派人請其出助，彼虽贊同，以將有广西之行为辞。楊維以鹿生虽是連襟之戚，尙未会面，到会者多知鹿生与余为川師旧同学，又是輸新社社友，推与楊維、熊克武同往劝駕。

余恐鹿生急于广西之行，先發一信，請其稍待，有輸新社要件面商，然后起程，至江門。楊維往省其舅父，因数年未見，暫留。余同克武先行，到興隆場，鹿生欢迎住其家。見彼整理行裝甚忙，因彼胞兄仲宣与广西巡撫張鳴岐系旧交，以举人委署凌云县知县，函囑其送眷屬到任所，准备日內动身。彼云：“如不得余信，業已起行。”又見其門前貼有新捐州判紅报，觀此情形，余与之密談兩日，彼慨然曰：“前日余竟成、邓西林，兩次派人來邀，以茲事体大，非其人不克負荷。今而知中山先生真先覺者，正与輸新社宗旨相合，从前苦無人領導，今得人矣。”毅然加盟，广西之行作罢，当託其堂兄寿宣护国之役死难川西，退僱赴桂轎夫。第三日，楊維來同進永寧城，晤劝学所視学馬九成名圖，在日本加盟者，說明往金鵝池活动計劃，託其随时报告城中消息。

初永寧会党分兩大派：曰成会，曰义会，兩派水火不容，常糾合数百人至千人械斗，俗呼斗龙，各奉天主福音兩教作护身符。清吏以双方皆是教民，無可如何，瀘衛、大堤、長官司、九司城、葛家墳、苗溝一

帶为最甚，各持械赶場，逢着便打。赵尔丰署永甯道，稟准剿办，先从苗溝下手，杀二三百人。此風稍減，决定利用此机，集合会党起义。用万国青年会名义与兩派調和，並曉以汉流大意，暫拟簡章十数条，推熊克武騎鹿生之馬，一日赶到瀘州，在开智書局鉛印数百本，以三日为期赶回。因此党人中傳說熊克武脚大善走，一日能行二三百里，即指此事。

計劃确定，同往金鵝池楊維旧宅，照議进行。鹿生、楊維之妻弟赵鏡桥，系金鵝池人，由自流井树人学堂暑假归，亦自願加盟。先由鹿生召集会党首領数人，詳解汉流之發源和大义，乃大覺悟，由他們推出代表四人，持青年会簡章，各給路費銀二大錠，分四路出發，每路要會員一千人，預定八月十五中秋节到城，开成立大会，即佔据县城起义。

分派出發后，即用密語电知黃复生，速来鹿生家制造炸彈。时当暑假，复生即辞成都府中学聘，携炸彈葯品及应用胆瓶漏斗等器，並約嘉定稅昔疇同到鹿生家，开始制造。需用之酒精，由馬九成向敘永府中学借蒸溜机自造，因楊滄伯任府中監督，朱叔痴任监学故也。

制造彈壳，盖与盒須用螺旋相合，一般鑊匠不能制螺旋，复生故約昔疇同来。昔疇为国术專家，又精鑊工，过瀘購有鋼条，作造螺旋鋼錯之用。鹿生在青山岩有土佃一家，系鑊匠，昔疇往往其家，專負制造彈壳之責。

一夜，复生因收炸葯入瓶，葯末凝于鑊籤，將籤在瓶口一抹，轟然一声，炸葯爆發，房屋震动，复生受重伤倒地，滿面皆血。鹿生坐案側床边看收葯，倒于床上，伤較輕。克武正捧面盆清水置屋隅，同余漂洗瓶內炸葯，距案較远，伤甚微。楊維因事入城幸免。案上硫硝酸瓶、胆瓶、漏斗尽炸成細砂，灯燭尽灭。鹿生五兄聞声，持灯入室，見此情形大駭。克武同余囑其急遣僱工赴青山岩，速昔疇归，彼精国术，善中医外科。昔疇日夕調护，复生得不死，鹿生亦無虞。数日楊維来，謂城中傳說兴隆場夜間發大声甚怪，街談巷議，不知何事。半月后，城內馬九成、楊滄伯、朱叔痴專人送信云：清吏因街巷傳播兴隆場夜發大声事，派差偵查。嗣在乡場捕得持青年会章程运动会党二人，疑

是革命党所为，与兴隆场有关，未得口供即时杀害。並出示禁止集会結社，促我等速走，迟恐禍及也。

于是复生、鹿生、克武、楊維、昔疇与余六人，一同离鹿生家，先到瀘州商議今后办法。此次首义中途失败，虽然牺牲两个忘却姓名之英雄，但創造了四川革命史第一頁。

瀘州江安起义之失败

黄复生、黄鹿生、熊克武、楊維、稅昔疇同余六人，到瀘州前，适余竟成發生事变，因此，不能在瀘久住。复生因炸伤眼目頗重，赴渝就医，伤愈始改今名，取死而复生之意。熊、黄、楊、稅四人，尽得制造炸药諸法，携药品往嘉定昔疇之叔尊三炭厂制造，沿途貼“收买雄黄，楊寓在嘉定稅卡隔壁。”暗号紙条，便于同党来訪，余留瀘为竟成計劃善后。

先是余竟成自日本归，活动区域甚寬，風声甚大。会党以为革命是想做皇帝，有称他为余大王者，尤以广船橈夫，傳播更远。盖川河大船，到宜昌的呼为广船，上自敘府，下至宜昌，橈夫以千数計，都說：“余大哥的星宿現了，不久做了皇帝，我們就好了。”时瀘州知州楊兆龙，設計欲誘而捕之。因他过去曾为州衙堂勇管帶，片請其到衙商議公事。竟成至衙門，見警衛森严，大堂和側門及客厅均有持槍堂勇，双位站崗，堂勇皆竟成旧部，見竟成来暗遞臉色。兆龙出見，神色倉皇，坐談几句话，即告便入內。后知疑竟成敢来，必有准备，若即时下手，激动事变，安危难卜，乃入商刑幕。兆龙入內，堂勇强步与竟成耳語：“大哥还不走。”竟成即快步出大堂，差役头目迎來密語：“大哥水漲了，快点走避。”时近黄昏，竟成即脫下長衫，以青綢腰帶裹于头上，化裝走避文庙戚家何姓院內。兆龙再入客厅，見竟成已去，立即發令追捕，然已無济也。

竟成当事变前，其母臥病在床，及聞清吏捕拿其子消息，大受惊恐，不久即死。余母死后，竟成国仇家恨齐集胸中，急欲起义，告余曰：“前之未积极起义者，徒以有老母在耳。今已死，我無顧慮也。”余密告此情于成都，得复書，訂十月初九西太后生日，請文武官員，皆

于前夜齐集会府朝賀，各府州县皆然，只須几个炸彈，可以一網打尽。預定成都、瀘州、敘府同时起义，囑先为准备，敘府方面，由謝奉琦負責筹备一切。于是余与竟成着手准备，由竟成派人分往各处約集会党，先期到瀘，听候分配。各地会党得信異常欢躍，九月二十后，先后到瀘者已三千多人，皆裝扮行商小販，或卖草鞋洋火；或卖鋼針麻線；或为購買物品行商。城內外及小市旅店，为之住滿，並有寄住大小兩江对岸附近农家者。尤以兩江大小木船橈夫，磨拳擦掌，听候大哥吩咐，人数虽多，品类复杂，常有出入茶館酒店，因細故与人口角滋鬧者。距預定起义日期，尙有旬日，难保無洩漏情事。余商竟成約各路头目密議，設法約束。众皆一口同声，約束甚难，只有改期，提前發难之一法；不然恐不能保其中途生变也。情形若此，遂改期十月初一，用密語电知成都、敘府，說明情况，望其提前响应。

余与竟成协商起义办法，以瀘州为大本营，江安为外援，計劃如下：

一、瀘州城內，道台、知州、都司三个衙門和鹽局，由附近旅店所住会党擇其一处，先用石油浸湿被盖，于九月三十夜三更起火。城中会党見火起，各于所住旅店向較近之衙門进攻，道衙亲兵、州衙堂勇和差役、都司衙治兵、鹽局安定中軍，事前同情之同志出而內应，並分派开城及破毀監卡，放出犯罪被禁之人。

二、住城外之会党，船上之橈夫，分一部在忠山三官祠一帶，燃燒柴草以壯声威。一部入城会攻各处衙門。

三、住小市和南岸之会党，預备牽藤，見城內火起，分一部燃藤，巡迴吶喊，遙作声援。其余渡河进城，协助进攻。

四、各路会党，由各首領編队自帶，統归竟成督率，夺取各官署。

五、江安城外，为南路巡防軍統領駐紮营地，內有哨官刘安邦江安事敗，变姓名充赵尔丰“戈什哈”（滿洲語如陸軍之弁兵头目）隨同入藏翼有所圖，为人揭破死难。豹九成二人，先在瀘加入同盟会，常来瀘問革命进行情况，甚为热心。江安起义，以刘豹为骨干，程德藩同志助之。城內火起，刘豹即率队入城救火，佔据县城，次晨率队乘舟，順流来瀘，作为外援，並扩編部队，进攻鄰县。

六、江安城内一切准备，以县衙刑房典吏戴皮为主，与李姓同志及其他党人，共同办理，和刘豹二哨官同负起义责任。

七、函知隆昌黄金鼈、黄容九、薛瀛海、富顺曹叔实，会同筠连曾省齋，集合同志和会党在富、隆、瀘之間預謀响应，扩大革命战线。

计划决定，一面派人通知江安，照计划预备；一面通知嘉定按期分送炸弹，以备必要时之用。并与竟成商定，临时邓西林、姚星瑩、黄子休、張子牧、李子鈞等，偵查接应于小市。余与席乾生往石礪，策应江安、瀘州兩地。

九月三十晨，余偕乾生赴石礪，在三岩腦渡河时，值江安刘安邦差兵送信来，謂准备完畢，到时即动。余告以策应地点，有信送此。乾生系瀘州富室，此次起义用費，皆彼負担。

当夜，江安事先敗露，因戴皮有一野妻，另住一室，野妻又私通有人，其人欲謀独佔，苦于力不敌戴。当戴購買柴草石油，作起火之用时，其女同情革命，来室堆积空屋中。是日戴囑野妻，携貴重衣物寄宿戚家，野妻再三問故，戴以实告。野妻又轉告私通之人，其人以机会难得，嗾使其密告县衙，戴必法办。县令初聞密告，疑信兼半，尙未查究，及見火起，認为果然，乃閉城門拒絕防軍入城救火。一面派人分头灭火，一面亲率差队严查客店，当获行踪可疑数人。並得安民布告，墨跡未干；又聞初更前防軍有人遍問各客店，有無瀘州来的楊黃二人。遂即時刑訊所捕諸人，供出余与黄金鼈二名及本地有关人士。除將本地人按名拘捕外，因江安是瀘州轄县，案情重大，立即电稟瀘州知州，是夜所捕十数人，一齐杀害，連同戴皮及其女公子以高籠吊死，共計十五人。

瀘州知州楊兆龙，以余竟成前日漏網，常有戒心，得江安急电，立刻关城門同道台、都司各派大队，荷槍持刀，澈夜巡查街道；並鳴鑼傳諭各客站，一律閉門禁止客人外出，違即捕究。因此城內外情形不通，官府又有防备，竟成不敢动。

是夜赵鍊桥由嘉定僱小舟赶送炸弹至江安，傍晚到河边，只身先入城訪問，在客店代写安民布告，迄火起城閉与程德藩跳城，出乘原舟，当夜到瀘。見城門紧閉知道事洩，在小市邓西林家宿数夜，得其

失敗情形，將炸彈交西林而去。

余同乾生當夜見火光冲天，往河邊察看，知為江安方面；而瀘州方面毫無火光。次日石礮場期，趕場人傳說：“昨晚江安大火，聞拿着革命黨多人，有人說都殺了。瀘州城內，一夜都有兵巡查街道，聽說亦是在拿革命黨。”又有人說：“恐怕是余大王想做皇帝，要造反呢。”謠言不一，料知情形不佳。

第三日得川師同志蔣星輶信，知道城內戒嚴情形，全由江安事敗，並云，老長（余竟成）于次晨，集合各頭目，駕小船在草鞋沱江中密議，眾皆主張再舉。老長以江安事敗，外援已絕，清吏防范甚嚴，冒昧再舉，乃取敗之道。我們逃走甚易，瀘州各同志皆文弱之輩，各有身家，不忍見其坐而待斃。有云：“大哥還怕死嗎。”老長立即投江，眾乃救起，一同率部向合江先市方面分頭退散。老長派其親信兄弟劉成忠，面告散隊情形，囑即通知余等。後來成忠自首，與竟成一同死難。

余得蔣信後，乾生以他不為官府注視，可以回城。余赴敘府面商謝奉琦，殊因江安事變，清吏于敘城同時嚴加提防，謝云：“從前運動入黨之防軍管帶舒星之，以一營之兵力合同南六縣會黨，與城內學校學生和同志等，力量甚厚，敘府一城，不難取得。現在星之奉調移駐屏山，已于昨日全營開拔，預計之基本部隊既去，力量薄弱，只好中止。”真是一着之差，全局皆敗，乃將瀘州、江安、敘府各情，用密語電知成都。

未幾，乾生、星輶來信，謂川師監學易倩予，探知江安電稟，內有余與姓黃之名，州牧因余過去曾以受聘楊維，籌辦家族學校之詞，辭彼勸學所勸學員之委，已行文永寧，查余行踪，囑切勿歸。余以不歸非辦法，乃商同敘府劉永言來瀘，面見瀘州中學監督羅順蕃，託言劉以輸新書局事到永寧挽余赴敘府，查收彼帶回石印機全部，並商量書局應如何開辦，因此離開永寧。楊維之家族學校，不能兼辦，即時停止。余與劉見羅時，羅大驚，問從何來。余答以上情，並云：“輸新社當時得先生贊助而成，永言由社二批派往日本學印刷，合同上先生亦簽有字，不忍中途拋棄，辜負先生提倡盛意。”羅微笑曰：“你們的事，我已知道，既同永言回來，安心在家住着，切勿擅離，我當向州尊說明情

形,想無他事。”于是刘暫住我家,得罗面告,州尊之疑已釋,刘始回敘府。

不久成都消息傳來,失敗情形不詳,赵尔丰捕得党人多名,如何办理亦不知。冬月,赵尔丰布告貼出,拿获党人黄方、楊維、張治祥、黎靖瀛、王柄章、江永成六名,永远監禁。在逃余切,奏請通緝。按余切号培初,逃往山西,改名公孙長子,善方笔書,頗有名。幸余与楊維分別久,清吏已知,可以仍在家安坐。

腊月赵鏡桥由永寧来瀘,住我家,謂鹿生、莘友在獄中,獄吏頗优待,能看書写字,此次回家,系代他們筹款,預备獄中用費。当他二人之田各得百金,以一半交黄寿宣,在省开一葯店,就近接济他們。一半交他二人作日常零用,談及成都当时情形如后:省中同志會議,決定办法,武力分为五部:

一、临时新軍 以武备同志为骨干,成都軍械庫是武备同志守护,弁目队是他們任教官訓練,事前准备开庫,發出械彈交弁目同志,組織临时新軍。龙灼三是武备同志代表,推他負責。

二、临时学生軍 省中各学堂学生加入同盟会者,以千数計。張培爵是敘屬中学教習,平时与学生們往还甚密,推他負責組織临时学生軍,械彈由軍械庫發。

三、防軍 防軍內官兵大多数是会党,聯絡工作平时黎靖瀛、余培初在做。据說省城和附近各县,已經聯絡的有三四千人,由他二人負集合和分配任务之責。

四、会党部队 川西会党以上五县为多,尤重义气,有負义帶过的,不是派人暗杀,即开“草坝場”會議处决;有“自己挖坑自己跳”办法,規律甚严。靖瀛、培初与他們早有聯絡,覺悟汉流来源,知道革命大义的各碼頭都有,数在五六千左右。事前他二人約其来省集合,發以軍械庫械彈,組成会党部队。

五、獵戶 灌县山溝以內汶川[县]、茂州、懋功[厅]、理番[厅后改理县]、松潘[厅]五厅州县,都是大山,獵戶很多。他們打槍准头很确,百發百中,山內同志与他們有关的,可能集合三五百人到省参加起义。

熊克武、楊維、黃鹿生与錢桥，分負接应各路之責。謝持負偵查消息，傳達各路之責。省中大吏，因江安事变，当夜朝賀地点改在丁公祠，附近街道派軍警戒严，不准行人通过。先往会府偵查的人，查得此情，並知城門已閉，回報謝持。彼認為事情敗露，官府有备，亲往各路阻止勿动，改期再举。殊成都县令王寅伯，先派人查得东大街、走馬街、青石桥客站住有大批党人，亲自帶領差队，將黃方、楊維、張治祥輯五、王柄章述槐、黎靖瀛、江永成六人一齐拿获。余培初逃脫，在他箱內搜出党人名册，傳說按名捕拿，情形異常緊張。各学堂学生教習，紛紛走了很多，課亦停上。胡雨嵐太史，是創辦高等学堂的人，目觀此情，不忍坐視，召集省中各老乡紳开一會議，八十多岁的老翰林伍崧生亦到。胡太史認為政治不良，青年学子欲謀改革，总是爱国。若加以大逆不道罪名，动辄杀人，深恐以后激动的事更多，不堪設想。众推胡太史拜会首道賀綸夔、首府高增爵，請他們轉达赵护院，說明各乡紳之意，以和平办理为宜，不可操之过急。因此，赵屠戶非杀人不可之心，得以緩和，乃从寬办理，以永远监禁結束此案。赵过去好杀人，在永甯苗溝，杀了几百人，故人以屠戶呼之。

錢桥劝余，赵屠戶性情难測，以出川为上，留銀一大錠作路費，始分別上省。未几，川师监学易倩予来家密告：赵尔丰偵騎四出，聞有名單，按名偵捕，促余速走，迟恐禍及。余于腊月十三动身，走上海；旋熊克武、余竟成、謝持亦先后到。翌年，得乾生信，謂余走后数日，赵尔丰高級偵探来家，云与余系旧好，有要面商，在家住候至正月初五始去。

克武、竟成正月重到日本，四川同志李肇甫、張冲等，集資購手槍数十支，交彼二人暗帶回川，圖謀再举。二月返上海，克武偕嘉定廖云从騰霄、合江王端書先回川。竟成以余离瀘后，有赵尔丰偵探来家坐候之事，劝暫勿归。謝持赴陝西，为鳳翔府知府尹昌齡撥荒地数亩办畜牧，約四川同志多人，前往合办，四川同志之有“实業团”一派始此。

三月竟成約同自貢李新琪質生、本邑徐琳琢成回川，后来与克武和程德藩、稅昔疇、曾省齋、陈云久、張超伯、廖騰霄、罗杏書諸同志，先后倡义于广安、嘉定、敘府，皆失利無功。嘉定之役，轉战数十里，死

难同志如德藩、騰霄，及会党約二百余人，是为四川革命牺牲之最大者。叙府之役，竟成敗走断蛇坡被防軍所捕，为叙府知府宋联奎杀害。

中国革命党在南洋的活动情况

竟成、克武回川后，余得爪哇三宝壟陈宝鏞来信，約余往彼处，乃决定赴南洋。五月偕兴文、陈餘庆同往，至香港上岸，候船到新嘉坡，晤《中华报》負責同志馮自由，此报系本党机关报，传达海內外消息者。自由告余，中山先生正由美洲回新嘉坡，余与餘庆上船时，自由即电知新嘉坡中兴报館，船抵海岸，中兴报館派有人在岸招待，住报館內。次日，胡汉民、汪精衛来，同往郊外別墅見中山先生，問四川革命情形。余一一詳答，並告以赴三宝壟事。先生云：“很好，革命活动，海外国內都是一样。南洋情形汉民、精衛慢慢告诉你，活动时方有把握。”留同便飯后与餘庆回报館，在館內同住的有湖北田桐字粹琴别号根海与汉民、精衛同負編輯之責，常有論文登載。汉民、精衛与中山先生同住別墅，精衛每日来館，核稿付印外，並料理館內一切事宜。汉民不常来，在館內住月余。

华侨到南洋，年代久了，汉話說不来，汉字認不得，只能說几句福建、广东的家乡話，普通是說馬來話。戊戌政变以后，康有为来南洋，他是广东人，与华侨說家乡話，說他是光緒皇帝身边的重要大臣，帶有衣帶詔来的。华侨在南洋一二百年，未看見过中国大官，就开会欢迎他。康有为乘此机会，在南洋發起一个保皇会，华侨紛紛入会的多。入会的要会金，又制出会章，收会章費，以后中国来的大官，不管有多么大，帶着会章去見他，可以与他坐着講話，並不下跪。又劝华侨办中华学堂，讀中国書、学認中国字、学談中国話；又劝华侨办华商总会，与中国的商会取联络；又办汉字中华报，传达中国消息。从此南洋华侨办学堂、办商会和办汉字报，大点的地方都有，尽量派他保皇党徒去帮办。所可取的，以孔子紀年不用清朝年号，差强人意，与革命宗旨暗合，聞康有为取得的入会金、会章費，数在二三百萬。

中山先生到南洋，派同志到各埠把华侨祖先的历史講出来，你們保皇不但忘了汉人的仇敌，並忘了祖先的仇敌，忘了汉人的仇敌为不

义，忘了祖先的仇敌为不孝。华侨猛然觉悟，將保皇党逐渐推謝，由本党派同志去接办学堂、商会、报纸。赴爪哇三宝壟前一日，与中山先生辞行，他問：“南洋情形，你們还有不明白的，可以再問。”留吃便飯，諄囑：“各埠保皇党如不肃清，总是本党障碍。”飯后握手而別。

到三宝壟时，宝鏞是同湖南同志陈方度、柳聘隆同住，余等共住一处，知道此地情形甚好，保皇党無一人在此。三宝壟是爪哇中部大埠，爪哇东端是泗水，算是大商埠，西端是巴达威亞，政治中心，有火車貫通三埠，交通甚便。余在此住了一段时间，同餘庆赴泗水，該地情形大佳，有一与本党接近而有力之华侨，掌握此地商务、学务。商会办的汉字报，是本党同志主編，学堂是湖北同志張步蟾主办；另有張之同乡三人，一名朱侗，二人忘其姓名，皆同志。此外有浙江人两个，虽非同志，但非保皇党，他們宿舍，同住一幢兩層高大方正洋房，楼下客厅宏敞，余与餘庆同住此室。此地华侨資助革命，动以十万数十万計，毫不吝惜。一次汪精衛在文島开会筹款，会畢，华侨签名捐助，立得十数万。在文島活动同志，为湖南李柱中。李号鐵仙，辛亥回国，在長江活动，弟兄三人均称司令，李改名燮和。南北統一，兄弟三人皆授陸軍中將，人有一門三中將之称，惜其晚节不終，袁世凱洪宪帝制，为筹安会六人之一。

不久，餘庆往沙橫办学，余赴井里汶办学，井里汶是爪哇第二王都，但地方不甚大；然通火車，为爪哇二等碼頭。学堂有学生三百多人，先灌輸学生以革命思想，由学生轉輸于家庭，逐渐推动于無学生讀書之华侨人家，日积月累，革命思想自然普遍傳播。住了一年，情形尙好，学生及其家庭都有轉变，並有几个很好学生，課余常来談論；更有一个家長，能作詩，时与余倡和。田梓琴来此考查，約住一月，放心而去。第二年因患胃病，病勢頗重，遂离校往三宝壟养病。时宝鏞因其父宦遊云南，家中無人，决定回家。到上海时，值黄金鼈为清吏不容，由川来上海，宝鏞告以南洋情形，彼即来爪哇。时余养病三宝壟，彼与余同住一处。

养病时，得知爪哇第一王都日惹为保皇党健將楊某盤据，楊之名忘却，該地商会文牘，学堂校長、报纸主笔，皆握彼手中，一人兼任。余病好，遵照中山先生临別非肃清不可的話，設法办理，先插足学堂

內与他奋斗，然后將他驅走。学堂有教習五人，余往泗水託該地与本党亲近之有力华侨，写信給日惹学堂学董，將五个教習停聘，續聘余与金鼈和湖北同志李識韓、广东同志某某忘其姓名二人，繼任其职。先孤楊某之势，余等五人到日惹同住学堂內，学堂地址系一寬大古庙，中为大殿，周圍繞以圍房，教室、宿舍都在圍房內。楊某有家眷，另住学堂側边院內，余等五人同住学堂。楊某表面甚为亲善，住了半年，彼此相安無事。星期日楊某間或备酒飯約余五人往彼住宅同吃，異常欢洽。一夜，天剛發白，听見哎呀一声，又聞有跑步之声，余五人齐出宿舍察看，見李倒于宿舍門外，头上、手上血跡淋漓。案出后，余与金鼈推測定是党爭，苦無破案之法。幸李伤逐漸轉好，一日，余同金鼈去看他，李密云：“杀人的主犯就是楊某，兇手是楊某請的奶母丈夫某木匠，曾在楊的住宅看見过他。”余等促李速去密告警局，派探偵查。約一月，偵探在某木匠門坎內地下，見其土松有異，將兇刀掘出，刀上凝有血跡，当將木匠捕問，供出实情，立刻把楊某捕禁獄中，此案遂破。案破后，李始出医院，后悉楊某之妻，系汪精衛表妹，約其来此任教習而結婚者。后聞康有为亲来新嘉坡，为楊某謀出獄事，派人来日惹慰問其家屬。不久，李新琪由云南来同住月余，余荐往泗水商会办报。

余所到三宝壟、井里汶、泗水、日惹四处，街上都有华侨俱乐部，門前悬橫木匾，上刻“洪中兴”或“洪义發”或“洪义順”三个大字。金鼈来，得知竟成死难，急想回川一看，商得金鼈同意，彼願先走，遂荐彼到泗水与李新琪合办报纸，李亦願意离开。余即决定明年先到上海。

华侨捐款之誤解

中山先生發动河口之役失敗以后，有数百革命同志逃到安南。法国政府將此数百人，由海防輪运到中山先生住在地新嘉坡。中山先生身边驟然增加了数百人的生活，最初还可勉强支持，漸漸就發生困难了。向他們說：如願回国的，可以設法送回广东，到家里去。願回去的頗少，留着的尚多，想到美国去筹款接济，不料中山先生离开

新嘉坡以后，胡汉民、汪精衛能力有限，对这些人的生活無法接济，由他們自謀生活。这些人都是会党，知識不高，就口出怨言，适逢章太炎来新嘉坡，齐向太炎說：“河口之役，南洋华侨筹的款是二十万，总理挪了一部分，帶往美国去过优越日子，不管我們的生活。”

太炎这个人，很好提笔写文章，至于打仗时的用費浩大，是不知道的，河口革命与清兵相持很久，二十万的款子，只有不够的，那里有余剩，偏听他們的話，写了一篇傳單，一面寄东京同盟会总部，一面分送南洋各埠同志。其时余在日惹，見了傳單大为駭異。不久，三宝壟陈方度轉来东京同盟会总部派黃兴克强南来調解消息，並說克强已到新嘉坡，有信給他，轉約各埠同志，訂期到三宝壟会商办法。余得信先期到三宝壟，見克强欢天喜地的說：此事已經大白了。拿出一張美国報紙，譯成汉文的交与余看，美国報紙上登了一段新聞，題目是：《中国革命前途的暗淡》文內說：“中国革命党領袖孙文，从前到我們美国来，住的旅館是頂上一層樓房，出街不是坐汽車，便是坐馬車。此次来美国，住的旅館是最下一層的房间，出街走路的时候多，坐人力車的时候少，袜子骯髒了，都是自己洗，照这样看来，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很暗淡的。”

因此，章太炎傳單上偏听別人的話，事实不确，为美国報紙証明，完全大白了。克强此时，得广州来电，催他速归，主持新軍發难事。束裝待發，留下亲笔寄中山先生信一封，欢迎中山先生仍回南洋主持革命大業，交与陈方度。俟各埠同志到时，一齐签名，余签名后，克强即上輪船。临行說：“如此回情形很好，望大家回国参加。”不久来信，又失败了。但是，清朝大吏，此后对新軍特加提防，因而新軍中的非党人心亦动搖了。后来田梓琴到上海告余，中山先生得欢迎信后，回到南洋，在庇能（檳榔嶼）召集各同志开了一个很沉痛的會議，提出一个意見：“这回發生誤会的事，是本党的大不幸，虽然大白了；但今后向华侨筹款来革命，不免有許多困难，革命前途，艰难至此。只有大家回国去拚命，發动一个大規模的革命，成功固好，如不成功，多流点血，使后来的人，踏着血跡前进，革命总有成功那一天。”

辛亥瀘州反正与滇軍入川

余自爪哇到上海，适熊克武在川屡次失败，早来上海，与四川同志李鴻鈞、淡宅陽同住南林里，余亦往同住。但懋辛、刘亞休二同志住中国公学寄宿舍，常来商谈。未几，喻培倫在北京与汪精衛、黄复生同炸攝政王失败，亦来同住。商議今后四川革命，当以炸彈为利器，从前所用炸药，性太猛烈，喻新发明的炸药很安全，黑头火柴所用药品，内有可以造安全炸药的。推余回瀘州创办黑头火柴公司，暗中可以制造炸药。于庚戌年冬月回瀘州，约席乾生、陈宝鏞、金丽秋集资创办。因四川政府对于火柴有限制，不能再办，地点拟在赤水与瀘州連界，往来甚便。余与乾生先赴貴州立案，到畢节时，劝業道王某出巡到畢节，就便往請。王以赤水已有一家火柴厂，地小不能再設，准在畢节开办。余与乾生回瀘，商定先由乾生与宝鏞赴日本購買药品。余与丽秋再赴貴陽力爭厂地，批准仍在赤水。正購地建厂时，四川鐵路風潮起，因清政府將川汉鐵路收归国有，人民不願將血汗中得来的股本，落在政府手中，化为烏有，一再請收回成命，四川总督赵尔丰專橫不理。于是組織“保路同志会”起而反抗。余与丽秋認为时机难得，一同回瀘，与邓西林、徐琢成、姚星瑩、李琴鶴諸同志，商量乘机起义办法。乾生亦由日本赶回，宝鏞赴北京活动，同时富順胡少成、隆昌薛瀛海和荣县謝淑銘、龔祝三先后来瀘。謝龔二人系与熊克武、但懋辛参加黄花崗生还者，謝改姓名为馬集成，同在瀘活动。先从有武力的着手，永寧道台衙門，亲兵队、砲兵队和瀘州衙門堂勇，与夫鹽局安定中軍，从前有余竟成的根基，同情革命的很多。砲兵隊長楊某，願將大砲二尊的机柄，交与我們，徐琢成在胡市运动团練，有毛瑟槍二三十支，已有成議，派龔祝三由城送銀二大錠，作为信金，路上被道台衙門差队查获，人銀一并押送回衙。龔祝三供認是小販商，銀子是买杂粮的，得亲兵队、砲兵队的人照顧，將祝三發交瀘州州官保釋，銀子發还。当押送的时候，刘道台刘道台名朝望，字基庄，合肥人。台屬巡撫刘銘傳之孙，年三十左右，以世襲入貴胄学堂，畢業后內放此职。傳諭下来說：“你們的

事，大人已經明白了，大人以甚么心待你們，你們应当以甚么心待大人。”

大家聽見他的話，知道他的用意是與我們表同情。其時瀘州州官郭鍾美，亦合肥人，進士出身，是劉道的老師，很不以此案辦法為然，面稟劉道：“此案非同小可，不能保釋，請交我辦理。”劉道說：“我已明諭保釋，不能變更，你照辦就是了。”郭與劉雖是師生，究竟劉是長官，打起官話來，郭亦無可如何。於是郭坐大堂，大逞威風，叫保人當堂保釋，徐琢成當保人，跪在大堂上，郭把徐看了又看說：“你們的事瞞不了我，此案是道憲大人發下來保釋的，若是交我辦，沒有這樣便利，好好的把龔祝三帶回去，銀子發還，你們要明白些。”

龔祝三保釋後，郭鍾美嚴查客站，胡、薛、馬、龔四人移住乾生家，郭每夜親率差隊堂勇，三更以後在乾生家周圍巡迴查訪，並面諭當地保甲注意，如有可疑情形，立刻報官。倘敢隱瞞，一同坐罪。保甲轉告我們，胡、薛、龔三人才各回各縣。馬集成與防軍官兵，相識頗多，往永寧古蘭一帶工作，因此防軍多有派代表來瀘，與我們接頭的，我們向他說：“省內省外情形甚好，革命時機已經成熟，轉告各同志，必要時對地方官吏可加以威脅，移轉他的傾向，使他不敢妨害我們動作，或與我們取一致行動。”

從此瀘州城內防軍，時來時去，竟有以槍枝向當舖當錢者，當舖無人敢當，引起口角，官吏無法維持。不久，重慶宣布反正，建立蜀軍政府，系楊滄伯、朱叔痴、謝慧生、張培爵諸同志組織，以張培爵為都督，夏之時為副都督。瀘州城內官民，猶如晴天霹靂一聲，耳目皆驚。防軍過瀘下渝者，每日或多或少都有，與人民口角者亦多，劉道台不能維持，召集同城官紳，開了幾度會議，決心反正。于某日在考棚宣布獨立，組織川南軍政府，劉道台為都督，瀘州士紳溫翰楨為副都督。是日余亦往參加，見劉首倡剪去長辮，即與乾生登時赴合江。

因瀘州韓麗生、江安張子釗和合江任若成等，月前發動民軍，圍攻合江城。知縣黃理成，據城死守，久不能破，麗生、子釗屢次派人邀余，到合江幫助，以瀘州比合江重要，事未解決，不敢往。故于宣布獨立日，察其情形可靠，始與乾生同去，到時見城外民軍，數以萬計，然皆

各处聞風，临时糾合而来，既無訓練，又未編制，头目甚多、情形复杂、号令不一，安能統一指揮。一部攻至城下，他部不动，又为城上击退，不只一次。余想用吃血酒旧法，先統一軍心，再推出指揮之人，使号令一致。由韓張約集各路头目宴会，余为演說革命大义，及中山先生手訂一切办法。余演說时，暗窺當場凝神听話者，只有二人。詢之韓張，为韓部孔陣云、邵庆福二头目，囑韓留意。后来二人同韓来瀘，邵于癸丑随韓与余出川，討袁之役死于陈其美攻高昌庙之战。孔則后来曾任旅長司令之职，解放前中風臥古蘭家中，現在生死不知。

自吃血酒后，比前稍有进展。得瀘城消息，川南軍府成立以来，蜀軍政府無一同志，多是旧官僚，恐为假独立。渝瀘相連，不無可慮，常有出兵进攻之謠。風声鶴唳，城門不时关闭，人心異常不安。府中知余者，派人到家探問，始知余在合江。刘温二督，初託人函劝余归，繼由温單函相劝，以桑梓为重。商乾生先回，余后归。到时未入城，住南岸蒋宅。温遣其侄約同过江，赴温宅面商今后事宜，温以母老决意辞职，不能留，同見刘督，決議改組軍府，电知川南二十五屬，派代表来瀘选举副都督。时但懋辛到渝任蜀軍政府参謀部長，各代表征詢应选何人，提出以但繼任，遂一致推选但懋辛繼任副督。温長樞密院。余与邓西林为副院長。值黄鹿生由成都省亲过瀘，知尹昌衡在成都反正，彼为参謀部長；楊維为巡警总监，同坐監之人皆分任有职，各同志以但現任有职，恐不能即时来瀘。此时情形軍府需一著名党人，方可副川南人望。商各代表，皆云鹿生坐監，全川皆知，一致推鹿生为司令部長。鹿生坚辞，一再相劝，乃允省亲后来瀘就职。大家恐其在家留恋，派人同往，以三日为期，果然不爽，来瀘即宣布就职，洞开城門，人心大定。瀘州此时有防軍水警，共七营，統領为莫龙章，以鹿生有革命坐監历史，咸庆司令得人，願听指揮。于是組織各部，徐琢成为参謀部長，蔣星輅副之。席乾生为財政部長，盧春浦副之。金丽秋为政事部長，教育設科，附于政事部，姚星瑩为科長；梅秉鈞为財政部总务科長。其他不需要各部，暫不設置。瀘州交通机关，电局有快机一部，各省發来四川电报，皆由瀘局轉拍，異常重要，主管的人，非通英文不能胜任。李琴鶴为电政总办与各部平等。嗣王述槐来瀘，系与鹿生同

案坐監者，为司令部副部長。

鹿生就職消息傳至合江，城外民軍推韓麗生回瀘，代達歡迎之意，並報告近來情況。麗生偕孔陣、云邵、庆福同來；旋合江黃知縣電鹿生請降，電文之意，謂彼困守縣城與外面消息隔絕，不知清廷無望，今來請降，要求司令親來受降。因與民軍相持日久，恐生惡感，並望保全其生命，方敢開城等語。鹿生回電，一一照准。正準備赴合江時，滇軍援川先頭部隊大隊長黃子和到瀘，子和系東京加入同盟會同志，其父德潤，是四川候補道，在瀘州任釐局總辦，未改組前任實業部長，改組時，以實業非目前需要，暫未設部。大家以子和為同黨，其父又住在此，坦白相親，彼亦時來軍府接近。未幾，滇軍第二梯團長李鴻祥率全部官兵到，駐師範學堂，軍府還送大批酒肉慰勞。

鹿生囑韓麗生，遣孔邵二人先回合江，轉諭民軍停止攻城，並將城之周圍民房讓出，移住農村，然後訂期起程。子和欲與鹿生同往，鹿生以有客軍一路，恐城內縣官、城外民軍生疑，俟彼到時城圍解後再來。某日晨，鹿生同衛兵管帶劉篤生、秘書楊健久、軍法官孫錦率衛兵一連，和韓麗生由船下合江，臨行電知黃知縣，傳諭軍民周知。船到岸時，人民蟻聚江干，歡聲雷動。黃知縣和民軍頭目、地方士紳均排列岸上歡迎，一同入城，布告軍民城門大開，三月來圍城之痛苦，于此得解。

鹿生召集地方人士，推舉地方司令，辦理善後事宜。休息數日，地方司令舉出，負責有人，由地方司令召集地方人士、機關法團原有負責人，開一大會。鹿生為他們演說中山先生革命的意義和一切辦法，望大家本此意義和辦法努力進行，為地方造福。圍城受災的人民，應立即設法賑濟。一面另集合民軍頭目，慰勞其數月辛苦，率隊回去，各人安居樂業。又面告黃知縣聽其在合江自由居住，決無生命危險。一切事畢，率同來官兵由陸路回瀘。至蔡壩聞機關槍聲，先頭部隊回報，前有滇軍阻路。鹿生認為誤會，勒馬上前，大呼我是瀘州黃司令。滇兵云，既是黃司令很好，請入營與大隊長面談。鹿生下馬入營，即將其捆綁，令同行衛兵繳槍。劉管帶篤生以為司令被縛，與之爭恐傷司令，于是一齊繳槍。不料他們將同行的人，一齊綁赴合江城外

杀头，一齐剜心拔舌，惨无人道。韓丽生見此惨情，大罵黃子和，你是党人如何殘杀党人，快出来同我講話，得釋放而归。此外軍法官孙錦于繳槍时駭滾田內，爬入农家得免，共計慘杀死难官兵一百零九人。惡耗傳入瀘城，滇軍早已戒严，將忠山占踞为砲兵陣地，大砲正对我軍府。軍府在鹽局，后門外是小較場，靠西門城牆，城牆外即忠山脚底滇軍营地师范学堂，街面兩头，安置机枪禁止行人通过，並派大排兵队，巡查街道，晝夜不停。莫統領和李澤秀营長等来軍府，面告余与西林說軍心很憤，都願与滇軍死战，为司令官报仇。囑其妥为安慰軍心，听候办法。刘都督派人送还印信，說已通电辞职。因刘督仍住道台衙門，每日携印来府办公，公畢仍携回之故。温院長向少到院，院事由余与西林商办。城內人民、商号住戶全体关門，街道行人亦很少。余与西林每日傍晚分往各营，安慰軍心，皆痛哭流涕，願拚一死，雪此奇恥大辱。余等忍淚劝其稍待，有罵余等革命党还怕死者。离营时，囑其長官早閉营門，免生意外之事。城內情形緊張至此，稍有不慎，战端一触即發。除將此情电呈南京政府外，並电重庆、成都兩軍府注意滇軍行动；更有危險者，鹽局軍府距离师范学堂、滇軍营地只有兩条街，每夜三更后，滇軍大排步哨安至軍府街口。軍府人員，多主張夜間派出步哨者；余与西林坚持不可；並非示辱，以城內人民生命財產为重。主客之势，彼远道来此，客势甚孤，我为坐地主，全川人之力量皆我之力量，势甚强。彼不得不防，彼見我無准备可以放心，而求得和平解决。我亦安步哨，万一步哨不慎，战端一开，巷战起来，城內人民先受其禍也。忍辱負痛，維持十余日，重庆蜀軍政府，派胡文瀾来調解。胡系日本士官生，軍界泰斗，曾随川督錫良督滇，滇軍多有以胡为前輩者。胡約王芷塘同来，王在滇省新軍中任职有年，李鴻祥亦頗相識。由王轉达双方意見，現在南北和議未成，当以国事为重，不能內鬩影响大局。此事曲直，暫置勿論，俟南北統一再說。同时南京政府慰問电到，已电飭滇軍回滇，温院長、金部長、席部長、李总办乃分劝商民开業。胡文瀾偕王上省，但副都督懋辛亦至，但与黃子和系旧交，相見以誠，子和推系二大队长馬某所为，互相往还，一場大風波暫告平息。

当滇軍在合江慘杀时，韓丽生胞兄奉璋在合江，將鹿生、篤生、健久三屍移置一边，其余由地方人叢葬。僱舟將三屍运回，过弥陀岩以健久是大灘人，將屍交彼家屬。舟抵瀘停于草鞋沱，抬鹿生屍置天壇庙中，篤生屍交其子运葬。余与西林偕院中職員周循九往視，鹿生屍身首異处，胸部洞开。循九將鹿生屍攝影留作紀念。鹿生屍身由軍府备衣棺厚殮，仍停原处，派人守护。运柩之日，全部官兵戴孝花拈香，送柩入城。經過街道，商店居民家家自动燃香点燭祭奠。柩从南門一直通过会津門，渡沱江上岸，过小市大街暫停西昌館。不久，卜葬于观音閣側，与余竟成黄土坎墓相距里許，后来在城內公园，合建余黃二先烈紀念碑一座。去年，瀘州市府重加修飾，填以紅、黃、藍三色油漆，煥然一新。

鹿生喪葬后，滇軍李鴻祥率队离瀘，以瀘州京銅局所藏滇銅为滇省所有权，並不商之瀘州政府一齐帶走。第一梯团長謝汝翼由敘府开兵上省，到自貢时，成都早發新軍在自貢阻止，不得前进，激战三日夜不能通过，亦率队回滇。由此觀之，設無合江之变，侵略野心不暴露，成渝皆不备，可以長驅直入安抵成都。如唐繼堯之逐走楊百洲，自为都督，以貴州为征服地。而謝李二人，亦得以四川为征服地，是則鹿生死难虽慘，川人陰蒙其福也。

但副督到瀘，以成渝合并已有成議，取消軍政府改称川南总司令，改府設署但为总司令，布告川南各县，府中各部改科。司令部自鹿生死难，王述槐繼任部長，改为軍事科。王辞职归，罗肇圖、李璧泉、韓丽生先后任科長；席乾生任財政科長；盧春浦專办釐局，以梅秉鈞为副科長；金丽秋为民政科長。軍府原有軍法官孙錦、陈登洲二人，合江之变，孙錦受惊，抱病辞职；增設司法科，登洲不願任科長辞去；以銅梁时雨楼与韋少荃任正副科長。樞密院改为总务科，余与西林为科長，不分正副共同負責。改組完畢刘督朝望回家，派兵护送出川，並电請南京政府，电令安徽都督知照。嗣成渝合并，实行軍民分治，尹昌衡为都督，張培爵为民政長，蜀軍政府取消，改設鎮撫府，夏之时为鎮撫使。張培爵至隆昌电邀但懋辛同赴省，張就职后力挽但懋辛任成都府，电委余代理川南总司令。余未就职仍用但名，由余代行职

权，屡电促但归，始终未返。旋熊克武由南京政府任为蜀军总司令回川，到万县，军餉缺乏电余协助。由乾生携款五千赴万县藉表欢迎，随熊到渝，留熊部。罗肇图和黄子休早出川，罗任蜀军军械处长，黄任参谋，李璧泉率训练所徒手兵数百下渝，由熊发枪编为模范营，李任营长。军事科长由韩丽生继任。邓西林亦往熊部，余代行总司令数月，抱病回家休养，迭电成都委人，乃委宋辑先为川南总司令。宋同张佐臣来瀘，张为秘书，时黄容九为叙府司令，辑先到任未久，欲出巡叙属南六县，与容九商量六县吏治，又挽余到署代行。余在两度代行期间，经过许多困难问题，如汉军统领刘锐衡来编制我军，第一师长周骏来争占盐局，奋斗到底，心力俱碎。最后中山先生以天下为公，让位袁世凯，乃商辑先，我们应当效法不宜恋栈。经过署中同志会议决定，遂通电自行取消川南总司令，办理结束事宜。时尹昌衡欲经略川边，自为经略使，四川都督交胡文瀾代理，余与丽秋、丽生商鹿生死难最惨，当时胡意俟南北统一再说，今胡代理都督，我们同赴省请他办文，以我三人为代表赴京请究。在结束报销内拨款三千元，作路费；同时重庆镇抚府亦由夏之时自请取消，出外留学。于是渝瀘两地先后反正，建立之军政府光荣结束。而四川政治从此统一也。

附余竟成自述 1909 年在叙府殉难时所写

余竟成年三十六岁，瀘州小市人。二十岁入武庠，名俊英，革命时改名余英，表示与满清政府脱离关系，不受他的顶戴的意思。因见巴县鄒容作的《革命军》、湖南陈天华作的《警世钟》，才知道我们汉人，被满清压迫了二百多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我们汉人亡国时，被满清政府惨杀的痛苦。甲午年中日战争，满清政府打败了，订的马关条约，赔银子二万万两；又割台湾、澎湖与日本，并允许他在中国设工厂，才显露出满政府是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庚子年义和团在山东起义，被满清政府利用，革命不彻底，引起八国联军入北京。光绪帝和西太后只有跑的一条路，更显出他们没有能力了。辛丑条约赔银子四万万两，拆毁大沽口炮台，准各国驻兵在北京公使馆区域内，从此瓜分中国的话，愈闹愈大。我们汉人如不起来革命，推倒满清无能

为的政府、除去一般貪官污吏，恐怕不能救四百兆同胞出于水火。眼見我几千年来黄帝之子孙，还有亡国灭种之惨。我才把《革命軍》、《警世鐘》兩本書拿在瀘州茶館酒店講演，想喚醒汉人起来革命。州官派差禁止，我往乡場去講演，差役跟着我跑，后来我自費到日本东京，会見孫文，加入他的革命团体，回川糾合同志圖謀起义。初失敗于瀘州江安，再失敗于广安，三失敗于嘉定宋家村；今又失敗于叙府，走在云南豆沙关断蛇坡，犯了我的忌諱，應該死在此地，沒有前进。被巡防右軍郑程二哨官，將我送在府城，沒有別話說，要杀开刀。問我的同党很多，凡有良心的血性男兒，都是我的同党。就是你們官場中亦不少，你看徐錫麟就知道了。今天成都派委員来会审，我的供狀是实。

临刑口占一絕云：牡丹將放身先殘，未飲黃龍酒不甘，同志若有繼我者，劍下孤魂心自安。

辛亥革命在柳州

李墨馨

編者按：作者为广西文史研究館館員，所敘辛亥革命前后的柳州情况，主要是根据蔡勁柏先生所述；蔡为同盟會員，当时参加柳州起义，为革命亲历者之一，現年已七十。这篇記事虽然簡略，所記事实可供参考。

柳州的同盟会：1906年刘古香奉命回桂活动。1908年，再奉总理命在桂主盟，时加盟者有：蔡勁柏、柯鸞臣、柯禹臣、胡代民、張子翔、李德山、李子廷、宋荊州、易和尚、譚昌、楊秀芝、楊子安、楊友蘭、胡柳琴、罗藩、李伯純、王淑宾、楊文佩、周毅夫、周紹文、石龙飞、徐鉄、刘震寰等卅三人，皆軍、政、学各界分子。旋成立硝矿厂于柳州，秘密制造炸彈，运输軍械。並開設华熙客棧于柳州四馬头，秘密招待各方同志。未几事洩，硝矿厂被查封，各同志星散。刘古香、李德山、李子廷逃赴广州活动。蔡勁柏逃回庆远中学，吸收青年学生，並运动

陆軍起事。

柳州起义：三月廿九广州起义失败后，广西同盟会员多集中于柳州，与港、粤、武汉各地电讯往来不断。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柳方得密电，即召集紧急会议于柳河水师营，水师营系胡代民、張子翔主持。决议由水师营于八月廿一日黎明进攻柳州鎮台衙門。由水师营掩护各同志、各学生肉搏前进。柳江鎮台兼熙字营統領陈宗棠措手不及，献印投降，各机关同时反正。于是同盟会员乃設总机关于柳州，改元为黄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是时，桂林、梧州、南甯、龙州、庆远各地仍为清軍占有，当时中心工作有下列几点：1. 派員赴桂林、南甯、梧州、龙州、庆远、广州联络。2. 收編綠林——如收編沈雄英、宋五、大头四等。3. 吸收防軍將領——如陆荣廷、陈炳焜等。4. 电請刘古香回桂主持。5. 推举王冠三在馬厂編練新軍並組織学生軍。6. 編队出师北伐。7. 肃清專制余孽。8. 整理地方財政、廢除苛捐杂稅。

辛亥八月廿二日，蔡勁柏奉派赴宜山，向清軍督帶莫荣新說降。旋任莫为庆远府長、陈宗棠为柳州府長。所有部队由柳州总机关直接指揮。时桂林、南甯、庆远、梧州、龙州先后反正。蔡勁柏赶回柳州，协助王冠三編練新軍，准备出师北伐。是时，柳州总机关奉令改为軍政分府。刘古香回柳主持分府。

南北和議成，孙中山先生讓位与袁世凱，各同志以功成身退为号召。广西除留王冠三在柳編練新軍，余皆解职归田，或回乡講学。陆荣廷、陈炳焜、莫荣新、沈雄英乃得假借兵权乘机發展。

柳州二次革命：1913年3月，袁世凱戕杀宋教仁。八月間，刘古香集議宣布二次独立于柳州，推举刘震寰为广西討袁軍前敌总指揮，周毅夫为討袁軍第一軍長。刘古香、沈雄英、王冠三留守柳州。蔡勁柏为討袁軍第一軍參謀長。时陆荣廷据南甯、陈宗棠据庆远、陈炳焜据桂林，皆甘附袁逆者。蔡勁柏建議柳州被反动势力所包围，非先攻占南甯、联络桂林不足以有为。乃調宋五、大头四及刘震寰各部星夜出發。行抵离柳八十里之四方塘，沈雄英叛变，槍杀王冠三，燬馬厂新軍械。刘震寰令調本軍回城靖乱，蔡勁柏献策，以为沈既叛变，縱使

克复柳州，本軍亦無異甕中之鼈；不如迅取南甯，桂林必然响应，柳州不攻自破。周毅夫不納，回师抵雞籠村，而谷埠、鵝山、鯉魚岩各据点已为敌人占領。革命軍血战三晝夜，庆远陈中棠、南甯陆荣廷、桂林陈炳焜各敌軍果增兵向革命軍圍攻，革命軍因粮絕彈尽，卒被击潰。刘古香被陆荣廷槍杀。周毅夫、蔡勁柏逃往香港参加中华革命党。

討龙之役： 广西革命党人自討袁失敗后，被陆荣廷、陈炳焜、莫荣新、沈雄英各叛賊殘杀殆尽。逃往香港者，有周毅夫、刘震寰、邓鼎封、刘梅卿、宋荊州、蔡勁柏、黎工伙、柯禹臣、柯鸞臣、易和尚、譚昌、楊子安、李伯純、王淑宾、石龙飞諸人。在港組織中华革命党，設立机关于油麻地共和茶烟店、灣子啟祥茶烟店、广州蓮花井第七号从事討龙工作，如：运动城防軍觀音山砲兵响应、运动統制台衙門砲兵营長襲击觀音山、私运槍彈炸藥等，皆由蔡勁柏負責进行。

惠州光复記

陈景吕

編者按：作者为广州文史研究館館員，辛亥革命惠州起义时曾为团練局紳，所述革命軍如何进攻，及清軍开始抵抗，繼而內部分化，終于被迫投降等情况，皆个人亲历之事，可为研究惠州起义者参考。

武昌举义后，党人紛紛集合澳头淡水，拟进攻惠城，主持軍事的为第一軍总司令陈炯明。当时惠州陆路提督秦秉直聞耗，准备应战。但所管除原有各防汛外；在城仅有兵兩营，以許德普一营，出防东門外一帶；洪兆麟一营，出防西門外一帶；並召集惠城紳耆，着招兵三百名，为守城之兵。設团練局于学院衙，委任团紳十余人协助守城，我亦被委之一。辛亥九月十三日〔11月3日〕招兵滿額，成立营部，轄三哨，每哨一百人，以饒靖瀾为营長，兼帶中哨。以廖璧人为左哨長，何菊南为右哨長。营長、哨長均曾充武弁，每日派一部分守城，留一部分訓練，比一九〇〇年三洲田之役的守城布置，进步得多了。

十七日革命軍進至馬安，防守這地方的為許德普營，革命軍便和許部接觸，革命軍分數路前進，許部節節敗退。革命軍前鋒陳經年少氣銳，僅帶十餘人，追至離城一里之大石橋，反為敗兵所執，帶回城內，悉斬首于提署西轅門外。秦秉直因戰事失敗，革命軍將進攻惠城，即晚派參將到團練局，征詢各紳意見。年老的如梁靄人、廖雨生等，均慎重發言，我和張友仁、黃維周、周星南等四人年較少，發言最多。大意以清廷大勢已去，無可挽回，秦軍門宜順應潮流，歡迎革命軍入城，停戰以保全兩城生命。參將據以回復，不料秦秉直大怒，即欲下令逮捕團練局紳，治以反叛之罪。當即由他的老夫子（即今之秘書）力諫說道：“軍門已給他們三百枝槍，如果前往逮捕，勢必抗拒，在城內交戰，革軍乘機入城，豈不玉石俱焚？料幾個紳士在圍城內是不能逃去的。明晨宜先收繳團練局的槍械，一方面派兵守住各城垣，有穿長衣士紳繞城外出的，先殺後報。一方面召洪兆麟入城與許部出東門，合擊革命軍，料彼烏合之眾，不難擊退，那時再擊各士紳懲辦不遲。”秦秉直從其計劃。

是時周星南之父周華甫在秦提署中稿房辦文書，夜中得此消息，即通知我們暫時設法隱避。次晨（九月十八）即派兵收繳團練局三百枝槍，同時派專差往西門外佛祖凹召洪兆麟率部入城。但洪既與革軍聯絡，即對專差說：“我已參加革命，本欲攻入惠城擒擊軍門獻功。因素受軍門厚恩，不忍下此辣手，最好軍門先行退却，讓革命軍入城。如再延遲，我亦不能徇情了。”專差照此回復。秦秉直知無兵可靠，惠城危在旦夕，於是擬吞金自盡。惠州府知府徐書祥頗明大義，到秦提署力言：“清廷本滿族，宰制中國二百餘年，今氣運已盡，正是我漢族國土重光，毋須拘執君臣之義。”秦提即召歸善縣惠陽原名歸善知縣閻夢谷到署，着其會同團練局紳往與革命軍講和，自己願先退出，將城獻給革軍。

夢谷奉命往團練局時，局中紳士已星散，旋找得歸善縣議會議長廖計百、副議長李君敬二人，託其往革軍處議和。廖李二人繞城而出，先到西門外佛祖凹洪兆麟處，道達來意，兆麟即以電話通知駐馬安之陳炯明，陳允許秦秉直即晚退出惠城，退居西湖之元妙觀。九月

十九日〔11月9日〕，農革命軍入城，於是惠州宣告光復。我們辦團練的紳士，亦解除了顧慮。

惠州光復後，民軍紛紛入城，陳炯明編為七旅，以嚴德明為第一旅長，陳月橋為第二旅長，洪兆麟為第三旅長，丘耀西為第四旅長，陳焯庭為第五旅長，謝子瑜為第六旅長，黃德脩為第七旅長。凡有才能往總司令部投効的，陳炯明廣為錄用，朋友中從此置身通顯的甚多。但我向充惠州府兩等小學堂教員，思仍舊貫，不往投効。惟陳月橋和我家一向有宗誼聯系，他任第二旅長，親來邀我助理軍事及往來公牘。我與商定，上午在兩等小學教學，下午到旅部辦公。陳炯明在惠部署稍定，因洪兆麟所部，系向日巡防營較有訓練，即率以赴省；命林激真守惠州，稱留守司令。我建議于月橋：“現在民軍太多，將來必須裁撤，惟有訓練成正規化，才可保留。”月橋首肯。我於是介紹陸軍生吳瑞臣為總教練，丘君谷、林煥南等四五人為分教練。但訓練有幾點困難：1. 民軍皆鄉農，常要返鄉做田土工作，不能久在營。2. 沒有軍衣，露立風雪中，每懷嗟怨。3. 每日僅發兩角伙食，大家不感興趣。4. 軍士多系旅長兄弟叔侄戚友，怠工不能責誠。因此種種原因，訓練二字僅成個名詞，迄未實行。陳炯明到省時，胡漢民要往南京襄助孫中山，大都督一職由陳炯明繼任。因要分別解散民軍，曾和民軍統領王和順、關仁甫等，劇戰于省城內外。陳所收集的系陸軍，較有訓練，卒之擊敗民軍，將民軍分別解散；並下令解散惠州民軍。我勸陳月橋首先自動解散，自己仍回轉教育崗位。

灤州起义記

刘 驥

編者按：本文作者，曾参加灤州起义。所叙灤州起义經過，与罗正緯《灤州革命記实初稿》（見中国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第六册）、辛亥灤州革命同志会編《辛亥灤州革命紀实》（1936年印）等書基本相同，而各部分詳略互異。本文可为其他灤州起义資料的补充，故刊出供历史研究者参考。

一、二十鎮革命組織及其活动

二十鎮一般青年官兵同志們，多認為要国家独立富强，必須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抵抗列强，取消不平等条約。他們与同盟会革命党人始終有密切联系。二十鎮的統制張紹曾，一貫主張維新，本鎮革命同志們比較容易活动。

又本鎮參謀長刘一清是同盟会會員，原在第六鎮統制吳祿貞兼吉林边防督办时，在督办公署当左參贊，后被調为二十鎮參謀長，本鎮革命气氛濃厚，与刘一清參謀長鼓动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革命組織，是采用讀書会的形式，以作掩护，定名为“武学研究会”，首先發起人只有六人，就是王金銘、施从云、馮玉祥、郑金声、王石清、岳瑞洲。不久，又有戴錫九、孙諫声、張之江、張树声、張宪廷和我。

又陸續吸收了高震龙、李忻、龔柏齡、李鳴鐘、張振甲、鹿鍾麟、葛盛臣、石敬亭、周文海、商震、邓長耀、董錫純等百余人，公推馮玉祥为會長。

宣傳工作，我們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綱領，就是以实事作为宣傳資料。如宣傳清廷昏庸、政治腐敗、日本帝国主义可恨、各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必須組織起来，推翻清朝，建立

民國，才能富強，才能抵抗外國人。我們軍人革命，可以利用現成的武力，為我們革命的工具。又將清廷貴胄賣官盜爵的黑幕，作為宣傳資料；同時宣傳嘉定屠城、揚州十日記的具體實例，來鼓勵革命情緒。

二、永平府秋操

清廷新軍陸軍定制，每三年秋操一次，辛亥春，規定八月秋操。本鎮、第六鎮和第二混成協都參加。地點在永平府（今盧龍）此時劉一清參謀長在永平府佈置一切，張紹曾、吳祿貞、藍天蔚等，密商暗謀，秋操部隊都帶真子彈相機起事，進攻北京。不料因吳祿貞鋒銜過露，為清廷所猜忌，因而停止第六鎮參加。但本鎮與第二混成協，仍按原計劃舉行。本鎮奉命後，即選拔參加的部隊。當以七十八、七十九標為主体，再在全鎮中挑選官長、目兵革命分子參加其中。我是輜重營排長，被挑選在七十九標管大行李長，故在灤州合編為一個混成協，由張紹曾統制率領開到灤州。

三、辛亥起義，東三省新舊將領的鬥爭

武昌舉義，這個消息傳來後，清廷停止秋操，停止調動部隊。灤州只留七十九標，其餘部隊仍回原防。七十九標標統蕭廣傳是反革命的，王金銘、施從雲一二營是革命的，張建功第三營是反革命的，而張建功表面與王施合作，實際做奸細。

武昌首義傳來，東北一般革命青年官兵，磨拳擦掌，即欲響應。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認為新軍不穩定，即在沈陽召集新舊將領會議，听取意見，決定應付方針。協統以上的新舊將領，都在被邀之列。被邀單位，新軍方面，有本鎮和第三鎮（統制是曹錕，此時由盧永祥代理統制），第二混成協；舊軍方面，有五路巡防營統領。在未開會以前，新軍將領張紹曾、劉一清、藍天蔚、盧永祥等，先開預備會，討論會議時所持的態度，決議一致主張東三省獨立，對清廷不出一兵一卒，械彈糧秣亦不供給，以掣其進攻武漢民軍之肘。以趙爾巽為首的舊派將領意見：1. 以死報國；2. 現在不表示態度；3. 在未奉上諭以前，保境安民。趙總督講完了付表決，全場沉寂，舊派將領中舉手同意，而新軍

將領無一举手者。赵总督最后發出哀鳴，要大家讓我老面子过得去；新軍中有清廷忠实走狗盧永祥代統制首先举手，由他破坏了預备會議的决定，于是大家举手，这才宣佈散会。

新軍將領一个个的气得要死，藍天蔚协統对盧永祥大为不滿，当面責他不守信义。旧派將領对官兵宣傳开会的意义說：“忠君爱民、不問他事。”新派將領如藍天蔚的宣傳憤慨的說：“現在到了我們流血的时候了，咱們得自己想法子干。”当时官兵听了藍协統的話，精神異常緊張而激动，准备着干。

四、灤州起义前的活动

秋操中止，沈陽开会不滿人意，因而留在新民府的一般傾向革命的軍官，人人憤恨，坐立不安。郑金声、王石清、戴錫九、馮玉祥等，常常在一起商談，怎样响应武昌起义，怎样在新民府發动；在未發动以前，應該鼓励軍隊，宣傳革命道理，有时發傳單，工作很緊張。各省独立消息，相繼傳來，我們秘密宣傳和聯絡工作，更一步步的加紧。

辛亥起义，清廷無法应付，因而起用袁世凱；袁世凱掌握兵权后，有命調第三鎮和本鎮开进关內打民軍，此时本鎮奉命后，意見很不一致，大概可分三派：一是革命派刘一清、王金銘、施从云、馮玉祥等，主張立刻出动，攻打北京。二是旧派保皇派蕭广傳、潘樂楹、范国璋、徐廷荣等，主張开赴京汉線，攻打民軍。三是中立派陈宝龙、周子寅等，主張觀望，誰胜附和誰。張統制被三派包圍，进退失据，一时难下决心。

此时彭家珍奉命押运五千支槍、五百万發子彈，由奉天运到汉口前線接济清軍。彭是革命党，以前与我們都是二十鎮的連排長，故与二十鎮的革命同志始終保持着联系；因此彭家珍事先电告本鎮同志王金銘、施从云。軍火运到灤州后，張統制派人到車站將这批軍火扣留了。因为張統制把軍火扣留后，王金銘、施从云諸同志，認為事已至此，时机迫切，不可錯過，就向張統制建議，即刻聯絡吳祿貞、藍天蔚，同时發动，直搗北京。

張統制的意見，認為本鎮高級將領半数是保皇派，若是倉卒从

事，必無好結果；主張先提出政見條陳，清廷不會採納，那時再動，旧派將領無話可說，必須隨我們干，較為妥當。遂會同藍天蔚聯合發出對清廷提出政見十九條，條陳大意是：改革政治，宣佈立憲，組織責任內閣，削除皇族特權，特赦國事犯，反對討伐民軍等等，限立即答復，態度強硬，由此增加了形勢的嚴重性。張藍等事先與第六鎮統制吳祿貞等計劃好，如條陳提出後清廷拒絕接受，即行率兵進攻北京；恰好山西亦於同日宣佈獨立，使北京受到東西夾攻的威脅。

電報到北京後，清廷以為變生肘腋，頗為震動。清廷想緩和這個緊張局勢，遂對張藍條陳意見，一一接受，立即入太廟宣誓立憲，下詔罪己。釋放汪兆銘、黃復生等，將同盟會列為政黨，二十鎮也沒有南調。由此破壞我們第二步起義計劃。不久，清廷調張紹曾為長江宣撫使，以保皇派潘樂楹繼位，從此本鎮的革命受到了一定的損失，但同時也促成本鎮革命迅速爆發的導火線。

五、灤州起義

清廷調張紹曾以保皇派潘樂楹繼任，因此，本鎮革命的同志們，王金銘、施從雲等得信後，極為憤懣；當召集在灤州的同志張之江，張樹聲、劉驥、龔柏齡、張振揚等七十餘人，在灤州車站文廟內舉行會議，一致認為張統制的調職是清廷剷除革命最毒辣手段；張之去留，關係北方革命之成敗，因而環請張切勿受命。同時致電清廷挽留張統制，請政府收回成命。

第三鎮由盧永祥代統制率領，由奉天開至丰台，破壞了原在沈陽預備會的決議。因此，第三鎮路經灤州。王金銘、施從雲等非常憤激，奉張統制之命，派隊截阻，並嚴詞詰責盧永祥，要他表示態度。盧下車見張統制說：“你不懂我的主意，我是相機起事，我這一去可以脫離東三省那個窩子，就好從丰台進攻北京，你們在後面等着，作我的應援罷。盧這樣一說，張統制和王金銘、施從雲等，半信半疑，終於將第三鎮隊伍放過去了。盧到丰台，即將東三省和灤州的消息一一向清廷密報，另一方面仍督師去打娘子關進攻山西民軍。

原定起義計劃是本鎮由灤州西進，吳祿貞由保定北進，兩路夾

击，藍天蔚留后方策应，以期一鼓而下京都。后来因被清廷和袁世凱狡猾毒計，佯为接受張統制等条陈，緩和空气；实际調任張統制职，削其兵权。並放吳統制祿貞为山西巡撫，命其率部进攻山西民軍。而吳統制于十一月七日被袁世凱派人刺杀于石家庄，破坏了北方軍人起义的全部計劃。这时藍天蔚、刘一清亦南下，离开部队，第三鎮孙岳等亦南下。所以第三鎮出卖革命，甘心做清廷的忠实奴才。張統制因挽留的电报，清廷始終未复，决心交代，偷偷去天津了。

張統制去后，潘樂楹升統制，蕭广傳升协統，范国璋仍是八十标标統，他們都是保皇派。此时保皇派的將領，目光都集中在王金銘、施从云等一般革命者身上。馮玉祥因为以前做宣傳工作，使用公家油印机时，被范国璋等識破后，一举一动，均被監視。不久，八十标奉命由新民府調往山海关內海陽鎮駐防，那时听說民軍要在这一帶登陆，故八十标标統范国璋率部队到达后，即佈置陣地。王石清第一营在右，郑金声第二营在左，馮玉祥第三营在中央，后方为預备队，此外砲兵营駐左翼后方，張之江、張树声、張宪廷的騎兵营在沙崗子右翼前方（張之江、張树声兩連，先是編在秋操部队中配屬，后奉命各回原防，故仍归还建制，此时开到海陽鎮）。

本鎮革命力量虽被分散監視，但革命运动，却仍然进行。在天津任教員的同盟会會員白雅雨、王励齋等，奉同盟会的命令在山海关天津一帶活动。这时吳祿貞被刺，張紹曾被調，藍天蔚、刘一清南下革命，但本鎮革命派的將領和白王等的奔走聯絡却更加亲密。那时白王曾数度与我們接洽，他們以为京奉線这一帶革命实力过于單薄，主張密約煙台民軍由海道自秦皇島登陆，那时再合力發动。还有王金銘的弟弟金鈺，也是同盟会會員，这时从外国归来，亦奔走于其間，非常努力。

王金銘由灤州亲赴海陽鎮与馮玉祥、張之江、張树声、張宪廷、王石清、郑金声等密謀；認为袁世凱上台，北軍会为之一振，和議不成，民軍恐怕吃亏，北方一帶一天一天惡化，我們若不早干，終有被保皇派全部消灭的危險。因此，主張立即动手；从清廷肘腋之下的嫡系軍隊中爆發起来，使他們無所措手足；由此更可以影响外省从速起义，

又可牽制清廷調兵去打民軍，使民軍有時間巩固和發展。當時計劃等煙台民軍一到秦皇島登陸，灤州和海陽鎮同時發動起來。張之江、張樹聲、張憲廷的騎兵亦在秦皇島西南山嘴發動。鄭金聲為右翼，王石清為左翼，馮玉祥為預備隊；到時預備隊先攻砲兵營，並將蕭廣傳、范國璋的協部、標部完全解決，而後合佔山海關，分頭進攻北京、天津和奉天省城。海陽鎮方面由馮玉祥負責與煙台民軍接頭及指揮；灤州策應由王金銘等負責分頭佈置，等約好日子，即行發動。

王金銘由海陽鎮返灤州時，白雅雨早從天津來灤州，並帶有北洋軍政府大都督之印。他因南北和議將行破裂，情形十分緊急，而且京奉線的革命醞釀，清廷早有所聞；故白力促施從云等立即發動，一可先發制人，二可為民軍聲援。因此，灤州大街小巷遍貼反正文告，公開宣傳，人人嚷着光復。他們在灤州發動起義，王金銘不知道。王由海陽鎮回來以後，施等業經發動了；王金銘一看情形，大吃一驚，以為太不周密，太性急了。但事已至此，無可挽回，只有朝前干下去；遂邀在灤州的革命同志們一齊到師範學堂商議。當時我們一致主張迎接形勢，立即發動向前干。明知實力不足，煙台民軍沒有到達，海陽鎮沒有約好日期，各方聯絡沒有妥善，非干的時機。但是箭已射出，不能收回。如果氣餒中止，那就自遭滅亡。因此乃於十一月十二日，成立北洋軍政府，宣佈獨立，當推王金銘為大都督，施從云為總司令，馮玉祥為總參謀長，白雅雨為參謀長。十一月十一日晚間，即以王金銘、施從云、馮玉祥署名發出通電文：

“北京內閣總理大臣、上海伍代表、唐大臣、天津順直諮議局鈞鑒：自武漢事起，各省響應，勢如奔濤，足見人心之所向，非兵力所可阻也。全國人民望共和政體，甚于枯苗之望雨也。誠以非共和難免人民之塗炭，非共和難免外人之干涉，非共和難免後日之革命。我公身為總理，系全國之總代表，決不能以一人之私見，負萬民之苦心；況刻下停戰期迫，議和將歸無效，全國人民，奔走呼號，驚惶之至，而以直省為尤甚。是以陸軍混成四十協官長目兵等駐紮直省，目睹實情，不能不冒死上陳，以瀆尊聽。查前奏之信條，內開：軍人原有參政之權，刻下全體主張共和，望祈我公詢及芻蕘，不棄鄙拙，速定大局以

弭乱事而免惨禍，实为至禱。临發百拜，不胜惶悚之至。”

灤州迫近京都，清廷震动。袁世凱令通永鎮守使王怀庆到灤州鎮压和撫慰。王怀庆是清朝奴才，袁世凱的忠实走狗。他輕裝減从，来到灤州，他認為發难者是王金銘、施从云兩人为領袖，而王金銘之兄金鏡、施从云之兄从濱都是換帖的弟兄（金鏡和从濱兩人都在当标統），他認為金銘、从云兩個都是小弟弟，想用感情来作說服的依据。可是王怀庆到了灤州，起义軍把他包圍起来，要他共同起义，就大都督职。有一位排長張振甲把槍头对准他說：“你如果不同意，我就开槍打死你这个滿奴。”王怀庆看風头不对，即生一計，滿口答应。大家就拥他进城拜印，宣誓就职。王怀庆此时把馬韁勒住，馬乱跳。王金銘問其底蘊。他說：“这馬不馴，大家讓开一点，免出乱子。”大家不防其詭計，都讓开路，王怀庆是馬弁出身，善于騎馬，他看众人讓开，他即死命加鞭，因而逃脫。

王怀庆反革命分子逃脫后，王金銘、施从云等和灤州起义革命分子，在軍政府會議，都知道王逃后，不免有大軍圍攻，我們應該即想应付方法，大家一致决定：与其坐而待斃，莫若先發制人，直襲京津。灤州的部队是七十九标，第一營營長王金銘、第二營營長施从云、第三營營長張建功。一二營是革命的，第三營是忠于清朝的。但張建功耍兩面手法，表面上与王金銘、施从云表示一致，其实暗中常把得到的消息报告保皇派标統范国璋。这次王施兩營开出城外后，張建功即在城上开槍截击，王施派石敬亭等率队抵御，王施率队登車，向前開發，攻打北京。到了雷庄附近，發現鐵路被挖断，火車不能前进，隔雷庄五里路之处下車，即与王部交鋒；打到夜深，革命軍勇敢異常，王部不支，鳴号停战，請王金銘、施从云到雷庄議和。王金銘、施从云兩同志当即答复前去，一般革命同志們都不主張去；認為王怀庆詭計多端，恐遭毒手。而王施已抱决心，他說：“如果和議能成，双方免受無謂的牺牲，一直可攻京津，如出意外，以身殉志，求仁得仁，有何憾焉。”遂决志要去，如是同志們要求一同前去，誓共生死，故同去官兵有百余人。

王金銘、施从云到达雷庄，王怀庆避而不見，伏兵即起，將同去百

余人，一一逮捕。王怀庆电袁邀功，並請示發落。袁复电：先將王金銘杀害，王就刑时，罵不絕口，視死如归，誠为壯烈。其后殉难者，有施从云、白雅雨、張振甲、孙諫声、戴錫九、董錫純、熊少賢等十四人，余者都被羈押。內中有个黃云水烈士，是王金銘同志的护兵，被逮后釋放攆他走，他不肯走，反出口罵：“王怀庆是个害民賊，甘心做清廷奴才、卖友求荣的狗，有何面目見我們。”王惱之，一同槍斃。黃先烈之死，何等壯烈，虽死犹生。

在灤州起义的一般同志們，遭此失敗后，不能存留，故紛紛离开部队，各奔方向。我們南方共有五十余人，逃到上海，由湖北当局孙武派人到滬接我們来鄂，由此同來五十余人，分別参加各部門工作。

揚州光复之回忆

張羽屏口述 卞孝萱記錄

簡單說明 最近，我在揚州訪問了江苏省文史館館員、揚州市政協委員張羽屏等人，請他們談出辛亥革命时期揚州一帶光复的真實情况。几位老先生的回忆录，使我們了解：

揚州是当时苏北里下河一帶的政治中心，揚州紳商的行动是附近城市紳商的榜样。而揚州紳商的代表方尔威、周树年，又和附近州县的紳商有联系，被称为假革命的孙天生，在揚州被杀。私鹽販出身的徐宝山，取得了揚州統治权，並扩展到附近地区。

可以看出，揚州一帶的光复，在辛亥革命中也構成一个类型，其特点是：这里的革命力量薄弱，清政府的統治力量也不强，当武昌起义以后，这里成了政治上的真空地帶，当地紳商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財產，迫切需要選擇一个能够按照自己意圖办事的軍隊，当紳商代表与槍桿子头領講妥条件以后，便光复了。这里虽然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但所建立的不是革命政权，而是軍閥割据。

張羽屏先生是方尔威的西席，周无方先生是周树年的胞弟及徐宝山的副官長，其他几位先生也都是当事人，他們的回忆，为我們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資料。如有不完备之处，仍希望揚州一帶的老先生补充。

卞孝萱 1957年12月

辛亥八月十九日(陰曆，以下同)武昌起义的消息，不久便傳到了

苏北。当时，我住在揚州府江都县丁溝鎮，鎮上居民，議論紛紛，多不知道甚么是革命党，以为革命党就是大家合（揚州方言讀合如革）一条命的党。

九月初，我由丁溝經過邵伯，搭乘班船进城。船中乘客，也多談起革命党，有一人說：“革命党人真厉害，能把炸彈吞入腹中，遇到敌人时，將身一躍，人彈齐炸。”我进城后，即宿于方二先生家。方二先生名尔咸，字澤山，己丑科解元，行二。

我亲聞方二先生說：有一人名孙天生，自称革命党。武昌起义后即潛来揚州，联络定字营兵丁，进行光复的活动。九月中旬，孙天生往晤方尔咸以及商会会长周树年（字谷人，丁酉科拔貢），孙天生問：“你們知道运司衙門的庫房中，有多少銀子？”方、周兩人回道：“运庫里沒有多少銀子，前几天已有多数上解到兩江总督張人駿那里去了。”孙天生說：“这怎么办！我还准备拿运庫里的銀子發軍餉呢！”至于孙天生有的是什么军队，方、周兩人均不知道，但又不便盤問他。当时揚州鹽运使增厚，揚州府知府嵩响，均为旗人。因揚州傳說革命党杀旗人，增厚就在衙門內，架起大炮，为自衛之計。居民見此情狀，均惶惶不安。方、周兩位力劝增厚撤去大炮，以安人心。方、周兩位又謁見嵩响，劝其出巡所屬各县，实即离开揚州，暫避風头。誰知嵩响不肯，答复道：“我只希望革命党人不伤害百姓，如果还需要我問事，我願意繼續維持下去，如果用不着我，我就走。”

我亲眼所見者：九月十七日晚間，听到門外行路的人，有脚鐐响声，知道江都、甘泉兩县監獄業已打开，放出囚犯了。出門一看，看見大家小戶都已懸掛白旗。第二天早上看到轅門桥一帶大街上的商店，都在白旗上書写“大汉黃帝紀元元年”字样，說是奉了孙天生之命，这样写的。至于小街小巷所懸的白旗，是不整齐的，有用毛巾代替，有用白紙糊成，大大小小，形形式式。

孙天生率領定字营兵丁，开往运司衙門，增厚打开后牆逃走。十八日大早，看見有从运司衙門运物出来的，問知是兵丁进入后，向附近一帶居民大呼：“大家来發財啊！”于是穷苦居民，蜂拥而入，运司衙門的門窗傢具等，一搬而空。

我見大街上有不少載着兵丁的獨輪車經過，甚不可解。因為揚州習慣，在城內一般是沒有人乘坐獨輪車的（只在鄉間乘坐），士紳乘轎，武將騎馬，兵丁步行。現在光復了，為何兵丁不步行而坐起獨輪車來呢？有人告訴我說：“兵丁進入運司衙門後，搶得元寶不少，放置懷中，頗為沉重，走不動路，所以乘車了。”

孫天生稱揚州都督，他所貼的告示，署“大漢黃帝紀元元年”，鈐用“揚州都督孫天生之印”。鹽務和商務，由方、周二人分管。

以下的事實有系所見，有系所聞：方、周二位在十七日之前已派人到鎮江，請徐寶山了。徐寶山原系鹽梟，江湖中人稱之為“徐老虎”，在長江下游一帶的幫會中頗有勢力，與方氏兄弟素有交情。方氏兄弟原在揚州鹽務上辦事，必須結識這一些人，才能免出差頭。並且徐寶山在庚子那一年，已經由地方大紳薦舉，出來擔任緝私的職務了。徐寶山有時與其徒子法孫到方大先生（名爾謙，字地山）家中作客。方、周二位請徐寶山來，不是沒來由的。

徐寶山於九月十九日，到了揚州。揚州紳、商各界，在教場備筵歡迎。徐寶山到揚州後第二天，即擒捕孫天生，孫天生騎馬逃走，被得勝橋一個鐵匠捉住。徐寶山訊知孫天生劫走運庫的銀子，埋藏在廣儲門內一個僻靜地方；派兵押孫天生去起贓，孫天生在街上大呼：“揚州同胞們，要學我孫天生的為人，我在揚州做了三天皇帝，誰敢說個不字！”

孫天生被殺，揚州軍事就由徐寶山擔任，民政長由李石泉擔任。李於清末曾在湖北做官，由知縣過了道班，宦囊頗豐。揚州某君有“十古怪”的小曲，第一首上半云：“一古怪，觀察公，地皮盜賣宦囊豐，黃魚霸去為娘子，紅頂歸來作典東。”這是說李曾霸佔揚州某剃頭店老闆的兒媳婦作妾，又說李在湖北貪贓枉法，回揚州後開設典當。此人的居官行事，不難想見矣。

民政長公署，設在左衛街東首，一日，李由家乘轎赴署，行到四叉路口，遇上浙江省開來的一些軍隊，替行人剪辮子。因問轎中何人，知是民政長，便大譁道：“難怪揚州人不肯剪辮子，連民政長的辮子還未剪掉呢！”當時就要在街上代剪，李即答應自剪。第二日就在教場

九如分座(茶館)門前,看到民政長剪下的辮子,裝在玻璃盒子里懸掛着,以資提倡。李石泉名為民政長,實為徐寶山所制。這年年終,更為徐寶山軟禁,以至於死。

我的好多朋友,都在民政長公署中任職,他們在長衫上掛一白紙條,上書姓名,好似后日的徽章,但並無公事可辦,不過掛名吃飯而已。其后,職員由數百人減至數十人。

回忆揚州光復

周无方

武昌起義后,揚州立自衛團,舉商會會長周谷人為團長,城內分為廿四區,戶出一人,各執燈籠一盞,夜間巡哨。其時林述慶已光復鎮江,鎮江商會會長于立三(和周為至親)與揚州商會聯系。谷人遂約同方澤山、李石泉同至揚州府遊說。揚州官廳,最高者,為鹽運使司,與揚州府均是旗人,運司無地方之責,而揚州府嵩响,已知大勢所趨,並不反抗。谷人對彼,擔任保護之責。通訊鎮江,以待其來人光復。

這時,忽有孫天生,糾合定字營兵丁,聲言革命;至綢緞店,強取白洋纒,周身纏繞,至運司衙門劫庫,至江、甘兩縣監獄縱囚,囚犯由自衛團押解出城。

次日早晨,孫天生派代表至商會開會,無結果而散。周无方見來人中有一人,系曾在親戚家見過之熟人。一面由谷人向鎮江告急,一面由无方尋其熟人至孫天生處,教以籌餉之法,以為揚湯止沸之計。

晚間至甘泉縣署開會,議定舊兵仍歸舊人帶,民政另行組織。會議時,林述慶派徐寶山來揚。无方遂將經過情形,至徐宅報告。徐遂四處設防,派人捉拿孫天生,又派人搜已失之庫銀。

徐本鹽梟,受招安為緝私營長。揚州人士對彼,頗不信任,於是眾人責問周谷人:“孫天生是假革命,徐寶山是否真革命?”其勢汹汹,大

有与谷人为难之势。無已，无方退去众人，約少数人同谷人至徐宅察看情形。有阮元之曾孙阮茂伯出面，以身家性命担保，其势乃平。

当时，方、李二人，亦在徐宅。谷人所以約同方、李二人者，因革命必須有兵，招兵必須有餉。揚州金融，有兩部分，一在錢典各業，一在鹽务，方与鹽务最熟，李乃在湖北服官罢职归来，認為他有行政經驗。

其时，徐已招集各軍官談話，揚州軍隊，陆营腐敗不堪，惟定字营有实力。徐宝山归降之初，定字营管帶，以下屬視之，此时仍輕視徐宝山，徐乃大言責之曰：“帶兵不能約束兵丁，有何面目以長官自居！”招呼站队，欲与以难堪。谷人等以大事未定，防有內鬩，从中排解而去。

忽来四人，为王子衡、朱鶴儕、張丹斧、朱立哉，云是上海特派員，各有公文，並携帶敢死队二人。徐来时，有林派之帮办二人，一名李敬臣，一名边振兴。李欲置揚州于鎮江屬下，揚州机关拟名“鎮軍都督揚州軍政分府”，而边云：“革命机关，是兩級制，湖北名軍政府，各地应直屬湖北，名軍政分府。”正在相持不下之际，商会上，有上海派来一人名張水天者，无方前去与之接洽，云“特送印信来的”，携有木質印信一方，文曰“揚州軍政分府”，于是邀彼同至徐宅，机关之名称乃定。当晚至場运局接印，即以該处为軍政分府。

次日，發表各人职务。派无方为总务長，虽有此职位，並無事可办。李石泉自居为民政長，仍本其升官發財之志，想借此駕馭徐宝山。一日，李問徐曰：“你想不想做兩淮都督？”徐曰：“大总统不过六年，我但知为百姓办事，不知甚么都督不都督！”后徐与李亦反目。无方見其言之有理，故亦甘心为其屬下。后組織北伐司令部，遂轉入司令部。初亦为閒职，后調副官处一等副官，旋升为副官長。徐之軍事，並不由副官处發命令，均是面諭，副官处备案而已。谷人与方澤山，均不居名义，但担任筹餉之責。至孙中山先生讓位与袁世凱，徐与中央接洽，月發餉十二万元，地方之担負遂免。

徐宝山对革命，本認識不清，至袁世凱当权，即拥护袁世凱，又誤認張勳与袁为一气。当謠言四起之时，徐欲見好于袁；电云“百万男

兒，不难立呼即至，紧要时，当与張勳联为一气。”电去后，一則势大震主，一則張勳实袁之眼中釘，复电云：“至紧要时，当另派得力军队，以为后援，今派徐□□为該軍参謀長，以便参贊軍机。”实即監視之也。数月后，参謀長請假，徐宝山即于参謀长假期中被炸。

徐軍名为一軍，实际只有一师，又护軍营一营，共廿一营。最高將領，有旅長二人，一为張錦湖，一为方更生。此廿一营中，与張有联系者，計十八营，皆其同帮之人；与方有联系者，仅三营而已。徐死后，谷人至运署，請运司出面担認餉需。无方以副官長之資格，領銜保徐宝山之弟徐宝珍代理軍長，电統率办事处，随时复电允許。后将徐軍改編，張錦湖为通州鎮守使，馬玉仁为清江鎮守使，方更生为江陰要塞司令。將徐軍分化后，即轉入軍閥割据时代，与光复無涉矣。

兴化县光复記略

任 洽 丞

兴化县屬于揚州府八县之一，地势極低，四面环水，形若釜底，古称昭陽鎮。其中河港分歧，湖蕩夾杂，向無兵禍。諺云：“自古昭陽好避兵”，即以此也。

辛亥年，忽然傳來武昌革命党起义，地方上老年人，听到这等信息，如魂魄掉落，手足無措。

时县中旅外求学者，相繼返里。我本就学揚州府中学堂，武昌起义于八月十九日，消息傳到揚州时，是廿日。那时，揚城戏院只有大舞台一座，乃某巨紳家丁为班头，聞此消息，遂于次日停演。我府中学乃揚州府知府为总监督；副监督为优貢生刘荣椿。城中秩序漸乱，我們同学中有鬪櫓，系党人，不假而走。我看此情形，請假回里，与旅外諸同学，相聚接談，各述情况。均以大城市主持者較有办法，惟我兴化，乃一水蕩子，行动非船不行，向来避兵易，御匪难。况南官河通泰

县,有神禳关;迤西南通邵伯,有魚鼓湯家庄;北通鹽、阜,有馬家蕩;皆匪窩。西通高郵之三壑鎮,匪勢出沒無常。既有国变,我輩不能坐以待斃,須要想自衛的办法才好。

兴化城守营,腐朽不堪,鋼叉数支,竹桿槍六八根,仅老弱者穿号褂而已,以此御匪,能乎?不能!不若办民团,或十家民更。我县城内外,向分廿七总,每总有土地祠,以祠为民更局。每总有乡約地保。每晚由总局發口号,通知各局。每十戶出一人,晚到局。每十戶門首掛一灯笼。每夜出巡三次,民更用梆子,地保用鑼,遇到可疑者盤查,不知口号者不許通行。如此一来,城中居民,皆以为大禍临头。富戶預备逃难,穷民則哀求衣食。街市不成市面。知县陈廷英,無法維持。

九月廿后,一日下午,謠言四起,云北有大帮匪至,西有匪船探望,城中搖搖欲墜。于是农、商、学三界老少,聚集于城南文昌閣,开秘密會議。其时,农会长郑省三,商会长王小軒,教育会长刘育春,均出席,我亦参加末座。議决具密函至揚州,請徐司令宝山。

当时客居兴化有邵君逸如者,原为揚州人,在揚州開設庆茂福綢緞店,在兴化開設分号。邵与揚州方尔咸、方柳江,均为旧友。遂請伊与徐司令商談,而徐司令即允其請,亲率所部,調来三板炮船数只,軍隊百余人,于九月廿八日晚抵兴化南門大碼頭。廿九日清晨全城懸掛白旗,紳、农、商、学各界,暨城中各学堂堂長,亲至碼頭欢迎,至城內明倫堂开光复大会。其时旧知县亦待罪在旁。徐司令与方柳江登台演講。会后,出示安民,上書“大汉紀元元年”。

又次日,徐司令离开兴化。城中各界,集議民选民政長,通知廿七总居民,約定某日巳刻,到明倫堂开大会选举,用無記名投票法。于是希望当选者,各施手段。我兴化向無党派,只分新旧而已。其时有組織政党者,出現共和团、陸軍自治团,还有僧团。选举結果,得票最多者徐正熙(字咸齋,举人),次多者余宜官(字字春,优貢生,兴化地方自治筹备副主任)。徐固辞不就,余宜官于呈报省方程都督加委給印后,方擇日接印視事。余之当选,即产生于共和团,兴化县政府組織遂不能脱离此团。

嘉兴光复記略

馬济生口述 董巽观記錄

馬济生先生是参加辛亥革命嘉兴光复的一員，参加当时光复嘉兴者，至今尚有四人，惟有馬先生始終其事，本录除由馬先生口述外，並由其他三人加以补充。笔录者附記。

浙江全省的辛亥革命运动，由光复会领导进行。嘉兴人褚輔成（号惹僧）、龔未生等以同盟会會員資格，参加光复会工作。嘉兴旧府屬七县（嘉兴、嘉善、平湖、海鹽、桐乡、崇德、秀水）的光复工作，是由褚龔二人在省联系。在嘉兴的具体工作，是由方於笥（号青箱、时任秀水学堂监督，秀水学堂后改为省立中学，现为嘉兴市一中。）领导进行。当时机关，設在精严寺藏經閣內。

辛亥九月十四日，杭州光复，此时嘉兴进行工作，亦大体就緒。当时嘉兴知府楊兆麟，終日皆醉，無能为力。嘉兴知县孙学智，早与松江方面之革命党有联系。清軍統領为沈沂山，共統兵十营，駐在城区者不足一营，但沈事前有准备；駐王店之赵廷玉营，为沈之主力，王店与城已通火車，半小时許即可到达，因此沈有恃無恐。

方於笥数次派人和沈談判，沈态度强硬，一無結果。方乃急电杭州告急，杭州即派浙江省八十二标第三营管帶顧乃斌，以督队官名义，在九月十七日上午九时許到达嘉兴南門外，即火車外揚旗处下火車。方於笥事前派馬济生持旗等候欢迎，並由馬济生引导在前，軍隊从南門进城，在大街遊行一周，駐于精严寺內。顧乃斌在下火車前，由馬济生报告嘉兴已無問題，除部队下車外，其余行李，医务等非战斗人員，由衛生隊長秦山森（苏州人，日本留学生，现为嘉兴政协代表）率領在嘉兴东門車站下車。

在顧乃斌未到前，方於笥已得杭州發兵复电。沈沂山、赵廷玉亦有所聞，即由赵連夜派鎗船二只，由王店开嘉兴，护送沈沂山及張學

智二人並家屬至加善車站上火車而去；楊亦臨時雇船同行。此夜顧兵未到，而清方官吏俱逃，由方臨時派地方人士查夜防范。

顧乃斌未到而清方官吏俱逃之夜，即集藏經閣商議推舉嘉興分府人選。時金蓉鏡（號甸丞）進士，在湖南曾任知府，頗欲染指，羣眾以金為清朝官僚，拒不接受，乃羣推方於笥為分府。

顧乃斌到嘉興，嘉興軍政分府即告成立。府學堂監督，即改為校長，由計宗堃（號仰先，留日學生，後任為省教育廳長）擔任。分府中職員，現在能記憶者有：總務科長屠伯英。財政科長敖作民。民政科長方書紳，城區人。司法科長沈景山，新豐鎮人。執法官程子良，新篁鎮人。教育科長陳文浩（號叔夔，國畫家，現尚健在）。教練科長馬濟生（現為嘉興市政協委員）。參事吳筱盧。財政科員沈伯勛（現尚健在），城區南堰人。總務科員陶伯鴻（現尚健在，住上海）。

軍政分府人員，各佩紅色布條。清防軍見顧新軍入城，即派代表表示投降，由馬濟生傳令集合，点名各發白布纏臂為憑。顧乃斌到後，即分派人員，四出召集沈沂山原統之八營頭目，到城听令。另外就由杭帶來之新軍，分組赴各鎮安民。

九月十七日嘉興光復，除全城戶戶挂白旗之外，一切照常。當時大街行人熱鬧，在下午二時左右，軍政分府得報，說南門外絲行街頓時白旗收盡；經派員前往查明，方悉有一破落地主夏老四，在絲行街大放謠言，說清朝將張勳大兵就到，挂白旗的人家，盡將殺頭；因此，人心恐慌，白旗頓時收盡。分府立即派人拘捕夏老四，訊審屬實，即行押赴角里街鎗決，人心始定。

南京战事略記

莊 晤

編者按：本文为当事人所撰，对于研究辛亥革命史有参考价值。原書由楊績彥先生保存，系新聞紙四号字鉛印。原書無出版处与出版時間，只在第一頁印有“編輯者莊晤，校對者楊發春”字样，另外在封面上有“云南公会印送”戳記。

緣 起

此余从黎（名天才字輔臣云南）、由（名犹龙字霽云云南）兩君征南京时所記也。当武汉举义之初，黎君統粵兵駐吳淞，由君則奔走滬上，籌备进行。其抱种族思想已非一日，借書肆之名，在滬布置一切，並秘运输各項革命印刷物。及武汉义旗高張，心热如焚，遂往吳淞晤黎君，指陈利害，密商大举。黎君素稔大义，又感于由君之热誠豪爽，一諾無辞，毅然以光复为己任。爰將所部將士隶吳淞軍总司令李燮和之軍下，決議于九月二十五日〔11月15日〕兴师往攻南京，时即武汉举义之第三十五日也。余負劍从軍，于当时实况，随草随录，集为是編。恐久而遺忘，特擇書其要，以为哀集战史者之一助。至詳細战况，茲編尙未逮焉。

序

吾友莊晤氏述《南京战事略記》一篇，于黎天才統領由犹龙參謀二君之事独詳。盖当时莊晤氏适从黎由二君于軍中，故所記載于本軍之事独詳。且南京之役，二君亦特奏偉勳，發幽闡微，亦春秋之大义。其居心之正，下笔之严，誠非淺識者所能臆度。書成，命予为序。予于是役深服由君之韜略，黎君之义勇，私心窃慕，爰不揣固陋而为之序。嗚呼！茫茫禹域，荆棘叢生；蚩蚩愚氓，酣睡罔覺。外交之風

云日急，瓜分之慘禍將來；而清政府猶挾其種族觀念，箝制我大多數之國民，惟恐其愚之不甚，欲舉我四万万方里之土地，拱手而送之他人。斯時也，則有先烈士奔走呼號，焦唇敝舌，甚或犧牲性命以為民軍倡。及武漢舉義，各省景從，不匝月而反正者十有餘省，而南京形式險要，勢所必爭。向非由君之深謀遠慮，與黎君定攻戰之策，則南京之下，未必如是之易且速也。撫今思昔，覺當時戰爭事實炳炳麟麟，真令人思慕于不置也。

南天肖子序

九月二十二日〔11月12日〕，統領黎天才召周汝敦、由猶龍、丁蔭昶密謀舉兵攻南京，時距武昌起義三十五日也。

二十三日，統領黎天才任由猶龍為參謀長，決議明日起程攻寧。

二十四日上午八點鐘，黎君有事于蘊藻濱。由君乘車往見，遇李實君亦在彼處，遂同登車。及抵申，黎君往謁滬軍都督，由君與沈劍侯同至都督府。見黎君曰：“欲定大事，非速攻南京不可。南京一日不下，武漢必危。武漢不支，則長江一帶，必不能保。滿虜之燄復熾，祖國亡無日矣。”黎君曰：“老夫計之久矣。”遂命由君整裝，且告之曰：“此事非君輔予不可。”於是遂各歸寓，收拾行李，約于滬寧車站相會。至則督隊官楊正昌、隊官曾忠體、顏得勝、石得勝、鄭玉貴、書記官丁蔭昶、徐源森，軍需官黃光五及楊正剛、鮑宏宇等偕兵士均到，遂同登車，士女歡送者不下二千人。歡呼之聲，直沖雲漢。由君慷慨憤激，因自顧曰：“此行戰不勝，決不生還。”同車有吳淞軍參謀朱庭燎君謂由君曰：“此來特送君等至鎮江耳。”由君因與談大勢。至蘇州車站，有督練公所執事數人來慰問，並給兵士茶食。復開車至常州，其地土人，亦以桶盛茶，徧飲我軍，招待優至。由君因謂黎君曰：“此行不破南京，其何顏見蘇常之父老乎。”晚十二句鐘至鎮江，甫下車，該處商會，即派代表來迎。謂敵會已為貴軍尋定駐所，在金山河之油坊，距此四五里，遂率軍隊至該處泰安棧住宿。和衣就寢，時已四更矣。

二十五日晨，黎由二君同至金山河，謁鎮江都督林述庆，及各省聯軍總司令徐紹楨，參謀陶駿保諸人，約于次日為軍事會議。

二十六日，黎由二君至鎮江都督府會議，在座者有聯軍總司令徐

紹楨及浙軍統領朱瑞、鎮軍統制柏文蔚、蘇軍統領刘之杰等。徐君出南京地圖示于众。因言曰：“南京險要，首推烏龍幕府兩炮台。清將張勳，以炮兵守之。兩山不下，万难得手。尚有紫金山、雨花台、浦口、天保城，皆必爭之地。諸軍須各任攻一处，分兵进击，方可成功。”于是黎君首任攻烏龍幕府；浙軍任攻紫金山；蘇軍任攻雨花台；柏文蔚徐宝山任攻浦口；林都督任攻麒麟門。分派既定，遂散会。

二十七日，黎君因子彈不足，命由君到滬購办。

二十八日，由君往謁滬軍都督陈其美，旋至高昌庙制造局，領取子彈。

十月初一日〔11月21日〕，由君运子彈至鎮江。

初二日，由君往都督府見參謀許公度，請借輪船运兵。許君言兵船狹小，不能运多数兵士及子彈等，不如改乘火車为便。

初三日，黎君与由君及徐源森、丁蔭昶等，計議进攻烏龍山之策。議决先至龙潭会合各軍，由陆路取烏龍。

初四日，早八句鐘，簡料軍实兵队，至暮始出發。鎮江商会派代表任嘉泰欢送，並以牛肉餅干饋軍士。至高資，适联军总司令徐紹楨駐紮此处，留我軍午餐，並派护从孟某送至龙潭。至已夜十二句鐘，孟导予等往駐大寺閣，席地就寢，兵士野宿。至三點鐘，有部將王明富、郑玉貴捕获高汉廷、李金臣二人，类似奸細。因严詰之。答称系張勳部下炮目，守烏龍山者。且言明日張勳必分兵掩护炮台，統領如不先發制之，則烏龍不可得而取也。由君詳詢二人，知为有心革命者。遂与黎君商議进攻之計，方慮兵力太單，黎君言生平善以寡击众，兵虽少無慮也。由君終以兵力單弱为慮，拟向浙軍借兵一二营，以为臂助。时浙軍駐东陽，距我軍約十五里之程。

初五日黎明，由君徒步至东陽，晤浙軍參謀，議借兵事。該參謀等言貴軍任取烏龍，敵軍当取紫金，各有專責，敵軍無有余兵以借貴軍。由君曰：“貴軍比敵軍較多，而紫金比烏龍易取。今日之事，是貴軍取紫金有余，我軍取烏龍不足，非賴貴軍接应，恐难成功。”該參謀等，乃謂此事須問司令官方可。于是該軍司令朱瑞出見，允借遊击队一营。約先会于西溝渡，更至烏龍山麓，以資掩护，并出地圖相

示，復備馬送由君歸營，時約午前九句鐘。黎君以進兵事電告聯軍徐總司令。徐復電戒勿造次，請俟協商。由君以為時機不可失，丁蔭利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由君之言是也。”徐源森、黃光五等皆力贊成之。遂決計即日進攻。黎君偕由君及丁蔭利、黃光武、王福泉四人率兵隊至西溝渡，少憩，更拔隊向烏龍。行半里許，浙軍遊擊隊管帶金富有亦率所部來會。行抵高阜橋，栖霞汛水巡額外高明誠率父老歡迎于道。且謂公等不至，我輩萬無生理。黎由二君以言慰之。偕行諸人，因徒步甚疲，僱驢四匹，騎至甘家巷，就地為炊以食。食畢。率兵往取烏龍。抵烏龍時，敵軍炮台官汪龍高去鎮江未歸。我軍猛襲擊之，敵軍猝潰。司事何國鼎角崩相迎。軍士急進，遂克烏龍山。至夜二句鐘，有王紹先者來報，明日張勳必增大兵守幕府，請速往攻。黎君於是星夜督兵赴幕府猛攻，寢食俱廢。兵士見黎君前進，皆奮勇爭先，毫無退志。

初六日早八點鐘，聞張勳殘兵尙與黎君所部開戰。由君即命金富有速拔隊往助，至則黎軍已上山矣。先是黎君率兵至幕府，見清軍甚眾，知非猛擊不能取勝，乃大呼蜂擁而上。所部兵士無不一以當十，清軍辟易，黎軍遂踞幕府山，奪其大砲十四門，台官以銀降。時楚英兵輪送來全台砲拴，水師營參將張玉山以水師十三營戰船四十只來歸。下關東西炮台官何耀璋率所部悉來歸。又有英法德日各國兵船將士皆來相見，總司令官要以嚴守中立，並請其將兵船駛出三十里外，各國無不聽從。

初七日，我軍因得各降軍之助，兵械悉具，黎君遂舉砲攻儀鳳門。由君主張宜以砲之主力攻北極閣，余力攻總督街及獅子山。因北極閣為張人駿、鐵良、張勳固守之地，總督街為官吏麇聚之所，吾以巨砲轟之，則彼軍心必亂，或逃或降，南京可即日攻下矣，黎君從之。時清軍乘公清小火輪越江下駛，冀襲我後路，我發砲擊沉之。是日浙軍攻紫金山取小龍尾，擊斃清軍門王有洪、管帶董開基；鎮軍攻麒麟門；滬軍攻天保城。黎君命由君偕顧參謀淵至鎮江請餉，兼運子彈。由君至鎮，晤營務處王君，又至金鷄嶺晤參謀馮漆兩君，為述請餉事。兩君難之。時兵站處楊華君，奉吳淞軍李總司令燮和之命，解牛酒至鎮

江。由君因謂之曰：“今降者日众，而餉又無措，將奈何。”楊君囑致書吳淞軍參謀朱庭燎、黃漢香諸人，令籌餉，並任向李总司令处代白情形。

初八日，楊華君果自吳淞归来，出朱庭燎書，饋我軍牛肉四百合、餉銀萬元、子彈十萬、酒十二罈。又廣紹公所執事持棉衣三百件來，言此次取烏龍，廣軍之功最偉，謹以此遺軍士。廣軍即我軍也。于是由君赴鎮江海軍處請備船隻，該處遂備一小火輪、一民船，並派兵送我軍人物至船，兵士勤懇備至。時已晚六點鐘，船始開行。夜十二句鐘，至烏龍山。賞諸軍士酒食訖，復登船。砲聲隆隆，子彈如雨，拂面而過，眾知為民軍之誤，由君乃大呼停止。查發砲者乃建威兵輪管帶鄭倫，聞呼聲始派人來問。由君問何故自相殘。答云林都督命令，近日兩方開戰，凡有輪船往來者，擊勿論。既系貴軍，何敢相犯，言訖而回。我軍復駛向幕府山進發。

初九日，由君至幕府山與黎君相會。黎君言昨日與敵軍開戰，敵砲中我火藥局，爆裂之聲震搖山岳，擊傷我督隊官楊正昌甚重，兵弁受傷十餘人。又因子彈不足，亦于昨日派人赴滬請領，已獲數十箱。午後二句鐘，偵探來報，張勳兵來挑戰。我軍排長羅羣書率隊應敵。敵軍至寶塔橋，與我軍接戰。彼眾我寡，我軍伏橋畔蘆林中。敵軍不知虛實不敢渡橋。我擊斃其隊官一人，傷其兵士十餘人，敵軍遂退，我軍受傷七人。兵士顏貴廷欲渡橋，取其隊官首級，被銃而死。是晚我軍、蘇軍、鎮軍、浙軍與敵軍互為砲戰，聲隆隆不絕，我軍砲中北極閣，張人駿、銜良縋城而逃。

初十日早七句鐘，我軍開礮攻擊，連發十五礮，敵軍不動。午後一句鐘，拿獲清斥埃徐姓三人斬之。又發十五礮，敵軍仍匿不敢動。有官成現者進言曰，城內清軍，均無意抗我，我反击之，是不義也。由君駁之曰：“清軍雖無意抗吾，然張勳臨之以威，終必擊我，而我不報，是坐以待斃，不可一也。我不急擊，彼以為我無斗志，必尽力猛攻，是張彼之威，示我之弱，不可二也。諸友軍皆發礮，而我獨寂然，人其謂我何，不可三也。”黎君聽之。乃拔刀斬木誓曰：“有敢不發礮者視此。”

十一日〔12月1日〕早八句鐘，浙軍參謀來書，調金富有回本營，以

一队留助我軍。又接徐总司令命令，發礮攻击。旋因天色已晚，彼此停战。

十二日黎明，發礮攻击，方三礮，軍士来报獅子山白旗招展。黎君大喜，急欲入城，乃宣言曰：“有能奋勇前敌者，賞洋千元。”众皆鼓勇願往。有队官藍得胜、曾忠体、石得胜、郑玉貴、陈秀华、王明富，排長罗羣書、关炳兴，馬弁白志祥，浙軍金富有等，皆願当先。时早九句鐘也。黎君遂率軍士由下关入仪鳳門，居民安堵如故。軍士紛紛执張勳兵来，由君命押至獅子山。山上台官王广洲以大礮八尊，將士百一十七員来归，且言久思反正，因为張勳所牵制，故迟至今日。今得効力民国，于願足矣。由君遂撫慰之。众軍士請杀張勳兵，由君坚以为不可，且曰：“諸兵虽尝敌我，然各为其主，不足为咎，况今既降我，尤当不追其既往，其不可杀者一。今浦口犹未下，使我杀降，則未降者，必出死力以抗之，且汉陽已陷，南京甚危，奈何坚清軍致死之心，使我四面受敌乎，其不可杀者二。清軍既不能敌我，而又不能降，無路可归必流而为盜，以殘吾民，其不可杀者三。彼之降我，視乎我之能受与否，今吾釋已降之兵，以宣言德意，則降者必踵至，如是則清軍瓦解矣，其不可杀者四。”众軍士皆服此言，遂受張勳降兵。于是由君乃与黎君往見都督林述庆，又派曾忠体取清凉山，夺其大礮五尊。复假劝業道署，为軍隊暫駐之所。有張联陞率所部一营来归，由君力劝黎君优待之。又收江防二营，获快銃一千二百二十枝，子彈万顆。且获江甯提学司銅印一顆。至商品陈列所，由君告黎君曰：“此間一器一物，皆吾民膏脂，若吾輩保守不力，乱兵乘机掠取，何以对甯人，請統領派兵严守。”黎君然之，遂命參謀顧君淵徧用封条封之，至今得無損失者，皆黎君竭力保护之功也。是晚光复軍馮參謀至自鎮江。夜十句鐘，由君至都督府見徐固卿，各陈降兵甚多，需賞与餉。徐公謂权在都督。由君复偕馮君顧君詣都督府。方行至鐘鼓楼，槍声大作，子彈从由君肩側飞过，遂同避入民家。至槍声少息，乃出詢之，始知各軍因口号不合，开銃对击。由君此次遇險，幸未中，遂回营。

十三日午前，黎由二君会苏軍統領刘之杰，參謀張鼎勳二人，商举江苏都督事。黎君曰：“选举权非軍人所宜有固也。但南京以軍人取

之，則临时都督之选，軍人似可与聞。以予觀之，可胜斯任者，則程雪樓先生其人也。”二人頷之遂去。旋徐总司令約黎由二君至諮議局，會議攻浦口事。又議決電迎程都督于滬。是日軍士縛滿人数十名來獻，內有德參將之子，面有惧色，自意必死。由君曰：“吾人所以复滿洲皇室者，为其亲貴把持朝政，招权納賄，以毒吾民也。諸亲貴無一不当誅，彼平民則何辜。吾烏能枉杀一人。”遂命尽釋之。

十四日，由君向黎統領处領來銀四百元，犒賞三十三标房內兵士。当时張君联陞謂此标应归胡隆三統領。由君即向徐总司令处言，兵方新降，而統以旧將，危道也。請將此降兵改編，更隶黎統領。溯江上援，則中国之兴，在此一举。徐然之，即命归黎，胡亦不复爭執。后因餉項不繼，复請于林都督，获助二万元。

十五日，由君至儀鳳門，按視守城兵士。各礮台將官，咸來領餉。自是由君專任整頓兵队事，徐源森、丁蔭昶二人任書記事。

十六日早，徐司令約黎由二君至諮議局，出黎都督元洪求援之電相示，且云：“自漢陽失利，武昌望救甚急，非貴軍往援不可。”徐因擬電复黎都督有云：“各軍血战七晝夜，疲困不堪，惟黎天才一軍，驍勇善战，堪以援鄂。”由君复啟曰：“北軍胜我者有四：體質强一；器械精足，馬礮工輜备二；北軍六鎮，訓練有年，我軍半皆防营，未諳軍学三；北兵生長寒帶，时方冬令，彼尙衣皮，我軍半服單衣，恐难耐寒四；然我軍所恃者，在軍气壯，軍心固，此致胜之由也。而兵力过單，器械不足，且兵無棉衣，其何能行。又敵軍統領黎君，虽稍負一时之望，然以区区二营，援鄂何異螳臂当車。率尔委之于敌，一旦敗北，不独無以对黎都督，將何以对江东父老。愚意非增兵械軍服不可。”徐公是之。复曰：“如君言增兵甚急。但各軍俱疲困，即撥归我，亦不足用，且人之軍，其肯撥乎。”由君又曰：“他人之軍虽不可撥，江防营豈皆不可撥耶。”遂指某某等营以实之。且謂新召之卒，不若此久編之防营，尙觉可恃，請勿以新降見疑。徐公大韙之，議遂定。

十七日，徐总司令以三营撥归黎君，黎君还其一营，留二营以为助，即今之五六营也。

十八日，米占元見黎君，願以所率五营随行援鄂。后为某軍籠絡

遂不果。由君又往見林都督，乞以竇国治、赵荣华所部兩营同行。

十九日，張联陞引赵荣华来見。由君謂联陞曰：“君知我軍增兵，志在援鄂乎。苟不援鄂，何須多兵。既合兵而復圖苟安于南京者，此善趨避伪志士之所為也。”因說以誠摯之語。赵为感動，且矢弗他。

二十日，黎君往閱竇赵兩营之兵，皆無軍裝，由君深慮之。徐丁兩君請再見徐司令，乞檢視軍械局，如尚有可用之槍，撥歸本軍。由君遂往徐司令處商議，徐允照辦。

二十一日早，徐司令出軍械局之存單視之，皆旧槍不可用也。少頃，程都督派其參議官彭炳吉来相見，因問及品物陳列所。由君告之曰：“已派人監守，並加封，當無遺失。”時因各礮台加关半餉，我軍亦如之。軍用早罄，李燮和、徐固卿兩司令，均告匱，黎君慮之。

二十二日早，各礮台之人皆来，以反正自矜，且有要挾意。由君駁之曰：“公等既願反正，何不效海軍之早插白旗，乃迟至今日，潰敗之余，又將以反正飾功，是誠何心。况海軍反正后，民軍大得其助，彼犹不矜其功。公等無功，而餉已倍，今尙出此恫吓之詞，黎統領其能屈乎。公等休矣。”彼等遂無辭而去。

二十三日，程都督至甯，黎君往見于諮議局。都督謂金陵之克公之功也，黎君遜謝者再。程都督復促我軍援鄂，且言武昌都督望甚切殷。黎君因請增置軍械，程都督允為設法。

二十四日，北伐總司令林述庆約由君議事，由君与朱鈞石往見。林謂貴軍既不完備，我代貴軍組織一鎮，餉械均由我代籌，以為北伐軍隊何如，由君曰：“援鄂即是北伐，北伐即是援鄂。總之清廷未倒，為軍人者必無苟安南京之理。愚意惟援鄂事稍急，而北伐較援鄂為緩。容与黎統領商之。”遂歸。黎公召集徐丁諸人計議。僉謂由君所言甚是。但以众多之兵，餉械悉無，焉能援鄂。不如姑从林軍出發臨淮，速攻穎壽，則鄂圍自解，乃圍許救鄭之策也。議決。遂允林北伐，名為北伐第三鎮。

二十五日，由君往謁林君，聞已去上海，因与參謀許公茂相見。許謂約二十九日即挈餉械以來，不日當進發也。是夜李燮和司令部

馮參謀倉皇來告曰：“敵處因解散偵探隊十人，彼等不服，戕我參謀一人，擊傷鄒參謀，又搶去銀洋六百元，今且謀盡殀我輩。”由君稟知黎公，公大怒，謂軍人如此，罪何可赦，命由君往查。因邀鄒參謀序彬歸本營。黎君出令曰：“有拿獲槍击上官之兵者，每名賞洋五十元。”王明富應聲而出，遂率二十人去。

二十六日早，王明富來報，已獲兇手二人。黎公命處斬，黃漢湘楊承溥力諫不可，卒斬之。

二十七日，劉之杰邀由君往坐，劉問何日出發。由君問以撥礮二隊之事。劉曰：“現在槍枝缺乏，悉令有槍者出發可也，無取乎礮隊。誠以我之山礮，不及敵之陸礮也。馬匹則此地無之，因此時亦無以馬為也。”由君曰：“礮為軍之骨干，在武昌猶可不用，至河南則不可不用。又軍官佐皆須乘馬，且我軍若能解武昌之圍，當即攻武勝，取河南，掃京燕，無馬則不能做到也。”劉唯唯。由君復往見徐固卿君，力請給礮。徐命令至軍械局，乃獲領山礮六尊，合原有六尊，為十二尊，始命魏華新練礮隊。黎公以槍彈不備，命由君乞助於滬督陳其美，兼往滬配機關礮什物。是日即接黃興君來電致黎公云：“金陵克復，實仗勁旅之功，至深景佩。聞程都督已命公援鄂，未審行旌何日”云云。

二十八日，由君乘早車至滬見都督陳公，告以一切。陳公云：“槍械此處亦無，俟購得時即助數百枝。至機關礮什物，命製造局配齊可也。”

二十九日，由君返甯。林公來邀我軍出發，餉械仍虛，乃議先俟有槍者出發，至滬再購槍枝。劉之杰送來馬六十四，半皆垂死，又無鞍，黎公因命返之。

冬月初一日〔12月20〕，程都督召黎公往議援鄂出師之期。公告以初四日出發。由君往見徐固卿君云：“昔許我蘇軍礮隊二隊，今待用甚急，請如約。”徐公謂此事一時尚不能辦到。且謂黎軍已有步隊四標、礮隊一營、機關礮一隊，可增至一鎮，有不足者，予當言于程都督，陸續足之可也。由君如言編制。甯軍援鄂第一鎮之名自此始。於是黎君升為統制，張聯陞為第一協統領，由猶龍為第二協統領。

初二日早，由君奉黎君命令，往滬歡迎黃興君（黃君已舉為元帥故也），并謁見陳都督，請派船至甯，運我軍赴鄂。

初三日早八時，由君往謁黃興君，往返凡四次始得見。都督府亦來報告，所請之船，業已開去。由君即電甯通告黎公。

初四日，由君乘車返甯。甫下車，聞第一協張聯陞已開往下關，由君即往見張君，而船尚不至。電詢始知遇霧未開，由君即與張君宿于旅舍。

初五日進城，大雪愈甚。少頃，聞報船已到甯。由君即與張君料理出發事，且命礮隊魏君開往三十三標兵房駐紮。是日黎公接陳其美來電，金陵克復，君之功居第一云云。

十四日〔1912年1月2日〕統制黎天才君率張由二統領及所部將士起程援鄂。

自九月二十三至冬月十四前後五十餘日，為光復南京之過渡時代，此後赴鄂，名目不同，時事亦異，茲編故未及載。

本刊徵求下列資料

1. 有關“五四運動”的原始文件、回憶錄及書刊。
2. 湖北學生界、二十世紀之支那、新廣東、新湖南、醒獅（1905年）、復報、漢帙、國民報、新紀元、河南、四川、滇話、漢聲、越報、洞庭波、第一晉話報、揚子江、夏聲、粵西、豫報、江西、漢風、天義報、雲南（21、22、23號）、浙江潮（11、12號）及辛亥前後的其它報刊。

五四运动在天津

馬惠卿

編者按：本文記述五四时期，天津人民的爱国运动，可供研究五四运动史的参考。惟本文于学生运动方面較詳，至于当时天津工人与广大羣众的爱国运动情况，还希望讀者再为补充資料。馬駿烈士与郭隆真烈士为天津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今年又是馬駿烈士就义三十週年紀念，故特將《中国共产党十五週年叢書》中的馬駿烈士傳重印，並特請刘清揚先生撰馬駿烈士与郭隆真烈士傳，一併刊出。

前 言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軍閥政府反动統治的偉大爱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由旧民主主义革命發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件大事情。

“五四”运动的消息傳到天津，一些革命知識青年首先响应了这个偉大的爱国运动，組織了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各界联合会等爱国团体，領導着全天津的各界市民，举行了許多次轟轟烈烈的示威大遊行，实行抵制日貨运动，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視。天津学生爱国运动所以能够收到極大效果，主要原因是由周恩来同志領導的“觉悟社”在这一运动当中起着骨干作用。

当时北洋軍閥百般的对于爱国运动加以迫害，但是爱国知識青年們並沒有被吓倒，相反的斗爭的意志更坚强了。

“五四”运动已經过去三十多年了，回忆当年在天津参加革命运动的人們，有一部分坚貞不渝，繼續奋斗，前仆后繼，成为革命的中坚分子；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投入反革命集团，成为反动統治的工具，此外尚有从革命陣营中退出的人，已經被时代的洪流所冲倒，多已沒沒無聞了。在今天追記“五四”运动在天津的活动情况，一方面是追述当

年在天津的爱国知識青年，在“五四”运动当中那种英勇奋斗的精神，值得使后一代的青年向他們學習；另一方面是为了記錄有关史料以供研究“五四”运动者参考。

本文的内容，只是編述当年一些比較主要的革命斗争史实。其中有部分初稿，曾于一九四九年前天津《进步日报》、前天津《新生晚报》發表过。其后又搜集当年天津《大公报》、天津《益世报》的記載加以补充修正，并且还送經当年参加天津“五四”运动的刘清揚同志审閱和校正。刘清揚同志又为本文提供了許多史实，使内容較为充实。附此謹向刘清揚同志致以謝意。 馬惠卿 1957年

一、“五四”的火燄燒到天津

学生联合会成立：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傳到天津，各中等以上学校有南开、新学書院、北洋大学、北洋法政、水产、成美、官立中学、私立法政、高等工業等九校学生紛紛集会，为了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在5月6日晚間，各校都推举出代表，举行了會議；並在7日組成了“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公推張鑑暄为会长，馬駿为副会长，譚志篤等六人为干事。会上决定进行办法：1. 拍电政府急速开釋被拘学生；2. 致函上海各校学生、各省学界、国外留学生会一致行动；3. 派代表九人分赴直隶省教育会、天津总商会、直隶省省議會等三处，請組織公民大会于天津，以便喚起公民明白“五四”运动的重大意义。各校学生还都在本校举行了“五七”国恥紀念大会，水产、北洋等校还議决了抵制日貨的办法。

北京政府在5月4日逮捕了爱国学生三十二人，北大学生郭欽光激憤致死，更激起了全国学生的憤怒，北京政府为了平息学潮的扩大，在5月7日就把逮捕的学生一律釋放。但是北京学生团体因为外交还没有胜利，卖国贼还没有受到惩办，决定繼續斗争到底，並組織学生代表团分赴各地宣傳。5月9日有代表团二十七人，到津市各中等以上学校进行宣傳“五四”爱国运动意义，給津市各校同学以極大啟發教育。5月12日下午一点鐘，津市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一千多人，在河北公园直隶省教育会內举行追悼北大学生郭欽光烈士大

会。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在5月14日实行改组，在河北水产学校内召开了各校代表会议，正式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票选譔志篤（高等工业学生）、馬駿（南开中学学生）为正副会长，李之常、韓嘉栋、盧致德、易守康、賈玉麟、刘澤霖等分别为文事、交际、调查、講演、会计、庶务等科主任。在大会上并决定了大会今后的任务。从这一天起，各校学生都组织了爱国講演队，开始在街头上講演，羣众对“五四”运动有了初步認識。5月23日全市各中等以上学校实行罢課。

女界爱国同志会的組織：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得到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5月5日就由該校同学郭隆真（即郭林一）、邓穎超（即邓文淑）等召开全校同学紧急会议，计划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該校畢業同学刘清揚得信也赶到母校，参加会议，受到全校同学的热烈欢迎。会议决定联络中西女中、普育女中、貞淑、高等女校等校同学联合筹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在筹备期间，就以实际行动参加了爱国的斗争。5月25日在义倉街江苏会馆开成立会，公推刘清揚为会长，省师附小教员李毅韜为副会长，郭隆真，邓穎超等为評議委員，王天麟（即王瑞生）等为总务委員。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由許广平負責主編《女师週刊》。

各界联合会成立：天津的各界市民自从“五四”运动展开，经过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宣傳教育，经过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共同联络并动员，很快的就组织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参加的單位極其普遍，包括有工人、学生、妇女、教育界、新聞界、工商界、士紳、宗教界等三十多个团体，有一百七十多个單位。在1919年6月18日宣告正式成立，选出卞月庭（商会会长）为会长，馬千里（学界代表南开中学教员）、刘俊卿（报界代表）为副会长，并选孟震候（报界代表）为評議部主任，韓致祥、王厚齋、聶醒吾、时子周、刘清揚、杜小琴等为干事（商界暫空），选出譔志篤（学联会长）为总务部主任，李秋岩、馬仲三、李毅韜、王醉生、陈宝禾、李頌臣等为干事（商界暫空）。

打破封建女学生参加学联組織：“五四”运动初期，由于封建束縛，男女学生分別組織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学生联合会中并未包括女学生。但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因实际工作的需要，男女

同学必須共同合作,才更可加强斗争的力量。到十月間,男女同学毅然冲破了封建枷鎖,女学生加入了学生联合会。凡是动员羣众和宣傳教育工作,男女同学都共同負責。女学生方面决定推出邓穎超、張若名、王天麟等优秀骨干去参加学联工作。当时邓穎超同志担任学联会的講演部長,以她的热情爱国宣傳講演的才能,就給爱国羣众以很大的鼓舞和教育。張若名为执行部長並参加評議委员会工作。刘清揚、譚志篤二人为天津学生联合会代表,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为常务理事。在这男女合作的过程中,証明了妇女的工作能力並不落后于男性,因而更使大批妇女有了信心和勇气冲破了封建束縛,为爱国运动而奋斗。这也正是妇女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同时为了更广泛的团结各界妇女参加爱国运动;女界爱国同志会仍保存活动,更加扩大發展,並在运动过程中結合提出了有关妇女解放的一些要求如:“社交公开”、“結婚自由”、“大学开放女禁”、“职业机会均等”、“女子应有财产繼承权”、“保护母性”等口号。热烈地为反帝反封建而斗争。

二、遊行講演警厅干涉

学生首次罢課:天津从5月14日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成为领导学生运动的总机构,各校学生紛紛組織講演队,在学生联合会講演部的統一领导下,不顧警察的干涉,大批的出現在市內各馬路。講演的学生們都充滿了爱国热情,沉痛的講述日本帝国主义想灭亡我們中国和夺取青島,霸佔我們山东一切权利的前后經過,还給市民們講述朝鮮所遭受的亡国痛苦。講演的学生在講話时,激憤的痛哭流涕,听众受了很大感动。所以学生講演队每到一处,市民們总是圍着不走。学生們每天在街头演講,把嗓子都喊啞了,他們却从来没有怕过累而停止。学生講演队出現在街头不久,天津警察厅就严厉禁止学生講演,不服者就予逮捕。講演队仍然想办法出来講演,就把大队化整为零的三兩個人一組在街头活动。5月23日全天津十五个中等以上学校(北洋大学、直隶法政学校、直隶第一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南开中学、官立中学、孔德中学、成美中学、大营門中学、直隶水产学校、育才中学、扶輪学校、私立法政学校、新学書院、甲种商

業學校)，約有一萬多學生實行罷課，並發出宣言，散布傳單，同時拍電北京政府提出六項要求。茲將其宣言書及拍電照錄于后：

天津學生聯合會罷課宣言書

嗚呼！吾國已不國矣，吾民已不民矣！賣國賊獻媚日本，不惜斷送我吉林森林金礦、南京鐵路、安徽銅礦、大沽造船廠、漢冶萍公司均拱手奉之日人，只顧私肥，不顧我祖宗締造之寶藏矣。近青島變作，固是日人侮我，實亦賣國賊等專逞武力對內有以致之。又高徐、順濟二路足制山東、直隸死命，而吉會路線、南潯路線之延長尚在其外，今則大借款四萬萬又以田賦作抵見告矣。嗚呼！賣國賊等之肉其足食哉！以故日本留學生愛國心切，羣謁代理公使莊景珂，莊拒不見，且勾引日本兵警密布于公使館內外，如臨大敵；且兵警竟舉刀亂砍，且以馬隊衝踏留學生，血肉橫飛，傷三十餘人，重傷垂危者十餘人，並將留學生手執國旗奪去侮辱，拘捕學生入獄共五十餘人，至今猶在監獄中受無窮之痛苦者十餘人，誠吾國莫大之恥辱也。京師學生深恐國亡無日，萬劫不復，義憤填胸，忍無可忍，羣起與賣國賊拚命，志在除害救國。乃賣國賊等竟令巡警拘捕學生，並將郭欽光打死，賣國賊等凶橫方張，貽禍吾民，苦何可言。是可忍孰不可忍。以是北京二十七校學生已一律停課，上海又已繼之，況湘鄂寧諸學界愛國熱度均極高，亦見各報。天津學生自應當仁不讓，羣起以繼京滬后，並聯合全國學生毅然抵制日本，且殺盡賣國賊以自救亡，此吾青年之天職也。願吾四萬萬同胞速醒猛醒，以挽外交之失敗，以圖內政之改良，吾民幸甚，吾國幸甚。

致北京政府電

大總統國務院鈞鑒：邇自外交失敗，姦邪盈庭，北京學生迫于公義，一致罷課，懇請外挽主權，內鋤姦邪，未邀俯允，時機緊促，稍縱即逝。學生等不得不與全國學生一致行動，全體罷課，再申前請，惟我大總統國務總理留意焉：（一）請政府明白宣布青島由日本處置一條絕不簽字；（二）請將中日二十一條協約提出巴黎和會，請求廢止；（三）請設法取消民國七年參戰軍密約；（四）曹汝霖、章宗祥賣國，國人共知，請斥罷交法庭嚴懲；（五）傅總長、蔡校長教育界泰斗，請收回准免命令，挽留回任；（六）日政府拘毆留學生並侮辱國旗，請嚴重交涉。以上六條如蒙允准，學生等即日上課待罪，否則全國義憤所在，未能輕已也。天津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叩。

學生聯合會又推派代表王連生去山東調查抵制日貨情形，並和山東學界取得聯絡。推派袁祥和、楊興厦去上海與學界聯絡。直隸省教育廳長王章祜因為天津學生罷課，特召集各學校校長開緊急會議，指示對待辦法。在學生罷課以後，海關一帶的搬運工人開了全體會議，決定不給日本進天津的輪船卸貨。天津總商會在5月28日也公佈提倡國貨辦法七條。

遊行請願受到限制：北京政府見到各地學生罷課風潮擴大，一方面宣佈了青島問題的真相外；同時通令各地學生即日上課，听候中央解決。而北京學生講演團還是照常在街頭講演，北京軍警在6月1日開始逮捕了大批的講演學生。上海商界為了聲援北京學生，實行罷市。天津學生聯合會在6月5日上午十點鐘約集了學生一千多人，在南開中學廣場召開了第一次愛國運動大會，學生聯合會副會長馬駿宣讀了六項誓言：1 誓保國土、2 誓挽國權、3 誓雪國恥、4 誓除國賊、5 誓共安危、6 誓同始終。馬駿還宣佈會後全體遊行，齊向省長公署請願，提出要求三項：1 請對學生講演勿加干涉；2 請省長電中央釋放北京被捕的學生，並將青島爭回，將二十一條取消；3 請准開公民大會。宣佈後，下午三點大隊將要出發，突有軍警大隊把學生包圍，禁止遊行，雙方爭執多時，學生隊伍奮勇闖出，特別是女師和中西兩校女生的隊伍首先破圍出來，軍警攔擋不住，只得隨着學生隊伍遊行。到省長公署時，只是由學生代表馬駿、譚志篤、易守康、沙主培、孫毓麟五人去見省長，省公署稱省長不在，由省公署副官長代見。學生大隊在四點多鐘，都在軍警監視之下，各返本校。

當天下午警察廳長張汝桐發出佈告，嚴禁學生遊行講演。佈告原文是：

為佈告事：照得本日各校學生在南開地方，聚集千余人，任意遊說，並擬結隊遊行。本廳以其逾越軌道，妨害治安，當即會商教育廳，稟承省長派撥官警前往勒令解散。查禁羣眾演說以及散佈傳單，並各種印刷品，均早奉大總統明令禁止，合再剴切佈告。嗣後如再有遊行演說散佈傳單及各種圖書情事，無論何人，本廳一律禁止，其不服制止者，即依法逮辦，決不寬容。此佈。

再接再厉二次請願：6月5日学生遊行队伍在軍警監視之下，各返本校，学生联合会当天晚上就研究下一步抵抗的办法。6月8日早晨，警察厅突然派馬队三百名包圍了罢課的北洋大学，禁止学生出入，北洋大学的講演队从那天起就沒有出發。同日，河北公园內私立法政学校和河北高等工業学校，也被警察厅派有武装保安队在学校搭成帳棚，常川駐守，因而这两校的講演队也被阻不能出發。但其他各校如南开、官立中学、成美中学等許多学校的学生，在6月8日那天依然躲避警察的監視，早晨起来就到各馬路講演，並且互通声息。在下午一点鐘都集合在东南城角，共有一千多人，于是結队遊行，經东馬路、北馬路，来到总商会門前，推由譚志篤、馬駿进去。总商会会长叶蘭舫、副会长卞月庭和代表接談。代表等就把上海等处的商界響應“五四”运动，都已經实行罢市的情况告訴他們，要求天津商界也有所表示。叶蘭舫答应9日一定召开紧急會議，商討罢市問題。学生講演大队离开商会，又轉赴省公署，为警察厅禁止学生講演事請願。学生大队来到省署东轅門前被衛兵攔住，由刘參謀長出見，学生代表坚持面見省長。刘參謀長进去不久又回来，引导学生代表譚志篤、馬駿、潘开太、安毓文、沙主培等十一人进署面見省長曹銳，說明請願理由，提出了几項要求。經過代表等表示坚决意志，最后，曹銳答应了下列要求：1、准許自由講演；2、成立講演所；3、不用警察“保护”（軍閥政府称干涉为“保护”）；4、6月9日在河北公园召开公民大会。代表等認為結果圓滿，請願的队伍在晚七点多鐘离了省署。馬駿等前往高等工業学校，大家商量6月9日公民大会的筹备工作。代表們还决定从6月15日起，为了維持市內各馬路交通起見，改在各宣講所內举行講演宣傳，並規定每天講演時間从下午四点到六点，七点到九点，露天講演暫時停止。

女界講演队的活动：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初期，即設有总务、調查、講演各股。講演股設有干事十人，專負講演之責，与学生联合会並肩負宣講爱国的責任。以后因为事态扩大，認為只靠学生来救国，力量是很小的，必須喚起各界同胞，共同團結起来。于是更扩大宣傳工作，7月16日成立講演队，由郭隆真、邓穎超任隊長，有計划的

实行分区負責。講演地区以鼓楼为中心，共分四个区：西北区由家庭講演員和女师附小学生以及其他各女校高小学生担任；西南区由女师同学担任；东北区由家庭妇女团担任；东南区由公教女子救国团担任。各区講演队除了在各区講演所和公共场所宣講外，大部分都是去到各住戶宣講。7月20日，女界爱国同志会又集合女师、中西、普育、竞存、贞淑各女校教職員和各校学生会組織了遊行講演队，打破了旧社会的封建束縛，和男生一样不时出現在各街巷作动人的宣傳講演。

三、公民大会盛况

学生联合会为拒签和約扩大宣傳爱国运动，6月9日在河北公园內举行公民大会。那天十点多鐘，河北大經路的行人显着特別的多，三五成羣的都是去公园参加公民大会的。有的是結队前往的，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小紙旗。警察和保安队都是全身武裝，在东馬路、北馬路、河北大胡同、大經路一帶佈崗逡巡。

河北公园里里外外經学生联合会佈置的整齐严肃。在公园中心小亭子里有乐队，亭子抱柱上貼着一付对联：“振民气合民力万众一心，御国敌除国贼匹夫有責！”特別引人注目，它在每一个参加大会的公民的心里烙上了很深的火印。

大会在下午一点鐘开始，到会的公民达兩万多人，各校的学生組成了很多的講演队，会场里設立二十一处講演台。講演的学生都拿着白布旗，旗上写着：“共济时艰”、“匹夫有責”、“不怕死可以救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中国人当爱中国”、“共誅国贼”、“百折不回”、“羣力救国”、“还我青島”、“保护国土”、“提倡国貨”等口号。大会开幕时由学生联合会会长譚志篤、副会长馬駿致詞，报告开会的意义，說明我国外交还没有得到胜利，卖国贼曹汝霖等还没有惩办，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我們人民团結起来坚决斗争。当时出席的公民听了講演，都有所感动，鼓掌欢迎的声音震动天地，羣众們还齐声高喊：“共救国难”、“不当亡国奴”、“取消二十一条”、“还我山东”等口号。大会主席講演完畢，接着各校学生講演队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講演

队就分别在各講演台上向公民做了沉痛的爱国宣傳。

羣众情緒非常激昂,当时就有一个小商人上台講話,他說他是專賣日貨的,从今以后,誓死不再賣日貨了。同时还有一个小学生跑上講演台,用小刀刺破手指血書“睡獅已醒”四个字,感动了羣众,高呼“誓死救国”,並受到經久不息的掌声。通过这一次大会的教育,又增加了人民爱国的热情,加深了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

四、抵制日貨風起雲湧

抵制日貨委员会成立: 在青年学生爱国热忱的宣傳和感召下,有不少行業自动的開大会,商議抵制日貨的办法,像玻璃、海味、麻袋、顏料等几十个行業,都表示抵制日貨的决心。專銷日貨的洋广雜貨、糖、欄杆等行業,也都紛紛自願的訂出了停止訂購日貨公約,共同遵守。各界联合会認識到抵制日貨是日本在經濟上一个致命伤,这个运动是極其重要而且又極其复杂的工作。經過开会討論,关于今后对于处理抵制日貨問題,有另設專行負責機構的必要,決議另行組織抵制日貨委办会,專門負責有关抵制日貨問題,如果問題比較严重的,还由各界联合会处理。並推选馬千里、譚志篤、韓致祥、刘清揚、李毅韜、王卓忱、夏琴西等十五人为委員,在6月24日宣告成立。

跪哭团劝导頑固商民: 各界联合会为了督促各商号貫徹执行抵制日貨办法,特派出調查員多人分批到各行業进行抽查。对于个别頑固不化的商民,採取动員說服的方法,組織一批跪哭团,由学联合会委員于蘭渚領導。团员都身穿白孝服,手拿哭喪棒,專到那些頑固商家去哭劝,来感动他們。每当跪哭团到那一家商店門前,羣众們也都圍滿了門,羣众还都高呼:“奸商們,拿出天良来吧,別再賣日貨啦。”跪哭团去那一商店,如果不达到目的是不会走的。这种办法实行以后,很起作用,同时更激动了各商号店員的爱国心情,帮助跪哭团来向本号經理劝导,不再售賣或批訂日貨。

提倡国貨: 在抵制日貨提倡国貨口号下,天津各界市民都認為買日本貨是太可恥的事,国貨售品所經理宋則久,为了供应市民購買国貨的需要,由全国各地批購各种国产日用百貨物品。該所在報紙上

所登載的廣告文內，特別把各種物品出產地和廠名註明，表示不是冒充國貨，還註明請各界檢查，如有非國產貨品，希望指出。久大公司刊登廣告，特別介紹精鹽牙粉是完全國貨。從這些廣告原文來看可見當時天津抵制日貨的風潮够多么熱烈了。

五、商界罷市

總商會決議罷市：天津總商會在学生聯合會的動員下，于6月9日下午四點鐘召集全體董事開緊急會議，研究罷市問題，到有全體董事和各行業代表六百多人，學聯會代表馬駿等七人也由公園趕來出席旁聽。會議決定先電中央要求懲辦賣國賊，保護愛國學生，限兩日內復電，否則就實行罷市。當時學聯代表馬駿在會場上講演目前正是緊要關頭，大家如不能即日罷市的話，我就必須回到公園，先向公民大會上報告，然後再作決定，馬駿說完話立刻奔向公園公民大會會場。公民大會全體公民表示，如不能即日罷市，全體公民就都到總商會來要求。馬駿根據羣眾意見返回總商會傳達。全體董事和行業代表不能不表決接受公民大會要求，從10日起全體罷市。總商會當晚趕寫公告宣佈罷市，原文如下：

為公佈事：案查此次罷市，原為借此要求政府懲辦曹、陸、章及保護愛國學生，如此項目的達到，即時可以恢復原狀。現聞北京政府已有籌議消息，必有解決方法，日內可望明令宣佈。惟對於工人及工作物品，並小本營業各攤戶等，聽其自便，勿得因是滋擾。其他有關日用必需各物品之各商號，仍照常售賣。恐或誤會，特此通告，望各商民一律辦理，切切此佈。

警察加崗：全市各商號從10日早晨實行罷市後，地方秩序非常安定。學生聯合會恐怕有壞人乘機擾亂，由各校學生聯合組織了“學生臨時警察隊”一大隊共三百人，分佈在各馬路和估衣街一帶。“學生警察”都身穿操衣，胸前佩有白布，上寫：“學生臨時警察”六字。天津警察廳卻通令各區警察值崗時改為武裝值崗，還派出保安隊警武裝出發各街巷巡查。

罷市的第一天下午三點鐘，省長曹銳接到北京政府來電，大總統已下令交通總長曹汝霖等請辭職准免本職命令，當由總商會副會長

下月庭在董事会宣佈。董事楊曉林說：“政府此次准曹辞职，純是一种敷衍政策，我商民罢市是今日牺牲万有者，仅得此结果，吾商民誓不承認。”董事刘俊卿也不承認。于是全体董事一致贊成楊刘的意見，表决再电北京政府，一定除此国賊，外交內政才有挽回希望。同日夜十二点鐘，省長曹銳帶同刘參謀長到总商会召集全体董事講話，說明政府已經答应大家的要求，还派有代表到津傳達，希望各商無論如何，明天一律开市。到深夜兩点鐘北京政府派国务院參議會毓駕赶来天津总商会，經曹銳介紹后，宣讀卖国賊曹、陆、章免职命令原文。这时在場的总商会董事和各行業代表們，都听信了曹銳和曾毓騫的講話，竟不和紳、学、教各界代表共同商量，就决定11日全市商号都恢复營業。

馬駿感动商民二次罢市：各商号11日早晨忽然开市，学联会得到报告后，当天上午十一点鐘，就推馬駿等前往总商会提出質問，到会的有紳商学教代表四十多人。

馬駿气憤的質問总商会董事們說：“今天商号已然开市，市面就不用再維持了，紳商学教又何必开会。比如昨天晚上商董开会，决定复業，可以在今天早晨提出来大家从常計議，再为开市也不为迟。况且所要求的条件还没有达到目的。以此情形，商界为何罢市，为何开市，自相矛盾，恐各位也無以自解。鄙人奔走呼号，原为救国，肯以此青年宝贵的光陰及一切生命全欲牺牲，而商界区区罢市还不肯本諸良心去做，国民資格何在。前日鄙人到贵会来，就有一位会董問鄙人何籍，天津有無财产。鄙人本吉林人，天津故無财产，知某君之意不过是譏諷的話。然鄙人尚有生命热血可流于諸君面前，以激諸君良心之發現。国勢如此，惟有一死以謝同胞。”馬駿說完这些話以后，就挺身以头向大柱子碰去，时幸有商会文牘長夏琴西在旁，倉惶之間，把馬駿抱住，生命得以保全。当时在会的董事也受到很大感动，知道是受了曹銳的欺騙，就由出席的紳商全体提出表决，如政府对于惩办卖国賊和保护爱国学生兩項要求在今晚十二点以前不以明令發表，就从明天(12日)起繼續罢市；並轉告未与会的各董事紳商，一定要与学生採取一致行动，不达到目的不止。

卖国贼免职津商复業：全市各商号因为学生联合会副會長馬駿的推动，12日繼續罢市。警察厅又派出警察武装值崗，还加派了警察机关槍队数队，每队架有机关槍在东南、东北城角一帶警戒。“学生临时警察”三百名也出發各馬路值崗，並注意各商号有無开市情形。天津总商会商团也全体出發。当时的旧英租界海大道恒泰成商号同人高某出头聯絡海大道一帶的华商在12日上午也实行罢市，与商学联合一致行动，並按戶去講演。

天津商界二次罢市以后，北京政府已明令罢免曹、陆、章等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天津总商会接到北京国务院复电后，經紳商学教四界代表公决，从14日起开市，一律照常營業。天津罢市風潮才告一段落。

六、总統府兩次請願代表被捕

巴黎和会拒絕中国正义的要求，全国爱国运动扩大。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于6月26日發表宣言，大意是外爭国权，內除国贼。6月27日曾召开学生大会，通过决意三項：1. 致电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签和約；2. 通电各省，要求立即廢止中日一切密約；3. 不承認卖国政府，取消新国会。天津学生联合会在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的号召下，遂决定6月27日推举馬駿、刘清揚等十人去与北京学联合会代表二十余人共同向北京总統府請願。学生大队与代表們在新华門前坚持兩整天，要求面見大总統徐世昌。28日晚徐世昌才接見諸代表，天津学生推代表馬駿、刘清揚二人进內与徐世昌談話，代表等当向徐世昌曉以大义，痛陈利害，並告以全国爱国人民誓为政府后盾。徐世昌見到人民力量不可侮，答应急电出席巴黎和会的我国代表拒签对德和約。

我国拒絕签字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表示万分惱丧，亲日派“安福系”执掌政权，对于鎮压国内爱国运动变本加厉。山东省宣佈全省戒严，由“安福系”的济南鎮守使馬良任戒严总司令。馬良对爱国运动严厉制止，还下令槍杀了爱国遊行队伍的領袖。天津各界联合会为抗議馬良的罪行，又公推刘清揚、郭隆真、張若名以及男学生代

表数人，和山东省各界代表去京，联合北京学生代表瞿秋白等二十五人，二次向总统府请愿，要求山东全省解严，惩办马良。各代表在8月23日去总统府请愿，当日下午就全体被捕，拘押于北京警察厅内，警察总监吴炳湘并传出消息说，要枪斃这些青年代表。刘清扬等被捕后，北京警察厅长常朗斋就派人把刘清扬胞兄《国强报》社长刘乃扬（铁菴）接去，令将刘清扬保出去，当时就把刘清扬叫出来，令她随刘乃扬回家去。刘清扬登时气愤的说：“我们大家来请愿，同为救国，男女同属国民，理应同受甘苦。”还说：“我们女界初次在为爱国而奋斗，绝不比男界落后一步，本来救国运动理应无罪，你就应该释放我们全体代表，今只放我一人是何用意？我想家兄也不愿我作女界爱国的罪人。我现在只知有国不知有家，既不放全体代表，我也不回家去。”她说完这些话，就气狠狠地抹头回到拘留所。转天北京《国强报》发表了刘清扬大义灭亲、天津益世报也发表了刘清扬百折不回的新闻，更给爱国青年们以热心奋斗的激励。

七、天津学生去北京示威

天津学生因为请愿代表在京被捕，就约集一千余人，由学联会副会长马骏领导，全体化整为零的来到北京；并联合北京学生共四五千人，8月28日早晨在天安门集合，首由马骏向全体学生作了很动人的讲话，会后全体结队到北京警察厅，营救京、津、鲁被捕的代表。由于马骏的讲演慷慨激昂，把全体学生的爱国精神团结得像铜城铁壁，数千人都集中在马骏一个人的身上，进退战斗完全听从他的指挥。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派出全城军警把学生的队伍包围起来，又把学生队伍压缩到天安门内，用皮鞭枪托向学生乱打，他们也看出了学生大队是以马骏为领袖，于是毒打学生们指出马骏来，但是学生们虽然身受毒打，都还设法掩护马骏。马骏当时看到同学们挨打的情形感到不安，就挺身而出，报出自己的姓名来，军警们就把马骏抓了出来。这时学生们想出了对策，向警官提出，如果政府想让我们学生队伍解散，必须把马骏放回，由马骏领导我们一同返校，不然的话，就是斃了马骏，我们更不解散。吴炳湘不得已，还是把马骏开释，就由马骏头前

領隊，全体学生仍然整齐严肃的返回本校。由于这次天安门示威大运动的力量，引起了全国各地紛紛来电請求北京政府釋放被捕的代表。天津各界士紳張伯苓、陈宝和牧师等九人赴京保釋被捕的天津代表。北京反动政府感到全国人民力量的强大，只得借着各地士紳保釋的台階，在8月30日把被捕的二十五位代表一律釋放。到后来京津各地学生管馬駿叫“馬天安”，就是由于这次天安门大示威运动而得名。

八、組織全国各界联合会

京津魯各界联合会請願代表在北京被捕，在全国各地声援下，被拘一个星期后釋放。經過这一次的运动，天津各界联合会認為有組織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必要，于是开会決議公推馬駿、刘清揚和士紳代表馮禹門三人为赴滬代表，負責到上海聯絡發动，馬駿等在9月間离津。到上海以后，首先受到新聞界的欢迎。經和上海各界联合会取得聯絡，就开始登报宣傳，邀請全国各地的各界联合会代表来滬聚集会商，經過兩個月的筹备，就在11月10日开成立大会于北四川路青年会內。全国各地到会代表二百多人，上海地方参加大会者約一千余人。大会由刘清揚任主席，报告大会成立意义，並有孙中山先生的代表黃大偉，章太炎、黃炎培先生等到会講話，大会开的非常热烈，有人临时建議会后遊行，全体一致贊成。主席認為在外国租界遊行示威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如果維持不好秩序，会發生意外，于是就建議大会請由馬駿担任大会遊行总指揮，並約法三章，遵守遊行秩序。通过这一次在租界地举行了的遊行大示威以后，显示了全国各界团結力量的强大。

九、双十节遊行示威

“五四”运动这一年，天津市的学生、妇女和各界紳商市民都組織起来，不但举行了罢課、罢市、遊行講演並举行了不少次爱国示威运动。天津警察厅长張汝桐，虽然屡次的对于学生爱国运动橫加干涉，但是爱国学生和各界市民，仍坚持展开反帝反軍閥的英勇斗争。北

京的反动政府看到天津的学潮一天比一天的扩大，而警察厅长張汝桐竟不能制止，八月間改派前任天津警察厅长楊以德（天津人呼楊以德叫楊梆子）来接任。天津学生联合会对楊以德接任警察厅长以后，曾經討論今后推动工作的步驟，研商了妥善办法来对付楊以德，决定不讓楊以德給吓唬住。

在1919年10月10日，各界联合会又發動一次“双十节”遊行示威运动。这一天警察竟阻止大队遊行，並打伤学生多人，遂發生羣众包围警察厅事件。

当天中午，参加大会的各界市民有一万多人，在开会以前，就得到了警察厅要武力解散遊行的消息，大会主席因早作了应付办法，預先推出馬千里、譚志篤、沙主培、盧致德等为大会总指揮，时子周、刘俊卿、孟震候、刘錫三等为講演員，李宝森、王卓忱等为照料員，易守康为沿途講演总指揮。会場的佈置和队伍的排列是把市民們排列在主席台最前面的周圍，把有組織的学生队伍排列在市民的外圍，又把女学生的队伍排列在整个队伍的最外圍。这样排列方法，目的就是准备如果真的警察来武力解散时，先由女生的队伍作先鋒冲出重圍，同时女生們所拿的手旗竹竿，也都是預先买好的坚硬的竹竿，万一發生意外，就利用旗竿充当斗争的武器。

下午一点鐘，警察厅先派来保安队总队長丁振芝和杜笑山兩人，来到南开中学校里大会办公处找馬千里等談話，他們奉楊以德命令阻止遊行，馬千里等当时就給拒絕了。到下午兩点照原訂大会程序宣告开会，主席馬千里首先致开会詞时，即报告为了庆祝国庆开大会，並說明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主权，号召全国人民上下一心来共救时艰；各位講演員在講演时也都是根据以上精神，大会結束就宣佈大队出發遊行。与会者手执各色紙旗，上書“庆祝国庆”、“平民万岁”、“共和国万岁”、“提倡国貨”、“抵制日貨”、“一致对外”、“至死不輟”、“热心救国”、“勿忘国恥”、“自由”、“博爱”等字样，沿途不断高呼以上各口号。大队是由女生队伍在最前面領队，学生队伍在中間，各界市民的队伍在最后边。由南开会場出發奔向南关下头的途中，有佈置好了一批武装警察出来攔住去路，毆打学生。在大队最前列的女生

队伍，个个都舞动手旗来硬向前闖，並用旗竿打掉了許多警察头上的帽子，紧接着男生的队伍也奋勇的冲上前去，煞时间，呼喊的声音大起，学生和武装警察大打交手仗。正在这个时候，学生联合会的汽車宣傳队由外边开来，就这样来个里外夾攻，打出一个缺口，遊行大队才紧随着汽車向外冲出重圍。当日警察阻止学生大队遊行，致起冲突，結果中西女校教員李錫錦頰間被刺伤一处，女师同学張女士左眼角被刺伤一处，新学書院童子軍于培康腿部被刺伤一处，王克珊腕部被刺伤一处，並被槍托打伤咯血，西开中学李景荣左鼠蹊被槍托打伤甚重，兩腿不能伸开，李宝偉腿部被刺三处，尚有輕伤者十余人，警察也有数人負伤。

遊行大队到东馬路以后，立刻都奔到东浮桥，包圍了警察厅，去質問楊以德为什么派武装警察毆打手無寸鉄的爱国学生。各学校的講演队立刻在东浮桥附近一帶展开了爱国講演，东浮桥附近各路口由各校的“童子軍”佈崗維持秩序，交通完全断絕，遊行大队都席地而坐。警察厅門前佈滿了武装保安队，作半方形的防衛式，如临大敌。市民們找来几个木梆子，大敲特敲，还高喊“楊梆子你出来吧。”遊行大队当时推举馬千里、时子周、譚志篤、陈泮嶺、徐和卿等十人要求面見楊以德，楊拒絕不見。代表等就奔向省公署請願，由省署刘參謀長、刘稽查長接見，代表报告警察攔阻遊行和毆打学生的經過，要求撤換楊以德。刘參謀長除用善言劝慰，並請代表轉向大队劝导外，答应十二日約請教育厅長王章祐詳商解决办法。代表等晚十点多鐘才离开省署回到警察厅門前，向大队报告交涉經過，劝导大家暂时回去，听候省署办理，大队于是分批离去，到深夜才全走淨。十三日天津女界同志会与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發表停課宣言。宣言全文如下：

天津中等以上男女学校学生短期停課宣言書

一国的国庆？是一国的大典，全体国民所应当庆祝的。我們中华民国自从武昌起义以来，国会里議决十月十日为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大家全都遵守，每年全国全有庆祝。庆祝的典礼是差不多一律，而庆祝的心理同現象，不免因着時間問題各有不同。

此次天津庆祝国庆，由各界联合会发起，通知各界人士赴会，为着俾我們庆祝的热忱，並且团结我們的民气。組織的人是各界的团体，責任是各界联合会負的。在开会以前，各界联合会有正式公函給省公署同警察厅，手續上沒有一点缺欠；並且各界联合会副會長馬千里，亲口向警察厅督察長丁振芝說“这次会由我完全負責任”，遊行的事也說在內。四面顧到，总算給警察厅沒有一点口实可借了。然而楊以德不死心，派大队警察攔阻我們出發，我們大家同他理論，他却向我們威吓。我們各界的人，是赤手空拳，秉着爱中华民国的心去庆祝国庆，我們还有什么惧怕么，一往直前是我們当然的办法。我們是結队成羣，是極有秩序的团体行动，他們不但阻攔，並且还用槍刺槍托伤人，野蛮黑暗，那时的情景，已經达到極点，稍有人心的人，沒有不感动的。加上他所伤的，全是我們有团体的男女兩界学生公民，是有目共睹，人人都怒不可遏，所以才做到全体去警察厅的一步。等到我們男女兩学界代表，向他警察厅質問，【楊以德代表丁振芝却不負管束的責任，所有的錯失，他全讓我們向法庭去起訴。

我們想庆祝国庆是举国同庆的事，我們照手續做，他們却故意为难，不放我們遊行，破坏我們有团体的秩序。他們的罪惡是妨害我們庆祝国庆，这事的主动完全是楊以德，所以楊以德不讓国民庆祝国庆遊行，他的罪完全是不承認国庆，破坏共和。

再說他的巡警，打伤我們有团体有秩序的男女学生。警察厅是保护地方治安的，他們反扰乱地方治安，我們不去質問他負責任的警察厅，我們还問誰去？不想他的回答，一方面承認他破坏秩序毆伤学生，却讓我們到法庭起訴去。这种不能管束警察的長官言語，还能够有指揮巡警的資格嗎？並且主使巡警毆人，他的罪是主使罪，更沒有再为警察厅長的道理。

他的罪狀既定，我們以后对他完全沒有一点恕心了。破坏共和是他对国家犯的大罪，打男女学生是他同我們学生宣战，並且他又用馬队冲散公民，弄的公民有落到水里去的，有受伤的，这种罪狀，他是同公民宣战。从今后我們永远不承認楊以德做我們的警察厅長了。楊以德的罪狀是如此，我們大家反对他的决心，是已經在圍聚警察厅同累次演講上表現出来了。各界代表要求省長懲办楊以德，正是我們人人心中所主張的事，而我們男女兩学界自受切膚之痛，尤其义憤填膺，期在必达到我們目的。並且期望將我們当場所受种种痛苦，同各界所受的摧殘，一一宣告社会，以求社会公众的同情，“仗义执言”。本着这种主旨，我們因此議决短期停課，表示我們促社会觉悟的决心，一致进行“救国不忘求学，求学不忘救国”。本我們全

国学生終止罢課的宣言，我們非迫不得已，何忍拿神聖教育的团体“輕于一擲”。然而为我国共和前途計，国民人格計，我們决不能無所表示，审慎再三，始敢出乎此道。所期政府能順輿情，确保共和，諒我們隱痛，允許各界的要求；而邦人君子要是能諒我們苦心，当能表同情贊助我們进行，“羣策羣力”，“众志成城”，則目的終可达到，我們区区心願也可以表白社会了。

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
 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 發佈 十月十三日

十、声援福州爱国反日斗争

声援福州惨案召开国民大会：从“五四”运动爆發，国人就拿着抵制日貨当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日本帝国主义在經濟上受到严重的威胁，不断要求北京政府取締排日風潮。因为当时是亲日派安福系主政，就在1919年7月和12月間，兩次通令全国各地禁止排日。国人为了防止日人借口，就改为“抵制劣貨提倡国貨”的口号来号召。1919年11月間，福州学生焚燒日貨，日本福州侨民开枪杀死我国学生和警察，全国各地爱国团体紛紛电請政府向日本抗議，同时抵制日貨的風潮就越来越厉害了。

天津各界联合会为声援福州惨案，加强抵制日貨运动，11月30日特籌备組織国民大会委员会，經過多日籌备，正式成立，选出各界的代表馬千里、馬駿、刘清揚、时子周、宋則久、孟震候、夏琴西等三十余人為委員，会址即假总商会內。委员会並決議12月20日举行第一次国民大会，当日把沒收的日貨一律运到会場口当众焚燒；借以表示天津市民抵制日貨决心。学生联合会也推陈泮嶺等十五人為籌备員，决定12月18、19兩天，所有調查委员会人員全体出發，調查各商号卖日貨的情形。各講演队也同时出动，劝导各商号赶快把日貨一律封存，不再售卖。国民大会筹备会並函請各机关襄助进行，原函全文如下：

敬啓者，窃以日人在閩之兇慘暴杀学警，实屬弁髦公法，侮辱我們。警耗傳來，全国振憤，民气激昂，悲憤填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各处各地方国民集合羣众議商，以抗日人之非礼。鄙团体鑒于此情，憤慨万分，遂尔共相聯絡成立国民大会筹备会，决定于本星期六日，即本月20日，假南开窪中

开国民大会。相应函致，望祈届时襄贊一切，共助义举，实叙公誼。

12月20日这第一次声势壮大的国民大会举行了，会场是在南开中学前广场。当天下午一点鐘到会的学生、紳商各界市民等人数竟达数万人，每个人全都拿着各种顏色的紙旗，可以說是空前沒有过的大場面。会场的秩序是由各校“童子軍”負責維持，会场当中設有講演台三座，由大会講演員輪流講演。下午兩点鐘宣佈开会，大会主席团主席馬千里致开会詞后，各講演員分別在三座講演台上作沉痛而悲憤的演說，受到全場鼓掌欢迎。講演完畢，就开始焚燒沒收的日貨，立时煙冲霄汉，全場数万人又鼓起掌来，还高呼“坚决抵制日貨”等口号。下午三点多鐘，大会宣佈遊行队伍出發。在大队最前列是总商会的商民自衛团和达仁堂藥店的乐队，后边接着就是北洋大学、法政、南开、女师等三十多个学校的学生大队，其后就是工商業界广貨業、棉紗業、綢布業、米麵、織染等七、八十个行業的經理和职工的队伍，随后又接着是广东旅津同乡、救国十人团、基督教、天主教、回教联合会等共一百七十多个單位的大队。遊行路線是由南开会場出發，經由南馬路、东馬路、北馬路进估衣街，經鍋店街到大胡同南口解散。解散时已是晚八点多鐘了。

遊行各單位的队伍前边都有一面大旗，遊行的人举着手旗，上边写有：“力救福建”、“众志成城”、“坚持到底”、“不买仇貨”、“提倡国貨”等字样。大队浩浩蕩蕩，整齐严肃，沿途喊着响亮而沉痛的口号，一路沒有間断。大队經過的地方受到热烈的欢迎，各商号門前預备了許多点心和茶水，各商店門前普遍貼有：“提倡国貨”、“欢迎国民大会休息半日”紙条。通过这一次的偉大的爱国教育，天津市各界市民觉悟的程度进一步的提高，领导这一偉大爱国运动的革命知識青年的领导經驗也更加丰富。

商界公拟抵制日貨办法：1919年6月間，天津各界联合会抵制日貨委办会成立后，統一领导有关抵制日貨运动，首先是联络各行業公会，进行商号自行填报所存日貨品类和数量，以及批訂的日貨数目，保証自行封存，不再买卖，听候处理。在11月間福州慘案發生后，又召开各行業會議，对于抵制日貨的办法作进一步的修訂，共同遵守。

其修訂办法三項：1. 运到已經起封的劣貨，应將貨物的种类和数目报告委办会，由商学兩界会同查明批准后，始得在市上銷售；2. 运到尚未起貨的劣貨，应封存不准出售；3. 已訂尚未运来的劣貨，应去信退还。

商界自实行以上新办法后，查貨封貨的工作立刻都行动起来，去信退貨的事更为数極多，这一有效的举动，引起了国内国外的重視。

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如前所述在全国人民力量的威逼之下，北京政府不得不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这三个卖国贼的职位，不得不下令給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签对德和約。日本帝国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又陰謀向“和会”提出关于山东問題，由中日兩國直接交涉的新花样，竟得到“和会”的允許。消息傳到国内，大大激动了中国广大人民的憤怒。当时北京政府是由亲日派“安福系”势力控制着，竟有不顧屈辱，答应中日直接交涉的消息，于是羣情激憤，全国人民反对直接交涉的爱国抵制日貨运动又像火山一样的爆發起来。

在全国各地反对中日直接交涉斗争的高潮中，恰恰是接近到年关时节，一到年关，便是学校放寒假的时期，因此学联会和各界团体已考虑到，学校一放假，便会分散了学生的团結力。果然反动的統治者与学校当局策划提前放寒假，並在假期中，学生必須回家，不許住在学校里，这正是用釜底抽薪之計，破坏学生爱国运动的陰謀。日本帝国主义者看到抵制日貨的風潮日益扩大，乃于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时在日租界花园公会堂开日侨大会，到会者千余人，會議通过組織保衛团及不信任中国官厅等議案：“1. 取締破坏日支国交及妨害自由通商言論自由等事；2. 解散学生及其他之排日团体；3. 处罰違背中国官宪所禁止之排日排貨之流；4. 以上之取締，若不能有效，再請中央政府严重訓令該管官监督。”由于日侨提出这一無理的要求，媚外卖国的統治者对爱国运动就更加慘酷的压迫。学联和各界团体为了反抗这个陰謀就更加加强了团結，以積極檢查日貨的实际行动，給反动統治者的陰謀以有力的打击。

十一、抵制日貨發生慘案

魁發成事件經過：为反抗教育厅提前放寒假的陰謀，天津的檢查

日貨更加積極进行。1920年1月23日晚，学生联合会調查委員段鴻蔭根据报告，率同学多人，到东門內魁發成洋貨庄查出未經呈报的日貨灯罩十七簍，随即遵照規章运到学生联合会，然后再报請国民大会委員會处理，段鴻蔭一人还留在魁發成舖內。这时候突然来了日人三名，把段鴻蔭毆打一頓，还搶去檢查証。段被毆后就跑向国民大会委員會报告，同时学生多人又赶到魁發成，当时日人已走，学生们就把魁發成的同人裴潭溪帶往国民大会委員會，請大会詢問。委員會虽然知道裴潭溪不是經理，但是他在場看見了日人行兇，所以就把他留在大会里，等明天教他在公园內向羣众报告日人行兇經過。到了轉天早晨就有警察厅派来穆子棋署長到国民大会委員會，要求把裴潭溪帶回警察厅罰办，委員會不同意。穆子棋走后，又有警察保安总队長丁振芝帶領很多武裝保安队来到国民大会委員會（北馬路前商会內），进門来就用皮鞭打散了門前的羣众，闖进会內，破口大罵，不容分說的就將裴潭溪搶回警察厅去。

警厅門前学生被毆：保安总队長丁振芝把魁發成同人裴潭溪搶走后，国民大会委員會非常气愤，随就召开紧急會議，議决推举馬千里、时子周、馬駿、張品題、夏琴西、李散人、尙墨卿七人去省公署請願，向省長曹銳說明魁發成事件經過並抗議丁振芝的橫蛮無理举动。当七代表走后不久，突然有学生联合会学生代表多人誤听傳說七位代表出門后被捕的消息，都非常憤怒，就一齐奔向警察厅，到了警察厅时，就問門崗，是不是我們七位代表被捕了嗎？警察厅的門崗回答沒有，众学生不信，要求进去見代表，双方爭执好久，忽然里边出来一个警察，手里拿着皮鞭，喊了一声“架”，登时有好多警察就用藤子棍向学生們一路乱打，在前边站着的学生李燕豪（政法学生）、陈宝聰（大營門中学）、于駿望、郭緒荣、李培良（商業学校学生）、师士范（南开中学）等同时被警察扭住，直打得个个鼻破臉腫。警察們随又把这几位学生扭到里边花园內，繼續痛毆。同时又有南开中学学生祁士良由河东办事回来，路过警察厅，也被扭进去毆打，打完就都一同被押在拘留所。此外还有随同前去的学生看見同學們被毆打，非常气愤，也一齐向里边闖，却被警察給攔住，不讓进去。这些同去的学生們就在

外商量办法，一組人赶快回到学生联合会去报告，另一組同学即刻去省公署請願。

各界代表請願被捕：国民大会委员会所推举的代表馬千里等，在去省公署請願时，半道上碰上孟震候也随同到省公署，由邢副官長代見，問明代表来意，答应等省長回来轉报，各代表只得出来，剛走到省公署东轅門，就遇上学生們来省公署請願，才知道傳說代表出門被捕的事是誤会了，于是学生們就从头到尾述說了一遍学生們在警察厅被打的情况。各代表們听到学生在警察厅被毆，还被拘押的事，便立刻返回省公署，傳达的衛兵却說邢副官長走了。就在这个当兒，突来一队保安队把代表們攔住，喊叫着馬千里等人的名子，全体請願代表就都应声被捕（其中只有商会代表張品題沒被捕）。請願学生李权、吳世昌、吳鳳岐、陶尙釗等也都搶着和代表們一同受捕，行路商人赵仲禹也誤遭逮捕。一月二十五日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都被查封。

二次召开国民大会：天津各界代表二十多人相繼被警察厅非法拘押，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又被查封。这样的鎮压，各界人民並沒有惧怕，各界代表領袖宋則久、王卓忱等人又秘密集合了各界市民五千多人，在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七日在南开广场举行了第二次国民大会。大会后，全体整队遊行，沿途高呼口号，散放傳單，会后天津学生联合会發出快邮代电。傳單原文：

自“五四”运动以来，各界人士奔走呼号，声嘶力竭，仅得以拒签德約于和会，略抵制劣貨于国内。青島交涉，利权挽回尙未有若何之征兆，所冀者亦惟国人齐心努力，坚持到底，有以寒日人之心，起列强之敬，俾国际联盟开幕以后，提起山东之案，庶足伸公道，平不平耳。不意日人既恃其虎狼之威，复施其利誘之計，我国势素来孱弱，我政府素来畏縮，难免不低首下心，惟强鄰之命是听，压民气不使之澎漲，禁抵制以息風潮，俟民气屈服，民意消灭，然后为所欲为，政府明目張胆与以直接交涉，四万万人民虽众，其如我政府少数人何。为今之計，我国民誓死不能承認直接交涉，民气絕不能因压力而稍餒，民意絕不能因压力而稍墜。不然，既承認直接交涉于后，何苦拒签德約于先，反不如不拒签德約，而重受虎头蛇尾之譏。而今政府与日人是否背四万万人民之心理，竟欲直接了断青島交涉，是当反觀我今日之民气，如果民气强硬，坚不承認，則政府与日人之鬼蜮伎倆，必將無所設施矣。乃青

島之問題與福州之交涉延至今日仍無圓滿之結果，焉能不起我人民之恐懼哉！噫！危矣！事迫矣！何復再事躊躇乎！故今日大會遊行之舉辦，即所以表示我民氣之強硬，並催促我政府使之覺悟，以副全國同胞愛國之切心而已。

天津學生聯合會快郵代電

慨自青島問題發生以來，我國工商學教各界奔走呼號，勞苦不辭，犧牲不計，威勢不惧者，非爭回我舊有之山河耶？非爭回我國舊有之國權耶？商罷市，工罷工，學輟學，欲爭國土國權不惜以生命財產為代價，政府干涉，軍警摧殘，海內愛國志士死于奮爭陣中者日有所聞，所爭得者德約拒簽而已，我山東一切權利仍未達爭回之目的。今也魯案未決，閩案又起，日本不顧國際公理，公然宣言繼承德國在山東一切權利，我赴歐專使陸王兩君已繼返國，山東問題之解決即在此時，山東一切權利是否可以爭回亦在此時。日本所要求于吾國者直接交涉，以日本之強暴脅迫之四年五月七日之事，則直接交涉即失敗之換言，望我海內各界對於直接交涉一致拒絕，成敗得失在此一舉。頃由敝處各界，對此問題于今日特開國民大會，借圖進行，議決我國國民大會之兩事：（1）山東問題拒絕直接交涉；（2）催辦福州交涉。對於進行辦法：1. 在國民大會推舉代表五人赴京謁見陸專使，以上述兩事作懇切之請求；2. 要求省會轉達北京政府作同一之請求。惟敝會于二十四日因檢查日貨問題被警察封禁，開會言論，已失自由，困苦顛連，達于極點，惟一息尚存，誓抱初志，力謀進行。海內各界，尚望羣起圖之！天津學生聯合會叩。

警察廳的高壓手段：各界代表被捕，各愛國團體被查封以後，天津警察廳接二連三的大貼佈告，兩張佈告是禁止學商各界的愛國活動，另一張是威脅各界市民趕快退出各愛國團體。佈告原文如下：

其一：“為佈告事，本日有自稱學生等私翻商鋪，侮辱商人，遊行街市。該學生等聚眾來廳，肆行毆罵，當場逮捕六人，余者逃散。本廳奉令依法懲辦，決不姑息養奸。惟今後學生等各有所身家，豈無愛惜，諒系匪人脅迫，收步為難。本廳長不忍深求，其各解散回家，勿再囂眾，若待刑罰及身，悔之晚矣！切切此佈。民國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其二：“天津救國十人團聯合會、國民大會均未呈請令准有案，即屬違犯法令，一律解散取消。如有私行集會結社，屋外集合，或粘貼圖畫以及言語形容，有挑害誘惑煽動之作用者，一律依法究懲，決不姑息。切切此佈。民國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其三：“照得学联合会、各界联合会、救国十人团联合会，業經佈告解散呈請省公署在案，該会团等既經解散，所有会中团中發給的各种執照暨檢查貨物，即屬違法，省長佈告准由各商号扭交該管警署，以抗違行政官署命令論罪。凡領有聯合檢查証書十人团証人等，限自佈告之日起，于五日內各自投送就近警署門前外信箱，遵行銷燬，既往不究。倘再故違，一經查出，依法懲辦外，决不姑寬，勿謂言之不預也。切切此佈。 民國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月二十九的爱国运动：反动統治者对学生爱国运动日益慘酷进行高压，一月二十四日天津警察厅毆打並扣留了学生七人，又逮捕了請願代表和学生，又查封了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反动統治的高压手段一天比一天毒辣，爱国学生的斗争精神也就越坚强越团结，在周恩来同志的策划领导下，决定和反动政府斗争到底，因而就規定在1月29日举行反抗大运动。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並發出請願宣言如下：

曩者东鄰猖獗，外交紧急，丁茲危局，举国奋起。同人等以为欲伸世界之公理，首在打破国内外之强权，欲求外交之声援，亟应發揚国内外之民气，事端重大，宜策羣力，号召同謀，故有学生联合会之組織也。敝会成立以来于茲八月，軍警摧殘，迭遭解散，追怀往事，疾首痛心，願念前途，憂憤莫名。然使一息尚存，仍不肯一念退縮，誓抱初衷，力争一切。

1. 我国既加入协約对德宣战，于胜德之后，所有德国在山东一切权利当然收回。迺东鄰肆意胁迫，武断和議，致国际公理不伸。我国拒签德約交由国际联盟裁判，尤为正当办法，不意日本即欲此时繼承德国前在山东一切权利，通牒我政府开始交涉。似此無理要求，当一致拒絕，免蹈四年五月七日之复辙，致蒙不利。

2. 日本恃其强暴，迭辱我國民，近复在福州毆伤学警，並由其領事署警察長指揮一切，事后彼国政府复派軍艦恐吓，辱我国体。消息傳出，海內共憤，亟宜照閱人請求从速交涉。

3. 欧战后日政府与我国政府締結一切不平等条約，未經国会通过不能認为有效，膠济铁路交換文，高徐、順济铁路合同，亦应催促專使提交国际联盟設法廢除。

4. 敝会于二十四日因檢查日貨問題被警厅封禁，並打伤會員，拘去敝会及各界联合会代表二十余人，非法拷打至成廢疾，被拘者哭訴無路，在外

者开会莫由。似此暗無天日，同人等势与極力奋斗，不达釋放代表恢复原狀之目的不止。

凡此四端，已由敝會議决，力謀进行，困难不計，威胁不惧，此旨不达，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尚望海內各界共与圖之。天津学生联合会。

1月29日下午兩点，各校学生約一千多人，分別离开学校来到东馬路，集合在一起，在学生联合会执行科長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举行了街头講演，散放了傳單，其傳單內容如下：

(甲) 对于外交方面：

1. 监督北京政府，对于山东問題不准与日本直接交涉；
2. 要求陆徵祥專使对于山东問題不与日本直接交涉；
3. 請王正廷專使帮同陆專使办理拒絕山东問題直接交涉；
4. 請顧維鈞專使將中日兩國間一切不平等条約提交国际联盟会；
5. 催办福州交涉。

(乙) 对于天津方面：

1. 恢复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会所原狀；
2. 釋放被拘代表；
3. 恢复言論結社自由；
4. 調查日貨，軍警不得干涉；
5. 懲办楊以德同毆伤各代表之軍警。

随即声明齐赴省公署請願，要求的条件是：1. 請省長代电中央駁回日本通牒；2. 拒絕青島直接交涉，催办福建交涉，取消中日軍事協約；3. 請省長恢复天津学联会原狀；4. 釋放被拘代表，不干涉人民集会、結社、言論、出版自由。講演半点鐘就結队奔向河北大經路省公署。到省公署后要求見省長，副官說省長不在，有事可推代表进来，于是推出周恩来、于蘭湑、郭隆真、張若名四人。副官因恐学生大队都进去，就不敢开轅門，故要四代表从門坎下躡进省署。副官並要求他們登梯子告訴轅門外的学生大队安靜的在外等候，省長回头就来。四代表在省署內等候快一个鐘头了，还不見省長来。在这个时候，省署門外已經佈滿了衛队，把一千多赤手空拳的男女学生包圍在內，竟用刺刀和槍托向大队中打去，以致演出了流血惨案。学生大队被打散后，学生受伤者数十人。茲据当日医院治疗情况及学联会調查誌下：

(一) 住院学生

1. 蘆氏医院經蘆玉甫診治者：李錦棋（官立中学生，年二十岁，

头后刺伤至骨，腰部亦受击伤)、郭玉珍(女师学生，腦震失神)、歐陽傑(女师学生，腰部打伤，不省人事，后移北洋女医院)。

2. 大仁医院經陈文錦大夫診治者：古志安(南开学生，年十五岁，胸部出血，昏迷不省，生命危險)、龔显宗(左眉扎断，眼皮破裂)。

3. 北洋医院：易守康(法政学生，全体紅伤六处，左眼下二处，头盖二处，干部数处刺入甚深)、許恩灃(水产学生，腰后內伤不能动轉)、唐宝玲(女师学生，腰部受重伤)、赵長泰(南开学生，刺刀伤腦，失去知覺)、李津(天津人，二十二岁，吐血背受重伤)、赵溪庄(广东人，十八岁，头背均受伤)。

4. 妇嬰医院：郭恒珍(女师学生，腰伤)、李靜軒(同上，腰伤)、侯悅琴(同上，头伤)、周之廉(同上，左脚及背伤)。

(二) 未住医院之受伤学生

1. 新学書院：傅誉(左脚伤)、呂少炎(微伤)、傅金容(脚伤)、富鈞(左手伤)、黃書助(腰伤)、王克珊、周延旭(均腿伤)、米宝藩(腰伤)、薛沛昭(微伤)、富宁錫(左手伤)。

2. 南开中学：王志德(腰伤)、潘世蔭(头伤)、傅宗熙、邵鉄汉(均手腿伤)、梁銘皇(头破)、雷策先(头伤)。

3. 北洋大学：陈元飄、陈冲嶺(均胸伤)。

4. 私立英文学校：潘旭初(重伤)、佟士璧(腰伤)、范同来(微伤)。

5. 水产学校：黃輝(重伤)、胡調濤(微伤)、李延恒、許乃庄(均微伤)。

6. 师范学校：傅龔三(目伤)、边同元(微伤)。

7. 高等工業学校：夏文蒸(腰伤)、崔克恭、李玉貴、董鑑涵、陈元軒、王傳彝、李右襄(均受伤)。

8. 女子师范：梅貽珍(臂伤)。

9. 法政学校：范緒初(受伤)。

10. 中西女中：王世明(头伤)、王愷、傅杰、王世珍(重伤)、鄭芸生、鄭蓮生、宋梅增、聶雲(均受伤)。

11. 官立中学：牛汉融(臂上刺破)、曹先曾(腦下刺刀伤)、刘俊修(头間刺刀伤)、傅緒溥(指折)、胡嘉謨(脇肋受伤)、严永忠(臂上刺

破)、王国珍(腰間扭筋)。

学生大队被衛兵武力驅散后,警察厅就派来保安队二百五十名,預备队一百名,馬队捕盜营等多名,分佈在河北大胡同和东馬路一帶,如临大敌。保安队又在省署將周恩来、于蘭渚、郭隆真、張若名四位代表拘捕並帶往营务处去。在去营务处的途中,四位代表不断高喊:“民国万岁”、“学生万岁”、“同胞万岁”。羣众圍观的拥挤非常,有一些观众鼓掌,敬佩他們英勇不屈的爱国精神。

反动政府鎮压爱国运动:官方为鎮压爱国运动,2月1日由韓柳壘調兵兩連,駐防河北天緯路,由保定撥派宪兵兩連駐守东南角草厂巷內学联会旧址,又由大名調兵兩营駐防津北宜兴埠。警察厅在一月三十日也开紧急會議,决定每日增派武装保安队警在各馬路逡巡。教育厅長王章祐特通令各学校提前五天放寒假,借以消灭学生集会的机会。省署門前發生惨案的次日,直隶省督軍曹錕,省長曹銳就联銜發出了佈告,竟对学生的爱国运动,肆意誣蔑,並要严加查禁。佈告原文如下:

“为佈告事,按照以前学生檢查商号日貨,侵扰商業,違背約章,迭經本省長宣佈切告,严申禁令,並奉国务院內务部电飭禁止在案。乃日前魁發成一案,該学生等竟敢扣收貨品,拘留鋪伙,甚至赴警厅滋鬧,毆辱警員,殊屬目無法紀,業將滋事人等看管訊办。連日又有人借端煽动,聚集多人,結队遊行市面,人心显見恐慌。当此冬防吃紧,地方定章戒备之际,本埠华洋杂处,关系尤为重要,本督軍省長維持地方之責,絕不能令学商各界时有越軌行为,致防公共之安宁。除令天津鎮守使警察厅督飭軍警严予取締厉行防止外,用再会同重申誥誡,当此軍警戒备之时,凡我國民,务各安分守業,遵重法律。再有以前逾越范围举动,不服制止,定即依法逮捕,从严究办,不稍寬假,刑章俱在,勿謂言之不預也。其各凜遵,切切此佈。 民国九年一月三十日”

爱国团体轉入地下:省公署門前請願發生流血惨案后,天津爱国运动遭遇到严重的困难,各校学生代表們就进行秘密的活动。北洋大学等校学生代表李之常、陈泮嶺等三十多人,在1月30日都約会好了去到旧英租界倫敦会教会里开紧急會議,商討应付办法,决定

号召各校学生不要因为受到打击而气馁，仍然要振刷精神，团结起来，繼續和反动政府斗争到底。並即通电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和各省学生联合会报告真相，請予支援。質問直隶省議會，为什么学生在省公署受到非法摧殘，而省議會竟不主持正义支援学生。学生联合会会长譔志篤在1月31日在旧法租界教堂后某处，約集了各校代表再度秘密會議，重新改組学生联合会推选会中临时負責人員，每天照常办公。女界爱国同志会也在2月1日假倫敦会教会秘密召开了紧急會議。救国十人团联合会也假旧法租界教会办公。省一师范、官立中学、法政学校等学生为了声援学生代表被拘捕，从2月1日起一律罢課。

营救被捕代表直到最后胜利：天津国民大会委员会为了营救被捕的各界代表，經推举卞月庭、刘善庭、譔志篤、刘俊卿、王玉圭等五人去北京，並联合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共同向总统府請願。北京学生講演团在二月四日为天津各界代表被捕事，举行了街头講演，各校学生还举行示威大遊行。

在周恩来同志为首的1月29日反抗运动的計劃中，是有所准备的，要使爱国运动的斗争，再接再厉的坚持下去，就把女界爱国同志会会长刘清揚留下来，未参加这次的斗争，准备作南下动员工作的。所以在周恩来同志等被捕的轉天，刘清揚就化裝为天主教修女，乘津浦車南下，先到了南京，向南京学生联合会报告天津学运受到摧殘的情形，南京学联会主席黄震寰立刻动员了万余学生举行了示威遊行。刘清揚又由南京到上海全国学生联合总会报告，全国学联会即动员了三万多羣众，在跑馬場举行了羣众大会。刘清揚报告了天津学生运动遭受摧殘打击的經過，激起羣众大会羣众的愤怒，並一致响应天津事件，要求釋放被捕的代表，大会並決議通电全国一致声援，更应团结各界奋斗到底。同时三万多羣众，一直奔向十六里远的龙华的外交使署要求拒絕巴黎和会迫我对二十一条的签字。並在龙华的羣众大会上决定大家回到市内，即举行罢工、罢市、罢課，以表示坚决的反抗斗争。这一运动竟震撼了全国，更加强各界爱国斗争的力量，繼續坚持了半年之久，直到二十一条終被取消，天津被捕代表获釋。

十二、警厅拘留記

天津爱国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向帝国主义走狗——反动统治者直隶省长曹銳、天津警察厅长楊以德进行反压迫的斗争，从1920年1月23日起，先后被捕者共二十六人，都分别拘押在警察厅里保安队各棚和偵探队里，未予审讯，毫無理由的拘押了两个半月，经过大家的力争和絕食奋斗，才于4月7日，把患病的五人由家人保释出去；其余的二十一位代表都被移送地方檢察厅。

被押学生不忘学习：被拘押的学生和各界代表，因为警察厅既不审讯也不释放，实在气愤不出，紛紛提出質問。厅长楊以德被迫从2月20日（旧曆正月初一）起，到3月7日止，准许被押学生和各界代表的家屬或亲友到警察厅探望。从3月7日以后，被押的代表們也准许到室外散步，偶而互相到被押屋里走走，也不被干涉了。因此，有些学生时常到馬千里和时子周屋里去学习功课，有的学习西洋史，有的学习经济学，有的学习英文。在押的代表中，除了楊曉林、夏琴西、李散人、尙墨卿是商界代表，孟震候是报界代表，王墨林是各界联合会的會計，赵仲禹是小商人，馬千里、时子周是南开中学教員以外，其余十七个人都是大学或中学的学生代表和爱国运动的领导骨干。这些爱国青年，虽然是在被拘押，竟还能够不忘学习，这种好学不倦的精神，实在是值得我们青年学生向他们学习的。

“四·二”絕食奋斗：被押学生和代表們，因为已經被押有两个多月了，还没有轉送司法机关或是开释的消息，而且被押的法政学生李权、各界联合会的會計王墨林、商界代表楊曉林三人患病很重，警察厅並不重視，並且又限制了大家到室外散步。大家除了在厕所里偶而可以碰头外，就没有机会再見面談話了。于是暗中互相約定在4月2日起开始絕食，表示反抗决心。海貨業代表尙墨卿还用白布条掛在胸前，上边写着：“楊梆子玩票啦，楊梆子快来呀，我們絕食了。”乘警察不注意，就掛着白布条在院中走来走去，正巧被楊以德碰上，楊以德破口大罵，随令警察把尙墨卿由保安大队二十三棚里提出来，送到拘留所去。不过，楊以德对各代表的絕食，倒就起心来。且3日

早晨，叫司法科長請各界代表时子周和孟震候二人到司法科來，研究解決的辦法，时孟二人就把大家要求的三個條件向司法科長提出：1. 把尙墨卿由拘留所放回來；2. 准許大家到院中散步，或到旁的在押屋里溫習功課；3. 請依法移送司法機關公審。司法科長當時答應頭兩項可以照辦，第三項須要先請示省公署再作答復。司法科並請时孟二人回去勸導大家進食。时子周等回來分向大家述說了一遍，當晚這才進食，有的代表到第三天早晨才進食。

一批學生要求替換被押代表：在警察廳被押的代表們絕食的消息傳出來以後，天津學生聯合會非常關心，4月4日立刻推舉代表王立軒、郭儒鐸、鮑長義三人到警察廳接見馬駿，司法科長沒讓馬駿出來見，而讓时子周、孟震候兩人接見的。王立軒等就向时子周問了問大家絕食的情形，时孟二人就把絕食經過述說了一遍，並請王立軒等回去向會上報告，請大家放心。王立軒等就回到會里傳達接見的情形。各校學生代表們因為各代表被押已經兩個多月，受盡了委曲，大家非常難過，還不知道以後結果好壞，於是商量自願的報名到警察廳去，把代表們替換出來。當時就有譚志篤、黃耀、王立軒、崔崇義、張裕、鮑長義、嚴永忠、何兆熊、魏春蕃、胡誦濤、王貴言、王子光、賈玉峯、劉詠溪、方敦、嚴津祥、趙光宸、鄭巖、王天麟、鄧穎超、王棣華、王同華、盧琿瑜、吳瑞燕等二十四人志願到警察廳去替換被押代表。在5日的下午，大家來警察廳，聲明是自願替換被押代表的，要求見廳長。廳長楊以德親自接見，大家就把來意告訴了他。楊以德听了大家的言語，他靈機一動，趕緊派人把被押的代表时子周和孟震候二人請出來和大家一塊談話。楊以德說：“換代表我沒有這個權利，我須稟明省長，省長准了才可以。”时子周就对大家表示了謝意，並說：“大家還是回去吧，假若警察廳能夠留下你們大家，可是我們也沒有出去的道理。我們在這裏邊無論受了什麼樣的罪，目的是為愛國，就是犧牲了性命也是值得的。你們大家進來是為我們，太不值得了，又何必進來呢。”时子周轉而又向楊以德說：“最好讓他們大家進去看看我們，也就放心啦。”楊以德就讓這二十四位志願替換代表的學生還和同來的學生一共三十多人分班進去，來到花園內，各位被押的代表也由屋里到花園

來彼此見面。到天快黑了，二十四位學生代表都戀戀不捨的才離開被押的代表。

被押代表移送法廳：自從被押代表實行絕食後，警察廳稟明了省長曹銳，決定把代表們移送司法機關。首先把患病的学生李權、聯合會會計王墨林釋放，4月5日又把商人趙仲禹釋放，4月7日上午把南開十四歲的学生陶尙釗和凌鐘二人釋放。當晚就把馬千里、馬駿、周恩來、郭隆真、時子周、孟震候、于蘭渚、楊曉林、張若名、師士范、祁士良、李培良、吳世昌、吳鳳岐、李燕豪、于駿望、郭緒榮、陳寶聰、夏琴西、李散人、尙墨卿等二十一人移送檢察廳。

地方檢察廳提起公訴：各界代表二十一人在4月7日由警察廳移送法廳後，地方檢察廳又拖延了將近三個月的所謂“偵查”。除對吳世昌、吳鳳岐二人沒有起訴外，在7月1日就對其餘的十九位代表，和1919年11月23日在唐山被捕的天津學生聯合會調查科長沙主培（天津成美中學學生）等共二十人提起“公訴。”對這些代表按五種所謂“罪名”起訴：（1）妨害公安罪（指調查日貨事）者有馬千里、馬駿、楊曉林、時子周、孟震候、夏琴西、李散人、沙主培、師士范、于駿望；（2）私擅監禁罪（指魁發成同人裴潭溪被帶到國民大會事）者有馬千里、馬駿、時子周、楊曉林、夏琴西、陳寶聰、于駿望、郭緒榮、孟震候；（3）妨害公務罪（指學生去警察廳質問代表馬千里等被拘事）者有師士范、陳寶聰、于駿望、李燕豪、郭緒榮、李培良、祁士良；（4）騷擾罪（指學生在省署請願事）者有周恩來、于蘭渚、郭隆真、張若名；（5）侮辱官吏罪者（指尙墨卿在警察廳被押時辱罵楊以德事）有尙墨卿一人。

代表等獲釋：地方檢察廳對各界代表提起“公訴”後，地方審判廳就在7月6日到8日連續開庭三天，在這三天當中，每天出席旁聽的人數總達四五百人，法庭里外沒有站腳之地。被捕的代表們聘請了律師劉崇佑、錢俊、蘭興周三人出庭代為辯護。地方審判廳刑事庭庭長俞鐘主審。6日上午八點鐘開庭，首先詢問春發興洋貨莊同人張傑三、珠馬市雙聚榮洋貨莊同人王慶林等，關於該號的日貨運到南開國民大會焚燒是何人所主使的前後經過。隨後就審訊代表馬千里、馬

駿、周恩来等人。三天辯論終結，在7月17日宣告判決。當天的下午一點鐘代表馬千里等人由看守所提到審判廳來，審判長當庭宣讀判決主文：

馬千里、馬駿、孟震候、夏琴西、楊曉林、時作新（即時子周）等犯私擅監禁，各處五等有期徒刑二月；于駿望、陳寶聰、郭緒榮共犯妨害安全罪，各處五等有期徒刑二月；周恩來、于蘭渚共犯騷擾罪，各處五等有期徒刑二月；張硯莊（即張若名）、郭隆真共犯騷擾罪，各科罰金六十元；尙墨卿（即尙車子）犯違警罪，處拘留十日；被告人等于未決前，期內羈押日數，均准折抵。馬千里、馬駿、孟震候、夏琴西、楊曉林、時作新、師景襄（即師士范）、沙主培、于駿望、李散人等，關於妨害公安部分均無罪，師景襄、于駿望、陳寶聰、郭緒榮、李燕豪、李培良、祁士良等關於妨害公務部分均無罪。

宣讀後，二日折抵一日。就把這二十位被拘的代表當庭釋放。

這二十位代表因為愛國，在反動的北洋軍閥政府百般迫害之下，經過了半年多的非法拘押，受盡了折磨，始終是不屈不撓，這種英勇鬥爭的精神，不只是受到了全天津市民的稱贊，而且更受到了全國各地人民的敬佩。在宣判的當天已有天津各界聯合會、學生聯合會的代表一百多人組織了慰勞團，備有“為國犧牲”字樣的紀念章贈給各代表們佩戴。代表們還在審判廳門前合攝一影作為紀念，隨後就乘坐汽車九輛開往總商會，出席各界的歡迎大會。代表們所坐的汽車上都插着白旗兩面，上寫：“歡迎被拘代表”字樣。當代表們離開審判廳時，審判廳門前人山人海，一看到代表們出來，羣眾們個個都歡欣鼓舞的鼓起掌來，還高呼歡迎被拘代表，沿途之上，受到了市民們的熱烈歡迎。

十三、天津青年進步團體與天津“五四”運動

周恩來同志原是天津南開中學的學生，畢業後去日本留學，因為“五四”運動起，就憤而返國，參加天津學生聯合會，為領導愛國運動的中堅分子之一，負責主編《學生聯合會報》，這一會報，由三日刊，發展到日刊。這張日刊是對開一大張的，日銷兩萬多份，因為它的內容主要是啟發青年的愛國教育，所以在天津學生當中，很受歡迎，在領

导天津学生爱国运动上起了重大作用。同时对天津学生爱国运动更有启发教育推进作用的，那就是周恩来和学生运动中的一部分进步青年骨干分子馬駿、邓穎超、郭隆真、刘清揚、关錫斌等二三十人所組織的“觉悟社”。这一部分进步青年，一因接受了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开始要求真理；二因进一步有了过較严密的組織生活的要求；于是就团結成立了“觉悟社”的組織。“觉悟社”成立后，周恩来同志成为实际的领导人。該社为了宣傳进步思想，出版了《觉悟》杂志，但該杂志仅出了兩期，便被迫停刊。因此，天津的爱国青年在“五四”运动期間，已不仅仅是單純的爱国热情，他們已經受到了苏联社会主义十月革命胜利的思想影响，憧憬着十月革命的胜利，萌芽着社会主义的思想了。

在“觉悟社”的組織以外，另有一部分男女青年学生，如于蘭渚、王天麟等十余人組織了“新生社”。这两个进步青年的小团体，它們在“五四”运动当中，都曾起着帶头作用和推动作用。

但“觉悟社”和“新生社”的生命都不很長，只有短短的几个月的時間，由于政治环境的惡化，领导骨干的被捕入獄，社員的分散，这两个小团体也就不存在了。但其中有几位革命烈士应当提出来以資紀念。馬駿是当时的一位优秀的学生領袖，1927年自苏联学习回国后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是年秋在北京被軍閥張作霖逮捕，1928年春被杀害。郭隆真是1927年三月与李大釗先烈同时被捕的，先被判处徒刑十二年，后因奉軍出关，經兩次減刑才得出獄，出獄后仍繼續奋斗，1931年在青島被捕，后解往济南被韓复榘杀害。他們二人临刑时都高呼口号，唱国际歌，英勇就义。这两位先烈都是回族的优秀兒女，也是回族青年們学习的好榜样。于蘭渚（又名于方舟）是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领导河北省玉田县农民起义时牺牲的。安毓文（即安幸生）河北省靜海县人，1927年11月担任省委工作时在北京遭張作霖杀害。他們在对敌斗争中的“威武不屈”，临刑时的英勇就义的高尚的革命品德，將永远是我们后一代学习的榜样。

紀念我們的回族烈士馬駿同志

陳 紹 禹

一、初見的印象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到底那一天，我已記不清楚了，大概总是十五日到二十日的左右吧，約莫夜間十二點鐘的光景，我們一行五十多個人，在大雪紛飛中，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學。走進校內二層樓上教務處附近時，遇着了比我們先到個把月的第一批學生當中的十幾個同志。當大家正握手點頭，打招呼的時候，我們猛然聽見一個人操着一口純淨的北京話向我們說道：“同志們！才到吧！辛苦了！你們在船上車上坐了這樣久，恐怕很乏了。來！我替你們幫忙，趕快把東西收拾收拾，到寢室里去躺躺吧。”說完話之後，他首先替大家提箱子夾行李，將我們帶到寢室里，然後一個一個地安定床位。他的熱情，引起了我們初到的十幾個同志對他特別注意。他是一個中等身材，體格強健，精神飽滿，面色黝紅，頰滿髭須，目光銳敏，聲如洪鐘，年約三十四五歲左右的人，他和每個人都是一見如故，有說有笑。他和每個人說話的時候，很自然地流露出各種表情：說到“五四”和“五卅”事變時，他的面目間充滿着對帝國主義的痛憤，同時，流露着中國青年參加反帝革命的自傲與自信；說到黨派同志們來莫學習任務時，他用着鄭重的態度諄諄地說：“我們大家要努力學習，好趕快回去干。”但是，大家無論說正經話或說笑話時，誰也說不過他，首先就是他的豪爽態度，真誠動人；其次，他的一口北京話說得响亮純熟，有高有低，抑揚頓挫，音韻天然；再次就是他的滑稽天才，即景生情，任憑聽眾笑得大笑哄堂，他依然神色不變地滔滔往下說；然後，就是他的說話的煽動力和吸引力，使聽的人感覺到心誠悅服，樂而不倦。我當時對他的感想是：他是一個熱忱親密的同志，是一個勇敢有為的干材，是一個天才的演說家，是一個善與人交的朋友，是一個真情流露的人。從別人對他的招

呼当中，我知道他就是时常听說的馬駿同志。

二、談出的身世

同在中大讀書，朝夕見面，經過不久，我和馬駿成了很好的朋友。有时在課堂內，有时在公园里，有时在列宁山上，我們时常和馬駿同志一塊談天。据我現在所能記憶得出的，从历次說話中，我們知道的馬駿同志的身世大約如此。

一九一九年，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肄業；当巴黎和約行將签字的消息达到京津时，首先引起了智識界和学生的無限憤怒，馬駿同志以其演說的天才和組織的能力，在南开及京津各校大肆活动，成为震动全世界的“五四”运动的主要青年領袖之一。在羣众示威集合中，馬駿同志都是站在最前鋒的地位，他以南开全体学生代表的資格，出席各种羣众會議，領導京津学生救国运动。他代表全京津学生向各地各界奔走呼号，要求大家一致團結抗日。他曾因努力抗日救国而遭受反动政府再三逮捕，但每次均因羣众抗議和羣众救援而被釋。他是当时京津学生中許多革命团体的發起人和組織者，其中有一个团体（我忘記了名称）便是后来北方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組織的前身，因此，馬駿是我們党的最老同志之一，是我們党的發起人之一。

三、共同斗争和共同工作

在中大正式上課后，一九二六年九月初，中大学生公社改选时，我和馬駿同志均当选为公社的負責人（我作主席，馬駿同志作書記）；从此，我們在一塊工作和聚談的机会更多了，从这时候起到一九二七年初我离开苏联而返国之日止，每天除上課外，差不多我們总是在一起工作和一起聚談。在中大时，右派国民党员、託洛茨基主义者、几个爱鬧派别的野心分子，时常借各种机会，来进行反对苏联，反对联共，反对共产国际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因此，不仅每次的学生公社的全体大会，是一个公开的热烈的政治斗争場；而且課堂里、寢室里、走廊上，到处都成为政治爭論的場所，不仅一切大的問題——每一国际事变和每一中国問題，成为列宁主义者与三民主义者和託洛

茨基主义者爭論底对象，成为共产党員和左派国民党员与右派国民党员斗争的起点；而且一切日常生活的細小問題，时常都成为战斗双方在政治問題和人生觀問題爭論底引線。在这种热烈的战斗环境里，馬駿同志愈加表现出其政治的天才和組織的材干。他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立場和策略艺术，不仅善于打击敌人的要害，而且能够抓住敌人的弱点；他不仅能动员自己的生力軍去給予敌人以正面的打击，而且能分化敌人的营壘使最反动的势力处于孤立。他在学生公社全体大会上的每次演講，都能使同道者心欢，使敌对者气馁。他在学生公社委员会中的每个提議，都能使人感觉到他的智力超羣和眼光远大。因此，我和其他公社委员会的同志們，当时深感觉到馬駿同志在工作中給了我們很大的帮助。現在想来，更加使我感到我在和馬駿同志共同工作和共同斗争中，得到不少的补益。

四、宗教与汉回問題

因为馬駿同志是回回族人，所以同志們时常喜欢与他說宗教和汉回兩族关系問題，馬駿同志对于這個問題也特別有兴趣，常是有問必答。記得有一次，大約是一九二六年五一节前后的光景，一个已含有春意的早晨，好几十个人团聚在中山大学对面教堂左首的小花园里，晒太陽談天，不記得那一个又特別向馬駿同志探問他为什么不吃猪肉的問題，因而引起馬駿同志对于這個問題作了約四十分鐘的談話——不，不是普通的談話，簡直是一篇論宗教汉回关系問題的演講。他的講詞全文，我虽然不能記得十分清楚了，但因为我对他这次談話感觉到特殊的兴趣，所以有时还約略地能回忆起大意来。他这篇講詞的大意是：

“我是共产党員——馬克思列宁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者，我当然記得，——而且深刻懂得和相信馬克思講的一句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但同时，正因为我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以我也特別懂得宗教在人民中的深远傳統和習慣力量。因此，我不特不对信仰任何宗教的人加以侮辱，而且相反，我总是尊重他們的信仰自由；我懂得而且深信：反对宗教和破除迷信，絕不是

簡單的短时期的一回事。宗教問題与各民族的文化程度和生产力發展程度，有密切的关系。我不吃猪肉，不仅因为我不願离开我的回回族，而且因为我願意尽力作汉回关系的調剂人。汉回关系，由于历来回族民众受汉族皇帝、官吏和軍閥压迫剝削的原因，由于历来汉回战争和各地汉回械斗的原因，已經造成很大互不相信的根蒂。我自从深入社会与汉族民众接触以后，深深感覺到我們汉回兩族民众之間，虽有宗教信仰上的不同，但的确沒有任何不能解除的惡感。除此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这几十年，我們中国的整个命运，都处在風雨飄搖的地位，無論汉、蒙、回、藏、滿、苗等，都有变成亡国奴的危險；無論那一族的大多数民众，都是逐漸走到失業破产和飢寒交迫的境地。要想救我們中国境内各民族，只有各民族联合起来，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才有办法，否則大家互相爭斗，結果同归于尽。我在中学时代，时常便想到这个問題，但是，我当时想不到解决汉回关系的方法。自从我研究俄国十月革命解决民族問題方法的書籍以后，自从我研究了一下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我便全明白了解决民族問題的真正途徑。我認識了我們回族和汉族的將來命运，都取決在革命方面。我認識了只有共产党和苏維埃政权，才能真正徹底地解决民族問題，使各民族达到政治上、文化上、經濟上的平等地位。因此，在“五四”运动以后，我便开始作社会主义的运动，建立社会主义的青年团体，而当成立中国共产党运动一开始时，我便热烈地欢迎和参加。現在我入党已經几年了，但是我还是不吃猪肉，主要地因为我要作一个回汉关系的調剂人，我要把回汉各民族团結在一个共同的革命旗帜之下。我是回族人，我特別懂得在回族民众中开始共产主义运动的困难，尤其是非回族人去进行这个运动的困难，因此，我願留在回族内部去进行革命运动；但同时，我虽是回族人，但我却沒有任何狹隘的民族偏見，我对汉族人民抱有深刻的認識和同情。我相信汉回民族在共产党領導之下，一定能亲密合作，共同奋斗，所以我相信同志們也不会因为我不吃猪肉而把我看外。总而言之，我們汉回民众和

漢回同志們相互間的主要問題，不是吃不吃豬肉的問題，而是如何達到相互了解，相互相信和相互親敬，以便達到共同革命和共同解放的道路。

馬駿同志的這番議論，不僅對於我，而且對於當時聽到的幾十個同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僅提高了大家研究中國民族問題的興趣，而且增加了大家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信心。

五、生離與死別

一九二七年一月初，我奉命要離莫回國。但因為秘密工作的關係，我不能把此事告訴任何不必知道的同志。因此，雖然從對黨的關係方面講，馬駿是一個很忠實的同志；從對我個人關係講，馬駿是我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從幾個月來的共同工作方面講，馬駿是我的親密的同事；從一年多同學的關係講，馬駿是我的一个最友愛的同學；但我不能告訴他我當時離校的真正原因。於是，當我託他代替公社一切工作時，我只能告訴他說：“我要到南俄去作國際宣傳工作，大約一兩個月後，才能回來。”馬駿同志聽說我要和他分別兩月的消息，特別約了我和他談了兩點鐘的話。在這兩點鐘內，我們不僅談到兩月之內公社要做的工作，而且还說了許多與中國革命有關係的問題。當我們握手告別時，在他覺得，我們不過是一兩個月的短期分手；在我覺得，我們也不過只是暫時的生離；然而，誰也沒有料到：我們此次握手，竟成了馬駿同志此後再不能見我的死別！

六、奮鬥與犧牲

當一九二七年八月初，我回到莫斯科時，找遍舊友，已不見了馬駿同志，當時我雖然不便打聽馬駿同志的下落，但我猜想馬駿同志大概已經是奉黨命而盪返戰場上去了。後來，從有些新從國內來的同志的談話中，不僅知道了馬駿同志的工作地點，而且曉得了馬駿同志的工作困難。京津一帶，是馬駿同志原來活動最多的地方；這些地方，一方面對於馬駿同志，固然有許多熟地熟的便利，另一方面，却對於馬駿同志，發生了行動不便的困難。當奉系軍閥探聽到馬駿同志

重新回返京津一帶工作时，在一切交通要道，日夕里遍布探狗去偵察；因此，馬駿同志用尽了一切化裝技术去避开探捕的視線。因为探狗們都知道馬駿是个大学生，所以特別留心到各学校和教育机关中去找寻線索；但是，馬駿同志却日夜藏身在貧民窟里，一切衣食，均与苦力相等；以致探狗們費时数月，毫無所获。直到十月底的时候，一方面因为張閻〔張作霖、閻錫山〕战争的关系，在时局緊張中，敌人的探捕更加密布，另一方面，因为北京党市委中有一个同志不注意秘密工作的技术，致使市委多数委員在會議时全数被捕。馬駿同志是党的北京市委書記，所以敌人特別注意他，对他施用各种慘無人道的非刑，企圖从他口中得到所謂共产党的秘密，但馬駿同志以其百折不屈的意志和忠心不二的操守，忍受了一切痛苦和折磨，絕未曾說出党的半件事。当法官公开指出他的真姓名和宣布他的所謂“罪狀”时，他用他所固有的洪鐘似的声噪和雷霆似的震怒，指罵奉系軍閥卖国殃民的無穷罪惡，說明共产党为国为民的奋斗意义。审判官被罵得閉口無言，羞慚滿面，同时，一塊被审的几个同志以至軍警，均悲憤填胸，共洒同情之淚。

据当时我們得到的消息說，当馬駿同志被綁赴刑場时，他上衣被剝，精着赤脖，兩手背綁，兩脚加鐐，在他的黄包車前后，滿布着持刀荷槍的軍警；但他在黄包車上，挺身端坐，毫無惧色；他昂着头，大睜着兩眼，向观众回顧；他的面目虽然憔悴而黝黑，但他的每一呼吸和搏斗中，依然充分表露出他的勃勃的生气；他的兩須和下巴上迎風飄动着六七寸長的黑須，愈發显出他的英勇本色和豪俠气概，来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軍閥。他理直气壯地說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直到临刑时，还高呼革命口号。馬駿同志这种壯烈牺牲的精神和英勇就义的風度，不仅使沿途数万观众，表示無穷的敬佩；就連警戒的軍警，也有的感觉羞慚，有的凄然下淚。

当馬駿同志被难的消息傳到莫斯科中大时，引起了一切同學們的無限悲憤，立刻召集全校学生教職員大会举行追悼，並決議將中大俱乐部名为馬駿俱乐部！

七、我們要完成馬駿的遺志

时光似箭，距馬駿同志殉难的时期，快要九年了！現在，当我们党成立十五週年紀念的今天，当我们紅軍进军西北和北上抗日的今天，当中国革命在西北汉回杂处区域日益發展的今天，当西北各省时时有被日寇占領危险的今天，我們对于馬駿同志——偉大的中国共产党的發起人之一，偉大的回族人民的最优秀子弟之一，汉回兩族革命运动的共同代表，汉回兩族亲密联合的最老战士，愈增加回忆的衷忱，愈增加痛惜的怀念。但是，紀念革命者最好敬礼，是完成烈士的遺志，是完成烈士的未完之業。

当紅軍主力还在閩贛苏区时，国民党的二十六路軍（孙連仲部）內的回族武裝同志們，便与汉族兄弟們共同起义去归附紅軍，而成为現在紅五軍团的一支骨干。現在，一部紅軍主力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东同志亲身率領之下，正在西北各省进行抗日救国活动，汉回兩族合力共御外侮和合力共得自救的偉大前途，必能在不远的將來完全实现。

全中国各民族抗日救国的大联合，全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事業的胜利，汉、蒙、回、藏、滿、苗、黎各民族在中国境內一律平等底实现，回族人民在政治上、文化上、經濟上的自主与独立底获得，是对馬駿烈士的永垂不朽的紀念碑！

选自 1936 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週年紀念叢書》中《烈士傳》第一集，此次刊印字句略有删节，未經原作者审阅。

紀念馬駿烈士

光榮犧牲三十週年

劉清揚

馬駿烈士，是“五四”反帝愛國運動，在天津奮鬥的主要青年領袖之一。他以充沛的熱情，堅強的意志，英勇的氣概，和堅貞不屈的精神，從參加“五四”反帝愛國運動，進而努力於人民解放的革命事業，歷經九年的艱苦奮鬥，竟於1928年2月15日，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所殺害。他的光榮犧牲，於今已整三十週年。在這三十年間，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經歷了千辛萬苦的鬥爭，終於獲得天翻地覆人民解放偉大的勝利。廣大人民得到自由幸福的生活，偉大的祖國已建成為多年人民所希望的，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新國家。馬駿烈士所奮鬥的目標，已完全實現，他為人民革命解放事業的英勇貢獻，成為後一代青年最優秀的典型，他的精神已永垂不朽。

馬駿烈士，是前吉林省寧安縣人，是堅強的共產黨員，是回族的光榮戰士。生於1895年，到1928年英勇犧牲的時候，年僅卅三歲。

1919年，馬駿烈士在天津南開學校讀書。當“五四”反帝愛國運動的時候，天津各男女學校，都立即響應。在發動首次愛國示威遊行以後，即宣告成立天津學生聯合會，馬駿當選為學聯會副會長。同時女界愛國同志會和各界聯合會，也都相繼成立，並積極熱烈地進行愛國救國的宣傳。無論在街市講演，或號召羣眾示威遊行，馬駿烈士都起了積極帶頭作用，奔走呼號不遺余力。馬駿烈士不但是青年中的領袖之一，並在各界愛國人民之中，也有很高的威信。他以生龍活虎般的戰鬥精神，提出喚醒人民的愛國口號，都使廣大羣眾熱烈擁護。在進行羣眾示威遊行時，只要是由馬駿烈士領導指揮，就會使羣眾們的戰鬥勇氣，成為不可抗拒的力量。尤其馬駿烈士在動員工、商、學界

罷工、罷市、罷課的号召威信，不論在天津、北京或上海，都起着極大的作用。

“五四”运动在天津，青年学生，知識分子以及各界爱国人民的斗争，都是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为战斗的主力。各界联合会团结工商学各界和各阶层爱国人民，成为一个战斗的整体。馬駿烈士代表学生联合会，出席各界联合会，更积极于宣傳抵制日貨运动。在这些爱国团体之中，有一个领导中心，那便是“觉悟社”。“觉悟社”是由青年男女先进积极分子所組成，他們团结的精神，是以初步的馬列主义武装自己的思想，所以更增强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力量。馬駿烈士就是“觉悟社”中的主要骨干之一。其中关于理論思想的学习，是由周恩来同志負领导的責任。

天津的反帝斗争，随时都与北京学生联合会配合行动。如第一次发动向徐世昌大总统請願，要求拒絕在“凡尔赛和約”上签字，並否認日本提出的廿一条亡国秘約，就是馬駿烈士协同天津代表十人，与北京学生代表共同进行的。1919年6月27日，三十多位京津的代表，以及許多学生羣众，在中南海新华門前，坚持兩正天，要求面見大总统。由于羣情憤激的压力，徐世昌于次日晚間，亲自接見学生代表。由副官長领导代表团，到怀仁堂的正厅，在一張大長桌的周圍，讓代表們圍坐。徐世昌要代表們說話。一位北京代表發言后，天津代表馬駿接着慷慨激昂地說：“我們全国人民，以非常憤怒的心情，絕不允許巴黎和会，实际是分贓會議的決議，把我国在山东的各項特权，由日本繼承。因为我国也是参战国之一，既打敗了德国，它在山东侵佔我国的各項特权，就应归还我国；交由日本繼承，是絕不公道的。尤其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提出的廿一条秘約，必須坚决否認，並應該完全取消。徐大总统既为我国的元首，就有責任保护我国的領土和主权，在国际和平會議中，絕不能簽訂任何秘約，以免喪权辱国。政府應該堅持力爭，必須立即通电，拒絕簽字，我們人民願为后盾，否則全国人民必然坚持奋斗到底！不获胜利，絕不罢休。”馬駿烈士的一番話，說得徐世昌張口結舌，無言可对，只好应許了大家的要求，立即給巴黎和会我国代表去电报，拒絕簽字。請願代表团才获得全胜而归。

二次京津代表的聯合請願，是因為山東省長馬良，槍殺了愛國羣眾遊行的領袖，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慨！各方紛紛通電，要求懲辦馬良。京津代表廿五人，於8月23日聯合請願。要求面見總統，徐世昌不但未與接見，反於當天下午，將全體代表逮捕。警察總監吳炳湘，並聲言要槍斃全體代表，以威脅其他愛國人民。

天津各界團體一致決定，為營救被捕代表，由馬駿烈士帶領天津學生千餘人，分頭晉京，與北京學生聯合請願。於天安門前，集合京津學生四五千人。馬駿烈士以激昂憤慨的熱情，首先高聲呼喚，要求全體學生，誓與被捕請願代表，同患難，共生死。並說，我們堅決要求恢復被捕諸位代表的自由，否則我們必須奮鬥到底。此時，反動頭子吳炳湘已調集了全城軍警，嚴密包圍了天安門，把學生們從天安門前，逐漸壓縮到天安門里，東西關門都已封鎖，並發令逮捕馬駿。但學生羣眾為愛護馬駿烈士，極力設法掩護，不許他出頭，殘暴的軍警，竟以皮鞭槍托，毆打學生，學生們更堅強反抗。馬駿烈士不忍為他一人，而使多人受傷，竟挺身而出，制止軍警無理打人的暴行。馬駿烈士隨即被捕，並被押至天安門洞以內。反動的軍警以槍口指向馬駿烈士前胸，向學生羣眾說，如果學生隊伍還不解散，即行開槍射擊。但學生們羣情憤激，一擁而上，以死相拚，保護馬駿烈士，並提出對策，必須釋放馬駿，仍由馬駿領導學生大隊回歸學校，才能撤退，否則即或槍斃馬駿，也絕不後退。反動統治者懾於學生羣眾的壓力，只好允許了大家的要求。馬駿烈士，坦然自若，毫無懼色，及至恢復了自由，便英勇領導大隊學生，昂然高呼“打倒賣國賊！”“誓必要求釋放被捕代表！”“要求懲辦馬良！”等口號，繼續遊行之後，宣佈散會。被捕代表當天雖未釋放，但經過這樣堅強奮鬥的壓力，反動統治者也只得借各方保釋的機會，於八月卅日將全體代表廿五人釋放。從此以後，京津學生都稱馬駿為馬天安，就是為了紀念這次天安門奮鬥的光榮勝利。

天津各界愛國人民，經過多次英勇奮鬥之後，便決定推派代表去上海，發起成立全國各界聯合會，馬駿烈士是被派三人代表之一。到上海時，首先受到報界的歡迎，並協助登報号召宣傳，邀集各地方各界聯合會派代表來滬，進行籌備工作。於九月中旬到滬發起倡議，十

月間各地代表，已紛紛來滬，積極進行籌備工作，於十一月十日，在上海四川路男青年會，舉行全國各界聯合會的成立大會。除全國各地來滬代表二百餘人外，當地與會來賓，一千多人集中一堂，興奮熱烈，宣佈全國各界聯合會的成立，即成為全國人民愛國運動的領導中心。並於大會閉幕時，經到會羣眾的建議，要求舉行示威遊行，馬駿烈士被公推為遊行大隊的總指揮，領導着全體代表來賓和各界羣眾，整隊前進，高呼愛國口號，並隨路宣傳講演，以嚴肅威武的行列，通過英法租界，直到華界寶山路等地，沿途觀眾，熱烈歡呼，並參加遊行大隊。遊行大隊以強壯而偉大的團結力，衝破了帝國主義在租界內，侵犯我國人民集會行動自由的禁律。這是全國人民愛國運動，第一次偉大的勝利。

全國各界聯合會成立會，選舉了京、津、滬、寧、漢口等地代表為駐會常任理事，負責領導日常工作。馬駿烈士，以積極負責工作的熱情，和豐富的組織能力，對上海的愛國運動，建立了很好團結合作的關係。尤其他的講演天才，不僅是聲音宏亮，口齒清晰，特別以愛國革命鬥爭的思想感情，對激動人民羣眾愛國運動的積極性，發生了很大作用。並幾次在閱馬廠所舉行三四萬人的大集會中，馬駿烈士的講演號召，鼓動罷工、罷課的行動，更起決定的作用。

天津反動警察廳長楊以德，要撲滅天津人民的反帝運動。因此天津人民抵制日貨受到壓迫，各團體領導人，也不斷被捕；為了堅持反帝鬥爭，所以將駐滬代表調回天津，以加強鬥爭的力量。由於鬥爭的更加尖銳，馬千里和馬駿等各界領袖人物都相繼被捕。在最後一次大請願的運動中，周恩來、郭隆真、于蘭渚、張若名等四位羣眾代表也都被捕入獄。因此，遂引起全國愛國人民的憤慨響應。要求釋放天津被捕代表，最後全體被捕代表，都釋放出獄。馬駿烈士在禁閉之中，蓄起很長的鬍鬚，朋友們戲以“美髯公”稱之，馬駿烈士笑而回答說，決意把它保留下來，以便於在今後的革命行動中，作為化裝變像的工具。

“五四”運動雖告一階段，但革命的潛力，正在深入和發展。為了進一步加強救國革命的力量，“覺悟社”的領導骨干，在合影留念之後，即有計劃地各奔東西進行學習，準備武裝自己的思想意志，而再

接再厲的奮起。馬駿烈士仍繼續活動，並加入共產黨，回原籍寧安育文中學教書三年，於1925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他努力鑽研蘇聯的革命經驗和鬥爭政策。因為他是回族的革命青年，所以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民族政策，更加體會深入。他認為全國各族人民，必須團結一致，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共同努力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全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才能取得徹底的勝利。

1927年春，中國共產黨北方區革命工作，受到嚴重打擊，以北方區書記李大釗同志為首的國共兩黨升位幹部，犧牲於奉系軍閥殘暴的絞架之下。為加強北京地下工作，馬駿烈士被調回國，派赴北京擔任市委書記職務。他在來京之前，路過天津，見到老戰友，都因擔心他在北京活動多次，全城軍警對他都很熟識，深怕難以隱瞞，故勸阻他不可來京。但他堅守組織紀律，絕不動搖，並說，黨既然給了我任務，雖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不應知難而退，只有多加謹慎而已。因此，他到京之後，不但要隨時化裝掩護，並且還居住在貧民區，藏身於勞動人民之中，進行活動。但在張作霖的瘋狂高壓之下，竟於九十月之間被拘捕。在審訊中，雖施以慘酷毒刑，嚴加逼供，要他供出組織機密，但馬駿烈士，大義凜然，始終堅貞不屈。

馬駿烈士的夫人楊秀容女士，聞馬駿烈士被捕後，隨即來京，百般設法營救。但兇暴的軍閥張作霖，竟於1928年2月15日，將馬駿烈士殺害。馬駿烈士在就義時仍然英勇不屈，沿途高呼：“打倒賣國軍閥！”“共產黨萬歲！”等口號，而後毅然就義。

三十年前，艱苦卓絕，堅貞不屈的青年戰士，為爭取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始終百折不回，不惜貢獻出自己的寶貴生命。因而更激起千百萬後起革命青年，繼承烈士的優良傳統，接替烈士的光輝遺志，再接再厲，前仆後繼，直到獲得人民解放的偉大勝利。更進而把祖國建設成偉大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以保衛世界人類的永久和平，作出更大的貢獻，才不辜負馬駿烈士不朽的精神。 1958. 1. 12. 北京。

郭隆真烈士傳

刘清揚

“五四”时代英勇奋斗的郭隆真同志，是我国妇女界中，热爱祖国，刚毅果敢，坚贞不屈的光荣榜样。是反对封建压迫，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鋒战士。她为保卫国家的領土主权，为争取民族自由解放而斗争的革命風范，是后代革命青年的优秀典型。她生前英勇奋斗的事跡，是值得我們景仰学习的，应繼承她的优良傳統，而为祖国社会主义革命事業，奋斗到底。

一、冲破封建压迫的斗争

郭隆真烈士，原名郭淑善，后改名嵌濟、隆真、林一等革命用的名称。她是河北省大名县金灘鎮人，是共产党员，回族的先进妇女。生于1893年3月18日。自幼的性格，就是天真热情，坚强不屈。年稍長，即意識到封建礼教对于妇女束縛压迫的不合理。她生于封建士紳的家庭，一切要遵守旧礼教的約束。当她哥哥入学讀書时，女孩子沒有上学讀書的权利，仅在家中稍稍識字，学习《女兒經》、《女誠》七篇、《閨范》、《列女傳》等封建教条。她讀了这些封建礼教的东西，感到很滿意，便向她父亲提出質問：“为什么哥哥不讀男兒經，男誠七篇，列男傳呢？”她父亲回答說：“我国向来就是男治外，女治內，因为所負責任不同，所学的东西也就有差別。”她抗辯說：“不！木蘭从軍，緹縈救父，还不是与男兒一样嗎？”她父亲笑着說：“你的話有道理，有志气，以后可以同你哥哥一起听講去。”她获得反封建的初步胜利，得到学习的机会。

封建婚姻的压迫，又使她遇到阻碍。在讀書听講不久，她母亲又督促她学习針黹和烹飪。因为已給她訂了所謂門当戶对的婚姻，对方有房、有地、有财产，未婚夫是独生子，还年幼，須要提早結婚，好为

夫家去料理家务。因此，她母亲認為只要能治家就行了，沒有多讀書的必要。隆真反对中途輟学，但在封建时代，既已訂婚，要想解除婚約已不可能。因此，她想出了奋斗的办法，十九岁时，她允許結婚，但这是为給她父母解脫責任。在娶过門后，她便向婆婆提出条件，要求先允許她外出去讀書，畢業回来，再給她們操持家务，否則便与她兒子离婚。婆婆因为兒子年幼無知，媳妇坚决要去求学，不得已只好允許她的要求。她又冲破第二道封建枷鎖，离开家乡来到天津求学。

二、入学校讀書

1913年，天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于春季始業时，来了一位新同学，年在廿岁左右，身上穿着藍布罩褂，里面套着一件很新的紅棉袄，她引起同學們的注意。經了解，知道她是为反对强迫婚姻，在奋斗胜利之后，出来求学的。同學們既同情她的遭遇，又敬佩她奋斗的魄力，所以都对她表示敬意。

由于她为反抗强迫婚姻的斗争，受到不少的刺激，因而损伤了腦力。初入学时，先入簡易师范班，再入师范預科，然后才考入完全师范第八学級。讀書时腦力終于感觉迟鈍，因而在校讀書時間較久。她待人接物，总是虛心和藹，亲切誠懇，所以同學們都很喜欢和她接近。

三、参加“五四”反帝爱国运动

1919年5月4日，中国知識分子和男女青年学生；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陰謀侵略我国，在北京暴發了反帝爱国运动。郭隆真烈士首先在天津女师学校响应，号召全体同学参加救国运动。並發起組織成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向校外發展，广泛动员各界爱国妇女入会，扩大团結奋斗的力量。全体會員有六百多人，从十三四岁的小学生，以至六十多岁的老太太，都是热情高漲，積極投入爱国运动。郭隆真烈士，更对奔走联络，宣傳呼吁，不遺余力。

在“五四”运动高潮中，北京与天津的学生联合会，經常联合行动。如兩次向徐世昌大总统請願，要求拒絕巴黎和平會議的签字，郭隆真烈士，都積極晋京参加斗争。第二次，竟因要求懲办槍杀爱国羣众領

袖的山东省長馬良，全体請願代表廿五人都被北洋軍閥政府逮捕。隆真烈士，是四位女代表之一，拘捕后，虽然几乎被判处死刑，但她始終欢欣鼓舞，毫不畏惧。甚至时常高声欢唱，或开来的菜飯中，有日本产品，如洋粉海帶等物，竟斥責监所警察，拿回去調換別的食物。四位女代表中，有二人是回族，因当时警察厅长常朗齋也是回教徒，所以飯菜是从他的厨房开来的，虽然飯菜还都不错，但被捕代表絕不被軟化屈服，依然坚决抗拒斗争，对反动統治者，毫不寬容。

在天津进行多次的羣众大遊行，总是首先由女界同志会的妇女队伍作前驅。由郭隆真烈士的英勇領導，一遇阻碍或發生冲突，郭隆真烈士，便帶領妇女羣众冲上前去，以防备軍警毆打男同学。在作冲锋前衛的斗争中，虽忍受槍托和木棍毆打，以及冷水澆头的摧殘打击，隆真烈士坚持苦斗，絕不后退。直到天津爱国运动，受到严重压迫，各界爱国人民，进行最后一次巨大的請願运动时，郭隆真烈士和周恩来同志等，同时被拘禁，半年之后，始得开釋。

四、赴法勤工儉学

郭隆真烈士，在“五四”运动后与封建家庭脱离关系，更抱定献身衛国，奋斗到底的决心。这时，参加“五四”运动积极斗争的青年，在救国的經驗教訓中，都感覺到自己責任的重大，同时也体会到自己能力的欠缺，为充实自己的力量，不能不加紧学习，因而形成追求学习的高潮。当时一些进步学生正在發起赴法勤工儉学会，只要二三百元的車船旅費，到达法国后，便可进入工厂，边工作，边学习，以实际劳动，鍛鍊自己。天津共同奋斗的战友們，以互助的热情，設法为郭隆真烈士，筹措了旅費，同行赴法留学。

郭隆真烈士到法国之后，就进入工厂学习作工技术。作工技术熟練后，工資所得，不但足够自己生活所用，並有余力，热心地帮助別人进入学校去学习。当时因为参加“五四”运动的优秀青年，一部分集中于巴黎，就团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海外支部，郭隆真烈士即加入共产党，从此后，她便以無限忠心，努力于無产阶级的革命事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五、參加北伐大革命的斗爭

1925年，進入北伐大革命的前夕。四月間在國共合作的努力下，成立了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由共產黨員和一部分國民黨左派黨員，共同負責領導工作。五卅運動時，北京人民更英勇奮起，展開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在這樣緊張鬥爭時期，郭隆真烈士被調回國，派到北京，協助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婦女部的工作，是婦女委員會的委員之一。當時在皖系軍閥段祺瑞的反動統治之下，工作非常艱巨，凡對城內外各大大學校，進行宣傳聯繫女學生的工作，以及西郊香山慈幼院地下的工作關係，都由郭隆真烈士一人負責，深入聯絡奔走活動。她對革命任務，不但熱心積極，而且更忠誠可靠膽大心細。

1926年3月18日，北京人民在陸軍部門前請願，遭受段祺瑞兇暴的慘殺以後，國共兩黨的工作，都轉入地下，並遷入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西院，繼續領導鬥爭。奉系軍閥張作霖入關，對革命的高壓，更為嚴重。對於革命幹部的行動，處處都是刑網密佈，雖在那樣艱難困苦中，郭隆真烈士絕不退縮。她以堅定不移的意志，大膽而坦然的氣魄，能克服任何困難，完成她的任務。她以和藹真誠，耐心宣傳的毅力，使人受到感動。所以使人雖在那樣嚴重壓迫之下，更加積極努力，向反動的統治者，作絕不妥協的鬥爭。尤其她是國共兩黨跨黨的黨員，她負擔着雙重的政治任務，責任非常繁重，但她竟以剛毅果敢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難，擔當她的艱巨任務。

為了加強對婦女宣傳教育的工作，因印刷的困難，由雙周刊改為月刊的小冊子《婦女鐘》、《婦女之友》等刊物，在北京無法印刷時，也由郭隆真烈士，每月把編稿送到天津，即時印好，再由她用大網籃裝起來，外加以偽裝，當作行李，帶回北京發行。那是冒着萬險的行動，但郭隆真烈士，都是大膽而坦然的態度，來去自如，完成任務。為避免前門車站的檢查，在東便門小站下火車，然後僱人力車轉道入城。

為掩護婦女工作的來往便利，還創辦了一個縵雲女學校，在西城租一所小房子，也由隆真烈士負責主持。她住在里边，對內負責學校行政，對外進行革命活動。

1927年，軍閥張作霖為要維護他即將崩潰的反動統治，對於革命鬥爭的迫害，更是變本加厲。在李大釗先烈等被捕之後，郭隆真烈士，也在縵雲女學校被拘捕。幸而她已早有戒備，消除了一切革命證件。所以她在被捕後，易于應答抗辯，既無證件，又無口供，故被判处徒刑十二年。以後奉系軍閥被迫出關，經過一再大赦和減刑，最後經朋友設法保釋，徒刑兩年後，即被提早開釋。郭隆真烈士在監獄之時，仍然以她的模範行動，影響別人。不但獄中其他監犯，即或獄吏，對她也很敬重。因她在京師模範監獄，還負責領導犯人的技術工作，如夏季在竹帘上畫花草蟲鳥等物，作完她自己的工作，便積極幫助別人。所以她在監獄中的言語行動，在羣眾中，也起了良好的作用。

六、再接再厲，堅持奮鬥到底

郭隆真烈士出獄後，在北京已是舉目無親，因為相知的同志，不是犧牲殉難，便是調離北京他去，後繼的地下工作關係，她無法取得聯繫。但她矢志不渝，絕不氣餒，設法離開北京，去上海尋找組織關係。當時上海也正在國民黨政府黑暗統治之下，地下工作非常秘密，無法接上關係。但她終不灰心，天天到街上去尋找機會。果然遇到一位老同志，把她帶回組織，又接受了新的地下工作任務。

郭隆真烈士的新任務，是去青島作聯絡女工的工作。負擔宣傳和團結女工的工作，必須設法逐漸與工廠的女工接近。一天她在海邊和一位女工談話，女工有個小孩在打攪他們，她一時不慎，竟拿出一元錢，哄小孩到旁邊去玩耍，恰在此時，被偵探看出懷疑，何以兩個貧苦女工閑談，竟以一元錢哄小孩！其中必有原故。因此便跟蹤隆真之後，偵查她的行跡，證明她是革命工作者的行動，二次又被反動統治者所逮捕。

韓復榘是當時山東主席，是最野蠻無知的反動軍閥，對革命活動的壓迫，最慘酷無情。郭隆真烈士在青島被捕後，即押解到濟南。在審訊中，施以各種慘酷毒刑，郭隆真烈士，始終咬緊牙關，不哼一聲，忍痛抗拒，堅不吐供。她堅忍不拔的英雄氣概，竟使執刑獄吏，于良心有所不忍，敬佩她堅貞不屈的氣節，認為實在少見這樣百折不屈的光明

磊落态度。反动軍閥韓復榘，竟在毫無口供的情況下，無法無天將郭隆真烈士杀害。在深夜里，郭隆真烈士被提出監獄，她始終堅定英勇不屈，在走向刑場之時，其他被押同志聽到她高呼：“革命勝利萬歲！”“無產階級革命成功萬歲！”隨着槍聲才停止了她的呼聲，而從容就義。一位熱情勇毅，堅貞英挺的光榮戰士，就此完結了她的戰鬥任務，慘烈地犧牲了她的寶貴生命。她的精神應永垂不朽！她的奮鬥事蹟，與世長存。

1958.1.8. 北京。

辛亥革命時期的上海中華銀行

沈 云 荪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11月3日上海光復，組織上海軍政府於海防廳署。陳其美為都督，沈縵雲為財政總長，發布告示如下：

照得武昌起義，同胞萬眾一心；凡我義旗所指，罔不踊躍歡迎；各省各城恢復，從未防害安寧。上海東南區埠，通商世界著名；一經大兵雲集，損害自必非輕；今奉軍政府命令，但令各界輸誠；茲已紛紛歸順，足見敵愾同情；惟願親愛同胞，仍各安分營生；洋人生命財產，切勿乘此相侵；轉瞬民國成立，人人共享太平。

上海軍政府經濟困難，初擬指定上海信成銀行發行，及至11月10日，財政已稍有頭緒，一面由軍政府自行組織中華銀行，發行軍用鈔票及公債，當時示諭如下：

“為曉諭事：照得上海為通商區埠，中西薈萃，商賈輻輳，素稱殷埠。比年以來，歷因金融困滯，貿易衰減，屢起恐慌。自本年八月迄今，又因戰事影響，困難已達極點，若不亟為維持，誠恐陷溺日深，不可收拾。況自本軍政府建立以後，治軍行政，需款浩繁，然當百度維新之始，又豈忍遽行征斂，重累同胞。日來虛心諮訪，籌議再三，惟有亟行組織財政機關，以期流通泉貨，酌劑盈虛，既裕餉需，兼蘇商困，刻已特囑財政總長，會集本埠商界熱心諸君，即日創設中華銀行，以為整理財政之樞紐。從來辦事之成績，經濟充裕自能百廢俱興，爾商民人等，速宜各安生業，靜候措施，切勿臆度驚疑，致亂秩序，本都督有厚望焉。除囑由上海財政總長迅籌款項，妥議章程，趕即開辦外，合行出示曉諭。”

11月14日訂定《中華銀行簡章》，簡章原文如下：

財政不修，貨泉滯滯，因之農工商眾不能振興，即政治亦無從措手，此我國貧弱之原因；而同胞所以有坐困危亡之懼也。上海素稱通商大埠，為全國財源之樞紐，應亟設立財政機關，以便流通而維市面。爰特組織中華銀行，即日開辦，茲將創辦簡章列后：

一、本銀行奉軍政府命令，亟欲維持市面，流轉金融，先行訂立重要簡章數條，准于十月初一日開辦，容俟擬定詳章，再行宣布。

一、本銀行定名中華銀行。

一、總行設立上海南市沿浦吉祥弄口，分行設立北市。

一、股本暫定銀洋五百萬元，分一百万股，每股五元，先收一半。

一、股本公股商股各半，所有公股先收一半，計洋一百二十五萬元，現已籌足；其商股無論何人，均可附股，余利一律均派。

一、本銀行股東除應得股東權利外，再當別籌特優獎，以為急公向義者勸。

一、商股自九月念四日起開始募集，限五日截止。

一、凡附股者先給收據一紙，俟股票刊就後，再行換給。

一、本銀行營業各項，採取各國商業銀行通行章程辦理，力除通融舊習。

一、本銀行兼理軍政府所發軍用鈔票，隨時可向本行換取現洋。

一、本銀行兼有中央銀行性質，經理國家所入一切稅賦餉項。

一、本銀行暫行試辦，以六個月為期，屆期再當開股東會，舉行正式選舉，並宣布詳細章程。

一、本銀行額定監理一員，總理一員，協理一員，董事七員，查賬兩員，其餘辦事各員，均由總協理主政。

一、監理一員，由政府委派，股東承認；總協理二員，由股東公舉，政府承認；董事七員，由政府委派三人，股東公舉四人；查賬員則由政府委派一人，股東公舉一人。

一、附有股份二千股以上，有委派監理及選舉總協理之資格；一千股以上，有董事之資格；五百股以上，有查賬員之資格。

一、本銀行現因亟須成立，所有監理總理董事各員，先由軍政府暫行委用，俟試辦六月期滿，應即照章委派公舉。

以上試辦簡章十六條，規模粗具，其餘一切詳細章程，俟訂定再行宣布。

11月21日中華銀行在南市吉祥弄正式開幕，發行的軍用鈔票也就在當時流通。孫中山先生擔任總董，首屆董事為黃克強、薛仙舟、沈縵云、朱佩珍，總經理為林蓮蓀。

1912年7月中華銀行總董孫中山先生召開會議，改為完全商辦，重訂新章。

中華銀行除在國內招募新股外，孫中山先生特派王奕友等攜帶改組新章前往南洋各埠，向華僑商界勸募股份。

1913年2月26日，中華銀行召開全體股東大會於上海，是日決議改為“中華商業儲蓄銀行”，完全商辦。

1919年12月天津各界国民大会游行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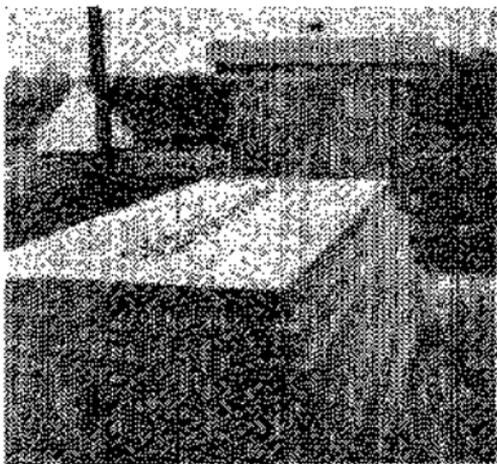
(天津市博物馆藏)



馬駿烈士像



郭隆真烈士像



左：馬駿烈士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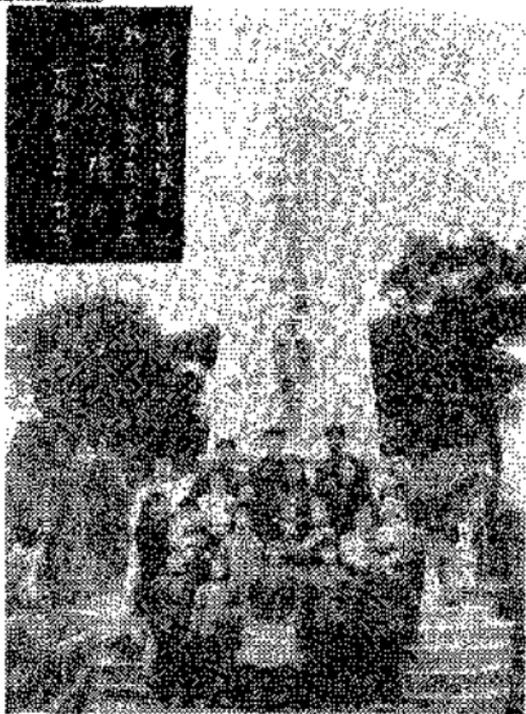
墓在北京朝陽門外紅廟子，
1951年10月落成。

（以上二墓均因空襲失蹤）



左：余寬成遺像

下：余寬成黃鹿生紀念碑





左：王金銘、施从云烈士銅像

銅像立于1924年，在北京中山公園內。1926年寧漢張作霖軍北京時銅像擱在十中。1928年奉軍驅出北京，1929年又遷為建立。七七事變後被日寇鎔毀。（出自《平漢鐵路革命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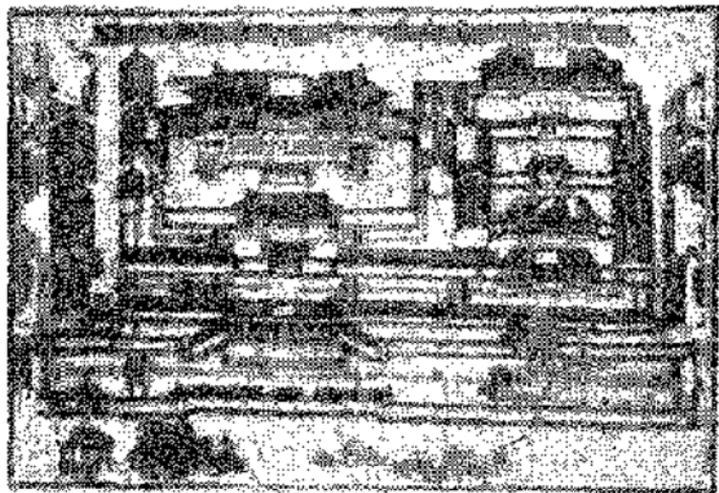
右：白雅雨烈士像

（出自《平漢鐵路革命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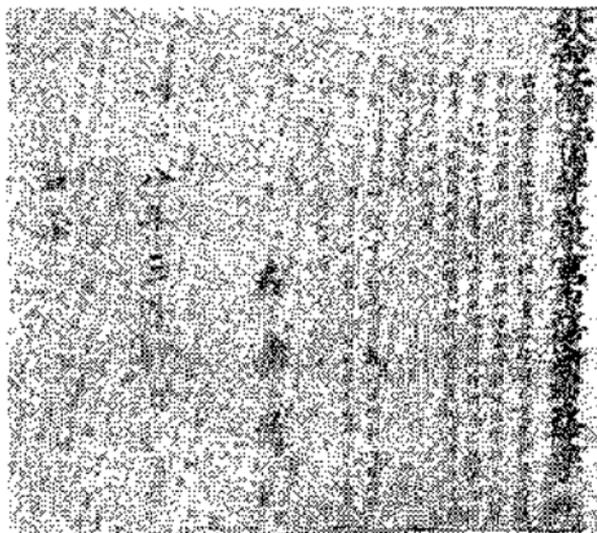


漢府機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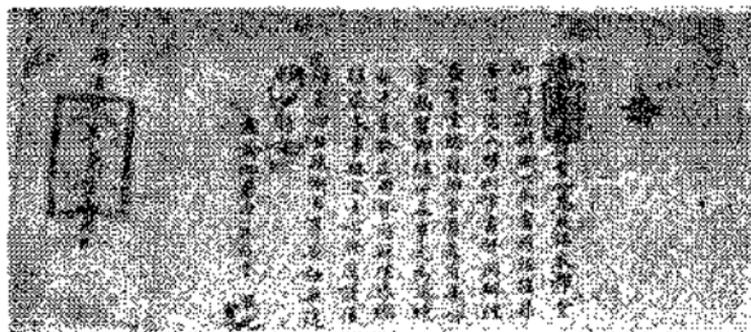
(以上六幅均用紙張攝影)



總行執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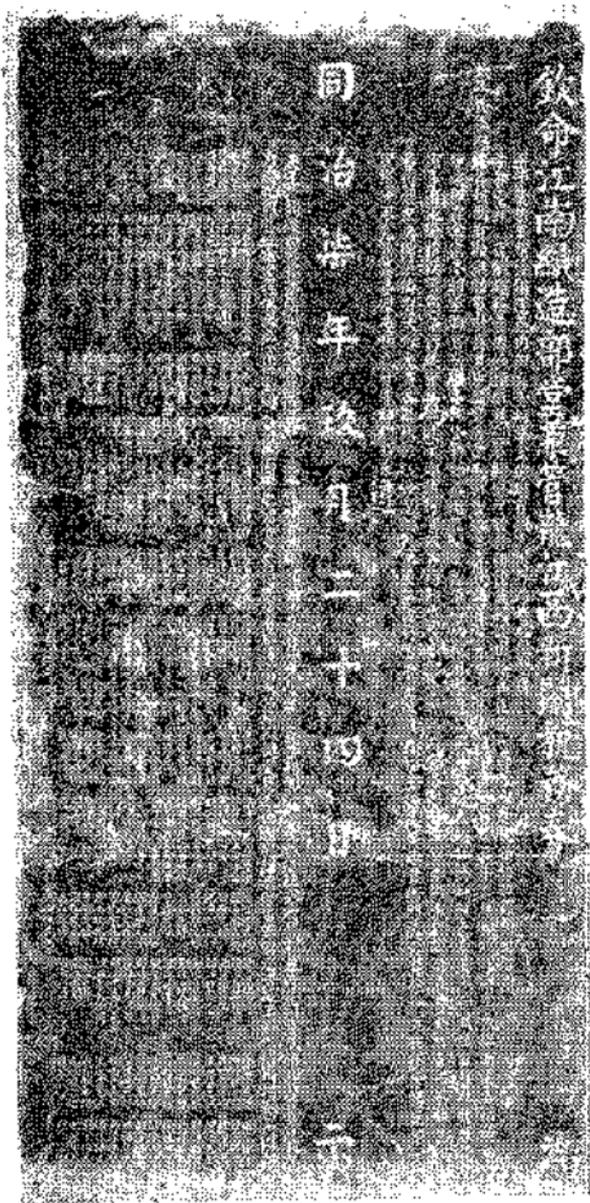
輸 帖



執 照 領 執



築業所公碑



同治庚午年正月二十四日

二

緞業公所碑

送前

憲文

刊石

泰文

光緒三十三年

六月

征集中国近代史资料办法

一、为保存、整理並流傳中国近代史資料，特征集鴉片战争以来各种文献。

二、征集范围，包括：

1. 中国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文化等項的重要資料；
2. 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斗争的各项資料（包括各少数民族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及华侨在国外的斗争）；
3. 苏联援助我国革命及各国人民与我国友好关系的資料；
4. 帝国主义对我国軍事、政治、經濟及文化侵略等項資料；
5. 清朝政府、北洋軍閥、蔣匪帮及其他反动集团等卖国、專制、殘酷剝削以及其內訌等項資料；
6. 近代人物的重要資料；
7. 其他重要資料。

三、資料形式，包括：

1. 檔案、函电、日記、著述稿本等；
2. 亲历者的回忆录和訪問記与历史事件的調查記錄等；
3. 人物傳記；
4. 像片、拓片及各种遺物等；
5. 旧报章杂志、各地方誌、罕見書籍等；
6. 史料長編、年表、統計圖表、資料目录及資料考訂等項著述；
7. 非汉文資料或其汉文譯本；
8. 其他。

四、凡保有上列資料者。請將原件或抄本寄來。惟特別珍貴、數量較大、郵寄困难以及保有人希望仍收回原件或有其他意見者，均請先行來函告知，以便商定办法。

五、凡可以出版的資料，即編入《近代史資料》雜誌或單冊印行。

六、凡經出版的資料及不出版而有保存價值的資料均從優致酬，凡不願受酬及不願公佈姓名者請預先聲明。未被採用的資料如須退還，亦請預先聲明。

七、來件請寄北京東廠胡同一號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原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

近代史資料

2

1958

近代史資料

1958年 第2期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輯
科学出版社出版

編輯凡例

- 一、選輯較有價值的原始資料及經過初步整理的史料性的文章，供歷史科學工作者參考。
- 二、編次分為原始資料和整理史料的文章兩部分，各按所述歷史事件的時間順序排列。
- 三、原始資料，不拘正文或原註，均酌量選錄或刪節，但不作內容和文字上的改動。
- 四、編者在每篇資料之前酌加按語，說明其來源、原作者立場與參考時應注意之處。
- 五、資料中難免有敘事失實、觀點錯誤之處，反動統治階級的言詞更有污蔑人民和歪曲事實之處，編者均酌加註釋。
- 六、資料中殘缺之字，以口代之。資料中錯字、別字和衍文的校勘以及其他簡單註釋，均加在正文之內以〔 〕號標明。較長的註釋列在正文外，以陽文①號標明。佚文的增補以【 】號標明。
- 七、編者按語和校勘、註釋均以編者所知為限，不知者闕之。
- 八、紀年原文用陰曆者，酌註公曆；原文用公曆，在一九一二年元旦以前者，酌註中曆。

近代史資料 (双月刊)

1958年 第2期 总19号

編輯者	中国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第三所 地址:北京东厂胡同一号 电话:5. 3 5 2 2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印刷者	北京市印刷二厂
总发行处	邮电部北京邮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局
代訂代銷处	全国各地新华書店

(京) 1-6,670

1958年4月出版

本期定价: 0.60元

本刊代号: 2-145